

法国共产党史

第二卷

从1940年到解放

(供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内部图书资料
第 0070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

8

33.15133

171

12

513

法国共产党史

第二卷

从1940年到解放

北京編譯社譯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6年·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往事一瞥	4
第二章 占领时期的头几个月	19
第三章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诞生	38
第四章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袭击	58
第五章 1942年——决定性考验的一年	73
第六章 阿尔及利亚的跳板作用	93
第七章 科西嘉岛的解放	106
第八章 参加临时政府	115
第九章 迎接第二战场的开辟	123
第十章 解放战斗	136
第十一章 巴黎自我解放	146
第十二章 在本国土地上的最后战斗	162
第十三章 关于参加政权	171
第十四章 从解放到第十次代表大会	194
第十五章 第二卷的结束语	211
大事记	224
参考书和资料	231

前 言

这部法国共产党史的第一卷是公开发行的，因为它涉及的是众所周知的1940年以前的那一时期的史实，对于现行政策已经沒有多大影响。

在那一卷里，我們只是重述了一下事实，同时去掉了所有与事实毫不相干的附加成分和伪造成分。

第二卷是专供共产党人閱讀的，因为这里揭示的某些較近事件的根源尚有待于全党加以澄清，以便从中得出正确的解释和对现行政策有益的教訓。

从党在这个时期奉行的政策的后果及目前繼續奉行这种政策的情况来看，确实迫切需要针对党在这个时期的政策展开一場大辯論。

遺憾的是，党的領導机构錯誤地、不光彩地长期拒絕进行這場迫切需要的辯論。作为共产党人，我們认为，我們有責任毫不迟疑地搜集一切我們所了解的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材料。

我們并不隱諱做这件事所碰到的困难和麻煩，但是，这同严重的失职可能造成的損失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沒有在党内、在我国人民面前并同我国人民一起使历史路綫正常发展，我們的《法国共产党史》往往仅限于叙事紀年，重述客观事实。

历史家們可能十分正确地指責本书只是“罗列和叙述事实”。但是这比沒有好得多，比单独一个領導人写的小說体裁的自传好得多，比一些犯了錯誤的領導人为了掩飾和繼續奉行一

种灾难性的政策而写的一些掺假的历史宣传著作好得多。

我們对于共产党员讀者有足够的信任，我們认为，当他們了解事实真象，按照我們共产党人的理論对这些事实进行評断，并据此同苏联兄弟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大胆討論先后加以对照以后，是会得出正确解释的……

此外，尽管我們做了一些防范，这本叙述事实真象的书还是难免会落到反共分子的手中。甚至会有人为这种泄露提供方便，并把由此而引起的造謠中伤归罪于我們。但是，对于党來說，这些危险同永久說謊和由此而造成的意志消沉比起来，是无关紧要的。

讀者同志是会区别共产党的自我批評同本书所譴責的反动分子的造謠誣蔑的。

敌人曾經从赫魯曉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斯大林的錯誤及斯大林个人迷信产生的后果所做的报告中“断章取义”，企图攻击共产主义。这种敌对宣传所带来的害处同自我批評和糾正錯誤所起的进步作用相比，是无足輕重的。

我們依靠这种經驗，向讀者同志說出了他們有权利想了解的事实真象，以便将来共同避免重犯过去的錯誤。

即使在許多同志可能认为是煽动性的暴露的东西中，我們也决不会說出敌人所不知道的和敌人在自己的警察局档案里可能持有一些证据的任何东西。我們让全体共产党人了解确切的事实，就能防止敌人乘机加以利用。

后面的叙述表明，从整体來說，党在最混乱和最危急的时期对于共产主义原則及其历史使命是忠实的。

当縮小了的、与党隔絕和脱离群众的領導机构发出一些既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又不符合实际可能性的指示的时候，党，

从基层到最高领导，最終还是糾正了錯誤，并且在实际行动中采取了比較正确的路綫。

一些同党失去联系的干部和自发地重新組織起来的党员，在敌人占領的最初几个月里往往主动地組織宣传工作，进行反法西斯的活动。

后面将有机会研究的一些违背原則的指示只下达到几个人的手里，而且一般地說，这些人对这些指示是有保留地接受并且怀疑这些指示的真实性的。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原則性，共产党人才成为抵抗运动的积极締造者，从而也就成了法西斯迫害的对象。

为党的敌人所利用、违背共产主义原則和群众願望的活动，肯定是有一些的。对此負有責任的并不是那些遵守紀律的執行者，而應該归咎于那些领导人，他們不懂得在必然要簽訂的德苏条約所造成的困难局面面前，把正确保卫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堡垒同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情感結合起来。

讓我們在这篇必要的前言里，向那些不顾强迫人們遵守紀律的最高命令的威胁而減輕了不正确指示的消极作用，宣传了正确的口号，并且从 1940 年起就使法国共产党站在抵抗运动最前列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致敬。

第一章

往事一瞥

納粹軍隊闖入法國領土時，共產黨處於非法地位已經九個月了。

1939年9月26日达拉第下令解散共產黨以後，黨員們在秘密重建黨的鬥爭中，以受迫害的重大代價取得了一定的經驗。他們在政治上依靠了後來在抵抗運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工人階級。

但是，在戰爭開始乃至納粹占領初期，黨還遠沒有重新鞏固地組織起來，也還遠沒有取得不可缺少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致。

1939年8月23日德蘇條約的簽訂，使得幾年來一貫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反法西斯行動、反對希特勒德國侵略陰謀的群眾運動和強烈譴責“慕尼黑投降”的全黨不知所措。

我們在第一卷里已經指出這個條約在當時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蘇聯既然看出了帝國主義國家要把希特勒的衝擊力量引向蘇聯邊境的陰謀，它就不能不決定簽訂這個條約。

但從表面上看，這個條約確是反乎常情的，是與法國無產階級當中已經發展起來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情緒相反的，以致許多黨員、許多經過考驗的優秀的共產主義者對這個條約茫然不解。

黨的中央領導仍然像過去常有的情形那樣，“等待”共產國際的“正式解釋”，對於受敵人宣傳影響而迷失方向的黨員並沒有進行任何武裝思想的工作。它甚至連最起碼的解釋還沒有做

就貿然宣布評論德蘇條約的法理根據的人是叛徒。其實，我們的黨員對蘇聯有不可動搖的信任，作一些最起碼的解釋就能使他們很多人感到滿意。

《人道報》和《今晚報》不作任何論證，只是說一些對黨員毫無幫助的空洞詞句。

1939年8月25日的《人道報》上有這樣一句話：“蘇聯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行動有助於鞏固普遍和平。”

《今晚報》則提出：“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公布使戰爭后退了。”

黨領導的失職情況更加嚴重，因為《人道報》、《今晚報》和各省的共產黨報紙在發表上述空洞聲明的第二天就遭到查封，這本來是可以預見到的。

不久，黨員們就只能靠一些小冊子和非正規的聯系來得到一些消息。

領導機構的失職越嚴重，它作出的指示越混亂，黨員們對德蘇條約的想法也就越迷惘。黨對於這個條約所採取的立場同全黨以前所極力宣傳的立場顯然是矛盾的。

早在幾個月以前，1937年阿爾代表大會所選出的政治局^①就宣布過，對希特勒的威脅應該採取堅定的政策。

多列士曾宣稱：“當希特勒拍桌子的时候，不應該躲到桌子底下去。”馬爾梯在嘲笑那些竟然在慕尼黑同希特勒握手言歡的人時毫不含糊地說：“如果德國沒有鐵、銅、橡膠和石油，就不能夠作戰！”（見1939年5月2日《人道報》）

我們還記得希特勒借口取得通過波蘭領土到但澤港的權利

① 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馬爾梯、馬賽爾·吉頓、皮埃爾·色馬爾、阿爾圖爾·腊梅特、加斯頓·蒙穆索、呂西安·米多耳和弗朗索瓦·皮佑。

而向华沙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

1939年7月5日，加布里埃·佩里在《人道报》上写道：“德国现在打算强占但泽以便控制波兰，正如它过去想强占苏台德地区以便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纳粹侵略开始了，波兰有权进行正当的自卫。”

8月17日，馬尼昂写道：“我們要警惕！有人企图通过牺牲波兰再一次出卖法国。必須挫敗这个罪恶的計劃。”

为了劝告人們对纳粹德国的領土要求采取强硬政策，《人道报》在德苏条約签字的前夕发表社論說：“不許慕尼黑事件重演！”

德苏条約批准后的第二天，希特勒的軍队侵入了波兰。这样一来，过去說的什么德苏条約是拯救和平的保证，呼吁什么“抓住希特勒的魔掌”阻止他强占波兰等等，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法国和英国保证在波兰受到希特勒侵略的情况下支持波兰的时候，党领导的立場从加布里埃·佩里的下述言論中可以看出來：

“問題并不只是关系到波兰。英国和法国所以保障波兰的領土完整，是由于它們把波兰的領土完整看成是英法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939年4月3日《人道报》）

德苏条約签字以后，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議会党团的會議上还說过：

“如果希特勒胆敢不顾一切发动战争的話，他應該清楚，他将会遭到有共产党人站在最前列的、保卫国家安全和各国人民的自由与独立的、团結一致的法国人民的反击。

“因此，我們党贊成政府为保障我国边境所采取的各种措施。”（1939年8月26日《人道报》——合法出版的最后一号。）

8月27日，共产党的报刊遭到查封，于是馬賽尔·加香給萊

翁·勃魯姆写了一封信，以传单形式散发出去，信中說：

勃魯姆同志：

“我們不是說話不算数的。在这样严重的时刻，共产党要明确而忠实地表明自己的立場。

“我們宣布：必須团結全体法国人来击退法西斯战争贩子。

“任何情况都不能使团結在我們周围的几十万工人放弃这种立場。他們决不会作出任何損害保卫国家所必不可少的法国团結的行动。”

9月2日，共产党議会党团就前一天举行的會議发表一項公报，肯定了这种立場：

“共产党議会党团在多列士主持下举行了會議，一致宣布：为捍卫国家的独立自由，为捍卫民主和文明的原則，全体共产党人决心毫不动摇地站在抵抗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最前列。共产党人过去是并且永远是坚决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面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狂妄侵略，共产党人将是我国民主和独立的最坚决的保卫者。”

从这个时期到1939年9月26日，尽管党的报纸都被查封了，但党仍然有举行會議和散发传单的权利。

当苏联军队也开进波兰的时候，代表分散的政治局发言的小领导核心本来可以更充分地解释波兰反动政府和参谋部是怎样逃亡而把整个波兰让給納粹侵略者的，但是它并没有这样做。

当时苏联派军队进占那时属于波兰而实际上是1921年波兰从被迫妥协的年轻的苏联手中夺去的地区，是合情合理的。苏联这样做不但縮小了希特勒对波兰的侵略，同时还为它自己以后的防御建立了一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防护地带。

連丘吉尔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从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发，苏联的战略进军是正确的。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作这样人们可以理解的解释，而是只发表了一篇声明，祝贺“红军解放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时抗议“法国政府没有征询议会的意见就向德国宣战”^①。

这篇声明同党以前发表的声明显然相互矛盾。它给党的敌人和党以前在人民阵线里的同盟者（聚集在政府里的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其他“自由主义分子”）提供了对党进行激烈指责的机会或方便条件。

人们到处大事宣传，说什么法国共产党赞成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法国共产党背弃了它过去为保卫波兰所进行的宣传！法国共产党放弃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之下，一些立场不稳的分子，像党的书记马塞尔·吉顿、克拉马姆、卡普龙等人，便乘机脱离了党，投向敌人的阵营，同时还指责苏联成了希特勒的同谋。

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也脱离了党，这些人不一定是叛徒或变节者，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当时不知何去何从……

以前人们宣布法国声援波兰是正确的，1939年9月2日还投票赞成政府提出的万一需要在军事上帮助波兰抵抗希特勒时的战争预算，并且声明，如果必须打这样一场战争的话，共产党人将站在最前列，现在却写道：“不值得支持土豪劣绅的波兰。”不谴责希特勒侵略了人们过去号召保卫的这个国家，反而不作任何说明就对苏联占领这个国家部分地区的行动表示祝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受到迫害威胁、报刊被查封、随后又被宣布为非法的党的队伍产生某些动摇，有什么奇怪呢？

1939年9月6日，党领导通过马塞尔·加香写给全体参议员的一封信再次宣布：“劳动人民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为

^① 1939年9月18日的声明。

打倒希特勒所采取的軍事措施。”信中明确地提到：“以莫里斯·多列士为首的共产党議員已經回到部队里去了。”

但是，莫里斯·多列士在取得駐布魯塞尔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之后，于1939年10月4日在安納省肖尼（他是在这里参軍的）离开了軍队，同让納特·維美徐、馬尔达·代律莫和阿尔图尔·腊梅特一起到了比利时。

1939年10月20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有名的答英国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記者問，只是已經无法引用它的全文：

“法国的反动势力，达拉第和那些背叛社会党的头目，对于我們揭露他們把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这件事，表现出同样的凶暴。

“人們为了保护資本家的保险柜，已經杀了一些人，而且准备还要杀更多的人。”

坚决反对希特勒的任何侵略，“为了保卫文明”同法西斯的威胁“进行坚决的斗争”，都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突然的改变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强加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指示所引起的，他們想使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服从苏联的策略，而不考虑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况。

在斯大林看来，既然同德国签订了临时条约，并且希望尽可能延长这个条约的有效期限从而贏得时间，那就决不能再展开反希特勒宣传，而必須在努力削弱德国的同时，也努力削弱同德国发生武装冲突的其他資本主义国家。

总书记立即毫不犹豫地听从了这些指示，并且不考虑对党将产生什么危害就表现出与他前不久要求人們支持的立場截然相反的立場。

当时的一篇文件对于党不得不突然改变立場起了特殊作用。

这就是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曾经印成传单和小册子，1939年下半年秘密出版的《布尔什维主义手册》第一期也转载了这篇报告^①。

这个文件的标题是《莫洛托夫的讲话》，其中有以下几段：

“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前我们还采用的而且很多人已经用惯了的某些旧说法，现在显然过时，以后也不能再使用了。

“在估计欧洲新的政治局势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才不致犯严重的错误。大家知道，像‘侵略’、‘侵略者’这些概念在最近几个月都有了新的具体内容和新的含义。不难理解，对于这类概念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根据三、四个月以前的那种含义来使用了。

“如果今天谈起欧洲的大国，那么德国是一个渴望尽快地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而不久前宣称反对侵略的英法则赞成继续进行战争、反对缔结和约的国家。正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现在角色换了。

“英法政府企图以向波兰承担义务为借口来为自己新采取的立场辩护，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知道，根本谈不上复兴旧波兰。

“英法对德作战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发誓要复兴旧波兰，当然也不是因为它们把决心捍卫民主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英法统治集团对德作战有着其他更为现实的原因。

“这些原因不是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属于殖民国家的基本物质利益方面。

^① 根据《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这篇报告秘密印行了五万份。其中有两万份是《布尔什维主义手册》。

“英法目前对德作战的真正原因，是害怕德国对它們那些殖民領地怀有野心，因为随着凡尔賽条約的破产，德国的力量最近大大地加强了。

“害怕失去世界霸权的心理迫使英法統治者采取了对德国发动战争的政策。由此可見，只要是肯于正視现实而不是閉着眼睛不看现实的人，就会清楚地看出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是誰需要这场爭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显然，工人阶级是不需要的。”

在結束說明共产国际所强加的改变方針的原因以前，有必要引述莫洛托夫这篇讲话中专门談“苏德新关系”的一段，以便更好地衡量已經接受的妥协的程度：

“我們来談談苏联本身所处的国际形势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們同德国的关系，正如我已經談过的那样，已經得到根本改善。

“在这方面，事情已經朝着加强友好关系、展开实际合作、在政治上支持德国寻求和平的願望的方向发展了。

“我們始終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是巩固欧洲和平的必要条件。”

* * *

客观地研究一下这篇文件就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是为了稳住希特勒这个伙伴才說了一些叫他听起来感到順耳的話，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个伙伴早晚总会变成自己的敌人。苏联采取这种态度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这种态度符合苏联“爭取時間”的策略，并且可以延續簽訂德苏条約的精神（法英应对德苏条約的簽訂負主要責任）。

一个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党，在宣布过它对法西斯主义的刻骨仇恨之后，在投票贊成同法西斯主义作战的預算并声明它

一定要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后，似乎不应该不向迷失方向的无产阶级队伍解释改变立场的深刻原因就机械地遵循当时苏联的立场并且突然宣传这种立场。

集体编写本书的作者认为，法国共产党当时可以通过对苏联的策略进行必要的解释而制定一个既考虑到自己以前所采取的立场又兼顾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对命令的方针。

莫里斯·多列士在决定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和抛出全面改变立场这个炸弹以前，如果先同所有未被捕的中央委员商量一下，肯定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且可以避免一些损害。

第一卷中谈到的怎样被剥夺权利、被监禁和受审的共产党委员和数以百计的党员，都是这种专断的领导方法的受害者。

共产党委员给爱德华·赫里欧的信（这封信由阿尔图尔·腊梅特从共产国际驻比利时的机构带来，由弗洛里蒙·邦特副署），除了声明改变立场以外，其写作手法也极为拙劣。^①

信中写的“法国将面临〔纳粹德国的〕各种和平建议”这句话，无疑是执行莫洛托夫所确定的路线，然而这恰恰给了反共分子以宣传共产党委员“卖身投靠希特勒”的机会，说共产党人早就知道希特勒的意图，说他们不等希特勒提出建议就表示支持。

因此，由分散的中央委员会缩减成的领导核心，在希特勒德国面前自动走上了彻头彻尾和平主义的道路，并且竭力为这种做法辩护。这个领导核心甚至又搬出了李卜克内西在他那个时代勇敢地提出来的口号：“敌人就在我们国内！”盲目地把它应用到1939—1940年的战争上，好像这是一场英法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战争；而且当纳粹军队已经盘踞在法国领土上的时候，还是这

① 见本书中译本第1卷第210—211页。

样喊。

这种改变使得一贯信守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主义战士陷入困难的、有时是戏剧性的境地，因为改变了的立场同他们多年来在与他们有紧密联系的群众中所捍卫的立场完全背道而驰。

敌人的宣传机器所进行的猛烈宣传使人早就预感到将要宣布共产党不受议会的法律保护，于是党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准备转入地下活动。不幸的是，人们不加识别地竟把这项责任委托给了根据莫里斯·多列士的提议提升为党组织书记的实际上成为最高警察局代理人的马赛尔·吉顿。吉顿不久以后的叛党，使得一切准备工作都落空了。地下干部的新负责人莫里斯·特雷昂不得不从头做起。特雷昂在阿尔图尔·达利戴的协助之下重新成立了一个秘密机构，用以代替被破坏了的组织。按照预定计划转入地下的地区委员会^①为数极少。

除了发生几起叛党事件之外，由于人们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法主义思想和对被罢免的议员的作用抱有幻想，还先后招致了达拉第一雷诺政府和贝当政府的镇压。

有人向那些想要隐藏起来的党员说，不久就会恢复合法活动，还有人硬说他们应该呆在自己的家里。有人建议市议员们要在罢免他们的市镇里进行公开宣传。因此，巴黎地区有一些共产党市长就冒着被捕的危险举行公众集会。圣乔治新镇的亨利·雅宁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轻率举动呢？毫无疑问，人民阵线时期的积极策略和在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使某些党员又产生了或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麻痹性。但是，合法主义还有另外的原因。当时莫里斯·多列士和那些追随他的人都认

^① 这个时期，党的省组织称作地区委员会。

为，希特勒在同斯大林玩弄妥协的把戏，而希特勒終归是要上当的。

他們认为，希特勒在相当长的時間內不会侵略苏联，并且可能由于德苏条約的延长而对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采取某种容忍态度。

这就是說要利用这个空隙和妥协所造成的有利机会来加强自己，最后把希特勒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者統統打倒。这里面包含着一种无原則的既阴险又拙劣的想法。

但是，这些公开行动的指示使很多党员遭到逮捕。面对这种情况，最有經驗的党员特别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老战士和工会干部，协助糾正了这些錯誤，并且自动作出了一些必要的决定。但是，混乱、缺乏有組織的联系、小领导核心发出的混乱指示的绝对命令性质，无疑都只能表明缺乏思想的一致。

在党被解散以后，党的主要活动側重在反对政府、反对英帝国主义分子和那些在停战协定之后主张继续战争的人的宣传上，但是，不同地区所采取的方針常常有很大的出入。

尽管如此，散发秘密材料的工作扩大了，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果：把正在暗中摸索的优秀党员重新集結起来了。

爭取取消禁止共产党的法令和释放入獄人員的斗争并没有能够鼓动起广大的群众，因为动员和战争已經把在德苏条約簽訂之后不再理解党的立場的劳动人民弄得分散了。

但是，通过第一次地下斗争，党找到了行动途徑，建立了战斗基地，由此很快又恢复了党对劳动人民的领导地位。

当希特勒的军队向巴黎推进的时候，以貝諾瓦·弗拉商为代表的党的领导机构应一位感到失敗之风的部长的請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个领导核心建議要将这场战争变成一場真正的解放战争：逮捕敌人在法国的代理人，释放被捕入獄的共产党

員，武装人民。^①

1940年6月6日，乔治·波利塞尔把共产党的建議交給了政府，不幸这个建議被拒絕了。

巴黎被占領后，党領導又由于盲目地听从完全受斯大林指揮（并遵循斯大林的战略方針）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的指示，而犯了一个新的、特別严重的錯誤。

逃亡到比利时的莫里斯·多列士在受到被驅逐出境的威胁后，又同阿尔图尔·腊梅特一起逃到了瑞士。同他們一起逃亡的諾尔地区的領導人馬尔达·代律莫不幸被捕，并被轉押到洛斯監獄^②。

莫里斯·多列士在瑞士劳动党領導人尼科勒的一个亲戚家里逗留一些时候之后，依靠当时駐維希政府的苏联大使館的协助回法国呆了一个时期。

下面要提到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在斯大林的錯誤影响之下，确曾希望共产党能够在希特勒占領的国家里进行合法活动。只是在证实斯大林計劃的这一部分不能实现以后，莫里斯·多列士才被秘密地送到苏联。

根据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发出的爭取合法化的指示，党的“秘密机关”的負責人之一莫里斯·特雷昂，奉命去同納粹占領軍当局就《人道报》的合法复刊問題进行交涉。

协助他工作的有两位女黨員：德妮茲·姬諾兰和精通德語的施罗德。

1940年6月19日，代表团来到設在巴黎馬德萊納大街12号的納粹司令部新聞处。宣传队长韦伯中尉接見了代表团。

代表团贊揚了苏联和德国的良好关系；表述了法国共产党

① 見本书中譯本第1卷第229—230頁。

② 在法国諾尔省。——譯者

爭取和平的斗争，共产党議員就是因为反对对德宣战而被关进監獄的；同时还贊揚了荷兰共产党和比利时共产党从德国占領者手里得到了同样的权利这一事实。是的，《真理报》和《人民之声报》确曾合法地发行了一个时期，这种情况足以证明，确实有过爭取在德国占領軍同意下的“共产党合法化”的国际指示。

納粹司令部新聞处宣布，《人道报》完全可以合法复刊，但必須遵守新聞检查机关的下述指示：禁止刊登軍事新聞、气象預报、組織群众的号召和任何能够起某种煽动作用的文章。

第二天，即1940年6月20日，出版許可证发了下来。許多党员都記得，那时他們曾經接到通知，要他們作好公开散发《人道报》的一切准备。

于是，德妮茲·姬諾兰到巴黎蒙特馬特尔街123号一向承印《人道报》的当貢先生那里，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他，同时請他繼續承印党的日报。当貢答应了，但要求交来付印的原稿必須有德国新聞检查机关的签证。当时他还接受了預付的部分印刷費五万法郎。第二天就要把合法复刊的第一号的文章給他送去。

但是，1940年6月21日，德妮茲·姬諾兰和莫里斯·特雷昂带着預定第二天中午合法出版的《人道报》第一号的第一批文稿准备送交宣传队进行新聞检查时，被法国警察逮捕了。

他們的罪名是违犯1939年9月26日解散法国共产党的命令和1939年8月24日查封共产党报纸的命令。

遭到維希警察这种意外的干涉之后，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派另外两名党员为释放入獄人員去进行交涉，这两个党员就是一向为苏联駐法大使館作辯护律师的罗貝尔·富瓦桑和党中央委員让—加特拉斯。

1940年6月25日，德妮茲·姬諾兰从珀提特—罗凱特監獄被释放出来，第二天，莫里斯·特雷昂也从桑第監獄被释放出

来。这件事有释放名册可以查对。释放名册上注明，他們的释放是按照德国軍事当局首长的高級顧問弗利茨博士的命令执行的。

尽管让一加特拉斯个人不同意，他还是被委派去再一次要求合法出版《人道报》。他是通过莫里斯·特雷昂副署的一封信来办这件事的，这封信由罗貝尔·富瓦桑送交给德国当局，信中說：

“我們要求許可《人道报》以它在德苏条約簽訂的第二天被达拉第查封之前出現于讀者面前的形式出版。

“我們出版《人道报》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和揭露造成法国目前局勢的責任者。

“我們出版《人道报》的任务是揭露英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們想把法国的殖民地拖入战争）和号召殖民地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爭取自身独立的斗争。

“我們出版《人道报》的任务是繼續推行欧洲和平的政策和宣传締結法苏友好条約作为德苏条約的补充从而为持久和平創造条件的主张。”

信末附言說：

“为了使《人道报》能够完成它作为人民的保卫者和顧問的任务，必須做到两点：

- “1. 释放被监禁或被拘留的共产党員；
- “2. 恢复所有因竭力維護德苏条約而被非法剝夺受任权的議員即人民代表的职权。”

但是，由于維希政权的反对，《人道报》和进行同样交涉的外省的党报——如諾尔省的《戴鎖者报》——都沒有能够复刊。

以后，让一加特拉斯在被納粹分子处决之前（他是在共产党回到正常的抗敌立場的时候被納粹分子逮捕的），成功地托人把

他关于这个时期、关于人们强迫他办理这次交涉的大量日记送到松姆省（让-加特拉斯是这个省选出的議員）的一位同志手里。他希望这些日记能够在法国解放（这是必然的）之后作为分析批判党在占领时期政策的材料。

我們很希望保存这些日记并且已經用它当过擋箭牌的人能够在党内传布这些日记。

到后来，上述的种种活动实际上都被否认了。罗貝尔·富瓦桑律师当了替罪羊，他于1941年末苏联由于德国的侵略而被卷入战争的时候，被追溯开除出党，“因为……”他在1940年6月“曾企图緩和同占领者的斗争”。

1945年3月20日巴黎律师公会决定把曾同占领当局进行过交涉的富瓦桑律师开除出公会。

* * *

我們并不是要貶低实际作这件事情的两位同志——被德国人杀害的加特拉斯和死于流放的德妮茲·姬諾兰，以及那些坚强大胆、騎着自行車挎着报兜来取合法的《人道报》（幸好它沒有出版）准备散发的党员的英勇忠誠。

恰恰相反，我們是要通过确切地叙述事实来恢复那些由于自认为是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领导人的錯誤而被加上不应有的种种罪名的全体共产党员的名誉。

历史终于证明，即使这样严重的錯誤也不能阻止一个忠于人民事业的政党在反对压迫者、爭取解放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章

占領时期的头几个月

在希特勒軍隊占領法国的最初几个月里，由于缺乏組織和联系，共产党很难开展任何有計劃的活动。

当时有包括干部、議員和积极分子的一万八千名共产党员被监禁或拘留。

在“假战争”期間，主要是由于一些女共产党员特别是艾蒂納·法戎和呂西恩·桑佩的女伴們，以及在达涅尔·加桑諾娃和克劳迪娜·紹馬領導下的“法国女青年”到处寻找和联系，許多党员才得以重新組織起来。这些党员在当时的崩潰局面下都分散了，必須把他們找回来。

因此，当时党的活动便决定于由于缺乏联系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性情而行动的負責干部对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所采取的措施。

例如，“三人小組”曾各自发出一份方針互不相同的宣传材料，其主要結果是造成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政策不一致。

即使在巴黎，特别是加布里埃·佩里和格朗代耳进行活动的西部地区，也出現了不符合中央指示的同占領者作斗争的傾向。

在占領者划为“禁区”和几乎被吞并了的北方各省以及波尔多地区和利木贊，也有同样的趋势。

总的說来，党的各个領導核心都沒有打算同希特勒軍隊展开任何直接的武装斗争。

他們的观望主义产生于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对战争性质的评价。党中央领导小组也有斯大林式的幻想，这表现在恢复合法地位的不切实际的企图、和平主义的倾向、对英帝国主义的单方面攻击、一些过分而不恰当的口号等等方面。

这里把中央领导机构所推荐的宣传口号摘录几条如下：

“斯大林万岁！”——“红军万岁！”——“拥护多列士执政！”——“法国共产党是唯一有资格领导法国的政党！”

后来，在所谓“1940年7月10日”的告法国人民书^①中，连一句指名反对占领者的话都没有。这个文件后来经过篡改，摘要刊载在解放后伪造出来的一期诡称秘密发行的《人道报》上。有一篇冒充告人民书的文章倒是谈到了“纳粹的袭击”，然而在那个时期，党的任何文件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告人民书只谴责了贝当和“那些企图把法国绑在英帝国主义战车上的”人”。

还可以指出：这份诡称秘密发行的1940年7月10日《人道报》的版边上有“主编马塞尔·加香”的字样，而在以前或以后的各号都没有这种字样。

难道能够说真正号召同纳粹占领者进行斗争的秘密报纸，提出一个为德国人所熟知而当时还没有隐藏起来仍然住在布列塔尼自己家里的同志的名字不是犯罪吗？

这一号假《人道报》还有另外两个漏洞，首先它违背当时《人道报》按照中央指示所宣传的和平方针。其次这篇“1940年7月10日”的告人民书提到了一些在7月13日贝当才任命的部长。一份准备在7月10日散发的秘密《人道报》根本不可能发表指名攻击一个三天后才成立的政府的成员的文章。

^① 全文见本书中译本第1卷第235—244页。

本书的編著者收集了法国共产党地下活动时期的大量出版物，汇编成好几册。但是在这个时期的文件中，没有一个党员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份所谓1940年7月10日的那一号《人道报》。

由雅克·杜克洛和貝諾瓦·弗拉商担任书记的党的领导机构，根据莫里斯·多列士在国外发表的路綫在1940年6、7月間所进行的一切宣传，都鼓吹“成立一个由反对过战争的、正直廉洁的人组成的政府”，“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而没有提出这个政府必须以赶走德国占领者为前提。这条路綫的基础是希望根据德苏条约能够成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当然，提出这些烏托邦口号的干部們自认为这样做是为党和苏联服务，并且认为只是利用暂时局面的有利因素的一种策略。但是，这样一条路綫引起了令人痛心的混乱，甚至有时激起狂热的情绪。占领区领导核心的某些編者在秘密发行的《人道报》里編入了一些駭人听闻的文章，大谈什么占领軍的納粹士兵是暂时被迫“穿上軍装的德国工人”，巴黎劳动人民必須同他們“联欢”。

有好几个月，中央宣传机构一再申述“共产党議員从1939年起就坚持呼吁和平”，这是让同苏联訂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的占领者相信法国共产党人不反对他們的一种方式。

为了着重說明这一点，中央宣传机构向法国人民談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1940年7月4日的秘密《人道报》写道：

“法国人民要和平。他們要求对那些唯英帝国主义之命是从、想再次把法国人民拖进战争的人采取有力的措施。”

的确，在这个时期的各种文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戴高乐从伦敦发出的继续作战的号召所作的这种譴責。对“伦敦金融界”和“英国金融代理人戴高乐”的攻击在中央领导所发表的

材料中屢見不鮮，而黨的某些負責人却在他們所控制的領導核心鼓吹一種不同的立場。

忠于列寧教導的、經過行動考驗並反對一切盲從的黨員們，對形勢作了正確的估計。他們並不否認丟下法國軍隊不管，指望依靠以戴高樂為代表的一小撮法國資產階級的支持將來統治法國的英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但是認為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同資本主義壓迫的最可怕的形式——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

他們認為，不同法西斯主義占領者進行鬥爭，就是甘願作它的奴隸，就是加強它，迫使其他國家的人民也來作它的奴隸。

因此，同納粹占領者作鬥爭是既有民族意義又有國際意義的雙重義務。

因此，在德軍進入波爾多的同一天就發表了號召法國人民向希特勒占領者進行鬥爭的聲明。當時夏爾·狄戎正被派到那裏從事重建地下黨的工作。

下面是這篇聲明的摘要：

“他們（資產階級統治者）把西班牙、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出賣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了。現在，他們又在出賣法國。他們不管對誰都背信棄義。

“在出賣了北部和東部的軍隊之後，在出賣了巴黎、巴黎的工廠和工人之後，他們認為可以在希特勒的協助下把整個國家都出賣給法西斯主義。但是，法國人民不願意當奴隸，不要貧困和法西斯主義，他們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戰爭。他們是多數，團結起來就是力量。

“全國人民都必須挺身而出，以便：

“——立即逮捕賣國賊。

“——爭取成立一個依靠群眾、解放勞動人民、恢復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反對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和二百家族、同蘇聯協商實

現公平合理的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并对法西斯組織採取措施的人民政府。

“工厂、农田、商店和办公室里的人民、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識分子，正在服役的陆海空軍战士們，團結行动起来！”

这个声明所提出的恢复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要求的性质与以同占領者妥协为中心的中央指示截然不同；声明中有采取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行动的明确号召，而在由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所签署的1940年7月告法国人民书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一点。

即使在领导人严格执行中央指示的各个地区，也成立了一些具有反法西斯战斗性的活动核心。

在禁区，人們一面从事符合指示的宣传工作，一面儲存軍火，并且印发了一种較有反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地方性刊物。

在利木贊，后来成为一个很大的馬基游击队的领导人的乔治·岡古安，1940年8月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譴責“准备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无耻地剝削法国人民的法西斯杀人集团”。

这些核心常常由于出版一本反对希特勒的小册子或是在墙上书写反对占領者的标語而受到申斥。

在立場上所存在的这种分歧是不利于地下党的團結的。

但是，有数千名复員回家的党员設法恢复同党的联系，他們找不到党时，就自动組織起来，从事宣传活动，当然，他們由于鹵莽地在某个被捕同志的家里或无法提防的叛徒的家里进行活动，难免遭到迫害。

在被拘留的一万八千名共产党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安于監禁，坐待“依法”获得释放。另一部分数量較多的人則不相信将来的政局变化，他們千方百計要越獄逃走，重新展开斗争；他們的这种行动往往得到成功。

在这方面，党中央领导的“合法主义”策略是强迫命令人们采取后患无穷的等待政策。

例如，在二十七名被监禁的共产党議員轉押到上卢瓦尔省浦伊監獄之后，他們当中的貝諾瓦、科松璫、克里斯托夫尔、拉雷普和馬尔太耳曾計劃組織集体越獄。

这些被监禁的人弄到了一把鋼鋸和一张当地的地图。他們只要鋸掉一根铁条，再从牢房带出一个板凳，就可以越过院牆和外面屋頂之間的两米半寬的夹道。監獄屋頂的另一面有一排馬厩，很容易溜下去，因为馬厩的屋頂正好靠着牆。

皮埃尔·拉雷普代表这个集团把越獄計劃遞交給負責獄中議員政治工作并同党的領導机构有联系的弗朗索瓦·皮佑。皮佑虽然了解計劃的事情关系重大而且有成功的可能性，却要求等接到中央的指示以后再执行。等了很长时期以后，一个被拘人的妻子终于带来了这样一个答复：只有領導机关通过弗朗索瓦·皮佑指定的那些議員可以按照将来規定的時間越獄。

一直等了好几个星期，最后来了一道把共产党議員轉押到阿尔及利亚一个監獄的命令，越獄的希望就此破灭了。

另外，还有一些同样严重的其他情况。

例如，一个被拘押的同志获得回家安葬已故近亲的許可以后，有人一再叮囑他事毕要重返拘留营去。又如，一个被关押在阿尔及利亚博絮埃拘留营的人得到类似的允許回到法国，当他同党的地下負責人取得联系的时候，却被命令再回到阿尔及利亚博絮埃拘留营去。从前被关在居雷拘留营里的几个人证明，有一个准备越獄的集团接到“外部”一封請他們切勿行动的信，信中說，“你們是即将对我們的敌人进行控訴的证人。”

在耶烏島，拘留营党委会竟譴責了一次已經成功的越獄，据外部聯絡人說，党委会的借口是：这样做对敌人有利，而且会丧

失获释的可能性。

这样一来，许许多多守纪律的党员便长期被拘留或监禁，而当德国秘密警察从法国警察手里把他们接管过去以后，则有的被流放，有的作为人质被枪杀了。

我们在这里且不谈那些在背叛书或“不再活动”的保证书上签字而获释的被押党员。这样做的人只不过少数。但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范围内再次执行他们所认为的柏林—莫斯科条约精神，他们在背叛书上签了字，获释以后立即又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是否一切场合都可以说为目的不择手段是正确的呢？是否某些玷污原则和理想的作法同目的是不相容的呢？以后将由党来判断。

在合法复刊《人道报》的尝试失败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印发的文件，特别是巴黎地区委员会的一些告巴黎人民书仍然坚持必须惩办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要求尽快地成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人民政府，因为只有这样的政府能够“本着德苏条约的精神”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推行一种“正好可以作为德苏条约的补充”的法苏友好政策。

但是，由于基层的潮流和党的许多负责人主张反对希特勒，地下党领导意识到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德国人的许可，便也开始对占领者的态度进行谴责。

在1940年10月出版的《我们控诉》这本小册子中，有这样几段话：

“德国领导人曾经向德国人民宣告：战争是别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除了西方的财阀政治之外，德国军队没有别的敌人。他们说，德国对于从1939年8月23日以来同苏联保持睦邻关系感到高兴。

“法国共产党人反驳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请你们把行动

和声明一致起来。成千上万的人由于反对战争而被关进了监狱和集中营，你们应该把这些人释放出来！

“许多由最坚决地反对法国财阀政治的人所领导的市政府被解散了，你们应该恢复这些工人领导的市政府！”

“《人道报》、《今晚报》、《前卫》周刊和《今日俄罗斯》月刊等报刊，由于支持苏德条约而被查封了，你们应该恢复这些报刊的合法出版权利！”

“这种话是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占领当局是听不进去的。”

已经表现出了对失败的悔恨，因为不能不改变策略，或者至少不能不收敛一下妥协的行动。

的确，从1940年7月起，扩大了宣传工作，出现了暗中破坏的活动，有时是自发的。这里有些党员夺回占领者在当地征收的存粮；那里有些党员鼓动劳动者罢工或鼓动主妇们“自取所需”。

蕴育着共产党抵抗运动萌芽的一些其他活动也出现了。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像夏尔·德巴尔日那样的复员党员在诺尔省成立的一些小组。

这些党员一方面把他们的活动局限于散发宣扬党的要求的一些传单，同时也储藏了一些武器，以便进行高一级的斗争。此外，维希政府的解散法国总工会（1940年8月16日），使得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有了新的性质。

当领导中心及其某些亲信的执行人主张只遵循共产国际根据德苏条约的精神所提出的路线时，有一部分干部同自己所联系的战斗基层完全一致地从事纠偏工作，而且很快使领导机构受到了这种压力。

领导机构派出的传达党员们所不能接受的口号的密使被当

作挑畔分子，有时甚至被当作“敌探”而受到悲剧性的惩罚。另外一些人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以欺骗性的国际妥协路线为原则的两面派手法来解决，于是就引用列宁的“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这句话，并以作伪组织的核心为借口而参加贝当的组织（主要是“法国军人团”）！

但是，党的基层组织倡议要把地下斗争从单纯的秘密宣传转到反对占领者的具体行动上去。

党员的地方性行动超出了中央指示的范围，给维希政府和占领军很大的威胁。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使得和解和妥协的一切幻想都归于破灭了。

逮捕事件和纳粹分子的公开暴行越来越频繁了。这些事实坚定了党员的立场，并且促使中央领导核心不能不考虑党的基层的新的思想情况。

一贯坚持原则的干部这时能够比较自由地在抗敌的道路上前进了，党所出版的材料也受到了这种情况的影响。

这些材料仍然不十分公开地攻击占领者，而是继续愚蠢地攻击戴高乐继续战斗的主张。但是，人们已经从中嗅到了重大政治转变的气息。

1940年10—11月间，几乎各地都散发了如下内容的传单：

“不要伦敦……也不要柏林！”

“《国民日报》拥护赖伐尔，吹捧贝当。英国领导人正在利用戴高乐和贾德鲁。

“只有共产党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战争挑拨者。

“打倒外国的走狗维希强盗！”

“法国属于法国人！拥护多列士执政！”

这份匿名传单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发出的。不仅中央的内部公报《党的生活》证实了这一点，南部地区秘密发行的《人道报》

1940年11月17日第八十二号^①上刊登了这份传单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地下党的领导似乎还在犹豫。1940年10月，維希政府让設在里翁的高等法院着手审判“战敗的責任者”——这对于一个效忠于駐扎在本国領土上的“战胜者”的政府來說，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执行莫里斯·多列士指示的领导小组虽然向党的基层反对納粹的压力作了让步，但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們对德苏条約的作用和有效期限所抱的斯大林式的幻想。这表现在它曾命令被監禁的共产党議員給貝当和高等法院院长写信，要求出庭作证，反对1939—1940年的前統治者勃魯姆、达拉第和雷諾。

应该指出弗朗索瓦·皮佑1940年12月19日写給貝当元帅的信在解释党的“官方”路綫上的某些分歧，因此我們把这封信全文轉录在这里：

“元帅先生：

“一年以前的今天，在我被預防拘留四十天之后，巴黎第三軍事法庭預审法官木瓦薩克上尉先生指控我有恢复被解散的共产主义同盟的罪。

“然而，这种指控的根据只是一个依法成立并得到众議院正式承認的議會党团的一件完全合法的文件——法国工农議會党团写給众議院議長先生的一封信。

“那些为維護当前制度的普遍利益而指使、执行或容忍逮捕我們的人(达拉第、埃灵將軍、各警察局长、各預审法官和第三軍事法庭庭长)都犯了瀆职罪。事实上，宣战时宪法就已經遭到侵犯，而在宣战几个星期之后，通过对我们議員資格的剝夺，宪法

^① 这一号《人道报》发表在《利木贊游击队画冊》的第3頁。

受到进一步的违反。当时的政府所以采取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违反 1939 年 9 月 26 日的政府命令）是因为它不敢说出审讯我们的真正理由。我们是唯一起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人。

“法国政府当时是为了进一步准备帝国主义战争才加紧迫害共产党，是为了更好地指挥这场战争才把几百万法国选民的代表关进监狱的。

“有些人现在竟然以和平人士的面目出现。他们当中有些人在 1939 年 9、10 月间，不论在众议院、参议院还是陆军部最高委员会和其他场合，都对崩溃一直保持缄默，所以他们，特别是那几个卖国求荣希望崩溃的人，对崩溃负有罪责。

“另一些人曾对我们说：‘你们说得对，但我们保持缄默是因为我们不願意进监狱。’

“最后，还有一些人曾经跟着猎狗一起嗥叫，他们口诛笔伐，把德国攻击得体无完肤。

“元帅先生，您在 1940 年 6 月 26 日声明中说过：‘我憎恨那些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灾难的谎言。’因此，为了消除某些谎言，希望您让全体法国人民都知道：

“一、工农议会党团 1939 年 10 月 1 日写给众议院议长的那封信；

“二、我们受审时的辩论记录和我在辩论结束时代表我的全体同志所宣读的声明。

“例如我们在这个声明中说过：‘我们受审，是因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竭力反对使我国受到严重危害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因为我们号召人民要求以和平结束战争；是因为我们向法国人民指出了使我国自由和幸福的道路。’^①

^① 見本书中譯本第 1 卷第 219 頁。——譯者

“其次我們談到：‘法國政府和它所代表的資本家企圖讓人們相信戰爭的責任是單方面的，他們自己不負任何責任，法國人民是為正義、自由和各國人民的獨立而戰的。這是謊言……戰爭的責任嗎？我們決不參加這種各國都企圖把戰爭的責任推給敵國政府的大騙局。在我國，戰爭的責任首先應該由前政府及其首腦达拉第先生來負，因為他把我國引向反人民而符合一小撮金融大亨的利益的道路。’

“再其次：‘人們所以把我們送上法庭，正是因為只有我們敢於號召人民罷免對戰爭負有主要責任並且在我國採取了反動恐怖手段的达拉第政府。

“‘那些在我國破壞了自由的人，怎麼竟大言不慚地說是為自由而戰呢？

“‘這樣的政府不代表國家，它只能依靠獨裁手段來維持……’

“當我受審的時候，我說過：‘這場戰爭將是法國的災難。打敗了，我們要當希特勒的奴隸，打勝了，我們就成為張伯倫的僕從。所以，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應該奉行法國的獨立政策——保住了蘇聯的和平的那種政策。’

“當我反對我國歷屆政府向英帝國主義屈服的時候，現任里翁高等法院代理檢察官的政府警察署長布呂贊竟讓庭長粗暴地打斷我的發言，並且以不准我參加辯論和加給我辱罵友邦的罪名來威脅我。

“喬治·絮阿雷先生在1940年11月30日的《畫報》（我們能夠看到的唯一報刊）上的一篇贊揚您的文章中寫道：‘戰爭是一種瘋狂的行為，九個月的無所作為是一種罪過。’

“在此期間，人們給全國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到處逮捕，到處審判，仿佛是以任意逮捕保衛過和平的人的手段來進行全國統

治的。

“但是，被監禁的是誰？被判罪的是誰？除開少數例外，直到現在還關在監獄或集中營里的不都是共產黨人嗎？雖然在停戰以後沒有再逮捕他們。

“我常常考慮，人們還能拿出什麼拙劣的新借口繼續關押他們呢？難道人們想把这些真正維護和平的人說成是主張戰爭的人，把这些真正維護法國獨立和各國人民友好的人先說成是德國的代理人然後再說成是英國的代理人嗎？

“元帥先生，要是您願意消除這些謊言，您就應該立即釋放共產黨人和唯一反對戰爭的議員們。

“在採取這個公正措施以前，至少應該讓他們享受到當前政治制度的好處，不要對他們玩弄卑鄙的伎倆，像最近發生的兩件事那樣：

“一、撤銷了上盧瓦爾省省長早已批准的接受食物包裹的許可；

“二、內政部長不准我的妻子（她住在被指定的住所）攜帶我的剛二十個月、從我被監禁以後一次還沒有見過的小女兒來探視我。

“既然人們對我們受審時所進行的秘密辯論一個字也沒有公布（在這些辯論中我們揭發了真正的戰爭販子），那麼我要求允許我像我所有的同志們一樣，以證人的身份在里翁高等法院出庭作證。

“請接受……”^①

所有其他被監禁的議員都以不同的形式寫了這樣的信，要求在維希政府里翁高等法院審訊达拉第、雷諾、甘末林等人時出

^① 弗朗索瓦·皮佑在1951年5月18日的《人道報》上承認他作過這種交涉。

庭作证，控訴他們。

敦促被監禁的共產黨議員出庭對那些根據貝當和賴伐爾的命令受審判的人去作证的指示，是于莉埃特·法戎送到浦伊監獄的。

當時有幾個議員被關在（德龍省）瓦郎斯拘留所里，他們為了同樣的目的寫信給貝當元帥，或者像呂西安·米多耳那樣寫信給里翁高等法院院長。這一事實清楚地證明，這是執行黨的書記處的決定。

錯誤在於人們不懂得已經不是揭露“慕尼黑分子”的時候了，現在群眾都認為里翁的被告們對維希政府採取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在這種時候讓共產黨人為維希投敵分子所操縱的一次審判去作不利於被告的証言，是群眾所不能理解的。

萊翁·勃魯姆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被告地位，推卸了他對人民陣綫的破裂和由此而產生的崩潰的責任，他說：“在這里的被告是共和國，而我們要始終作為共和國的保衛者堅守在自己的戰鬥崗位上。”

通過同占領者妥協來恢復合法地位的前景是一種解除武裝的幻想，這種幻想成了越來越多的黨員要把反法西斯鬥爭提高到具體行動水平的障礙。

這種曲解，這種毫無原則基礎的策略，使得那些支持或盲目服從這種策略的人對人民群眾日益壯大的反法西斯潮流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

當共產黨議員被解往阿爾及利亞監獄的時候，黨的領導機構印制了一種明信片，準備大批寄給希特勒駐維希傀儡政府的官方代表“奧托·阿貝茲大使先生閣下”。

下面是1941年5月間散發的明信片的全文（關於信中提到的加布里埃·佩里被捕的事情，後面再談）：

“大使先生：

“共产党議員由于反对战争和在 1939 年 10 月初提出过非經議會同意不得拒絕任何和平建議的要求，被判了共达数百年的徒刑，并且給他們扣上了德国代理人的帽子。

“其中有些人被关在梅宗卡雷監獄(阿尔及利亚)，并有放逐到撒哈拉腹地的危險，这些人是：

“巴雷尔、巴托利尼、貝諾瓦、貝尔利奧茲、皮佑、邦特、科尔納万、科松璫、科斯特、克里斯托夫尔、克罗瓦札、德姆苏瓦、法戎、加奥、格雷薩、拉雷普、勒維、洛茲雷、馬尔太耳、米多耳、莫盖、穆斯莫、帕蒂、普拉薩依、普罗、罗歇和图夏尔。

“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馬尔梯、蒙穆索、腊梅特、居約、狄戎、杜提叶耳、里加尔和梅尔西埃不得不从事地下活动，以便繼續完成人民对他們的委托。佩里和加特拉拉斯被关在桑第監獄。还有一些人，如格列尼埃和米歇尔被关在夏托布里昂集中营，让·勒諾和菲利波被关在克累尔沃，基内被关在一个拘留营里。

“这就是和平保卫者的处境，而那些責无旁貸的众議員和參議員由于保持緘默却照常領取十万七千法郎的年薪，达拉第、雷諾、曼代耳和勃魯姆等人則过着安閑自在的生活，等待着肯定会得到的自由。

“共产党議員引为光荣的是，他們为反对骯髒的凡尔賽条約进行了二十年的斗争，为反对占領萊因兰和魯尔进行了斗争，現在又因反对战争而被关进監獄。

“这是一件令人憤慨的、不公道的事，必須释放他們。

“大使先生，您應該作出努力，使他們立即获得释放。

“否則，人民就要起来讓他們恢复自由。”

这里，在用人民行动威胁这“最后一着”来要求希特勒占領

者駐維希代表予以释放的活动中，最离奇的无疑是下面这个事实：党和紅十字会的一些散发明信片的干部，鼓动党员和同情党的人签名，甚至让他们写上地址“来支持”他们的行动。

結果，在明信片上签名和散发請願明信片的人为这种倒霉的冒昧行动付出了自由甚至生命。

* * *

但是不久，在斗争的严酷现实面前，中央领导机构看出执行它的观望主义指示的党员越来越少，它再也不能阻止抵抗运动的潮流了。于是它不得不适应这个已经在党的工农基层扎了根的潮流。

一些写着“希特勒是欧洲的劊子手！”的标语，在祖国的中部，后来在首先诞生馬基游击队的利木贊出现了。在随便制成的传单和标语牌上的口号中，“打倒……”的字眼改成了“消灭……”。

迫害加剧了。1940年10月以后，格列尼埃、普耳馬尔希、格拉内、米歇尔、色馬尔、德洛内、摩維和党的其他许多干部连同许多党员都先后被捕。但是，迫害不仅远远没有能够阻止抗敌行动，反而扩大了这种行动，同时证明了，自由只能用夺取的手段得来。

例如，1940年11月11日，巴黎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他们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鼓动之下，向无名士兵墓献了花，表示对德国占领的抗議。希特勒分子用手枪和步枪射击他们，甚至在香榭丽舍架起了机枪。在“米米班松”舞厅前面，一个学生被一排子弹打中倒下。被杀害的第一批抗敌战士以他们的英勇牺牲的行动开辟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党的战区委员会在全国建立起来。党的十个战区控制着包

括所謂法国“自由”部分的南部地区各省。这些战区委员会有自己的干部(维克多·密肖、巴尔太耳〔别名让·香特隆〕、菲利克斯·加德拉斯、工会工作者杜盖、退伍军人内弗、青年共产党员若阿内斯、克劳迪娜·绍马、宣传顾问蒙穆索等等),有自己的地下印刷所,有协调行动和保证通讯的联络员。战区委员会同潜伏在巴黎地区的中央领导机构经常有联系。

包括被占领地区和禁区在内的北部地区也组织起来了。勒比埃尔、卡尔、洛瑟朗等人于1940年11月底在这里负责组织“特别组织”的第一批武装组。这只不过是一些为保护宣传员而建立的武装组,它还不是进行破坏或袭击的武装组。

中央领导机关不得不同意武装保护和建立防御组织的要求,但是它仍然反对“孤立行动”。

《党的生活》——中央新闻公报——1940年9月号不是曾经重申我们的目的仍旧是“摆脱非法地位”吗?

在这期《党的生活》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不应该仇恨德国士兵。我们所以有很多活动的可能性,是由于占领者的马虎对待。”

但是党员们再也不能等待了。

在利木赞,冈古安、雅凯和杜蒙建立了第一批武装行动组。在禁区诺尔省维米高原的高地爆发了头一批大爆破。该战区共产党的抗敌战士们在卡佩耳和德巴尔日的率领下炸毁了德军一个停车场。至此,党的领导机关再也不能不重视已经普遍展开的行动了。

1940年12月,领导机构出版了一本题为《共产党二十年》的纪念小册子,其中继续攻击了“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和维希政府,但终于也明确地指责了“柏林的主子们”。

小册子写道:“在1940年的法国,希姆莱是上帝,蒙面党人

佩魯通是他的先知！”

除了为 1939—1940 年的失敗主义政策辯护、反对“为世界准备了一个反动和压迫的未来”的英法帝国主义以外，还說，“我們以同样的理由，本着同样的热情同德帝国主义所代表的霸权政治进行斗争。

“我們反对任何帝国主义政府把绝对命令式的条约强加于人。

“我們生活在德国占领之下的法国人民，已经隐隐约约尝到納粹主义統治世界的滋味。这种統治违背我們的願望，它像过去英法帝国主义統治世界时一样：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殘酷的剝削，建立弱小民族給强大民族当奴隶的民族等級制度；在組織欧洲的借口下，使各国的生产屈从于强国的意志，大規模的移民将像畜群一样踏坏大陆上的道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被判罪、被关进監獄和集中营；人民政党被解散，自由工会被取締。德国无产者将在被禁錮的欧洲担任一个不太值得羨慕的守門犬的角色。

“共产党人像从前同穿燕尾服、戴高筒礼帽的帝国主义斗争一样，現在正同穿褐衫的帝国主义斗争。

“他們指出：昨天人們曾欺騙法国人民，說他們是为民主而战。今天人們又在欺騙德国人民，說他們是为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而战。”

这本标志着党在糾偏道路上有了决定性轉变的小册子，在結尾着重譴責了合作政策：“法国人民看到了所謂合作政策的結果。他們清楚地看到，胜利的德国片面决定并吞了阿尔薩斯—洛林，它的控制不仅在占领区，而且在全国越来越严，越来越苛；他們还看到，两百万法国俘虏作了人质，在有不断受轰炸危险的工厂里为德国战争作苦役，其他法国人遭受着将被拖入德国打英国的战争的直接威胁。我国人民不願充当正在角逐的任何帝

国主义的帮凶。”

政治方針有了相当大的轉变。劳动人民不会再有这样的印象：在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之中，共产党人“最喜欢”的是希特勒分子所奉行的帝国主义。

党自从回到正确的立場以后，更加强大了，党的宣传工作也比淪陷的最初几个月深入了。

因此，尽管党的领导由于形势极其复杂犯了一些錯誤，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式的无知也未能帮助認識这种錯誤，但是，党还是向着实际抵抗納粹占領者的道路迅速前进了。

第三章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誕生

1940年11月德国并吞阿尔薩斯，是促使地下党领导走上同希特勒分子进行比較公开比較直接的斗争的立場的因素之一，而在党的队伍中許多党员早就开始了这场斗争。

中央委员会在一篇声明中譴責了維希政府默不作声、听任占領者为所欲为的态度，同时援照德国革命者在1871年就同样的并吞提出的抗議，要求給阿尔薩斯和洛林的人民以自决权。

这篇声明連同一篇評論希特勒并吞摩泽尔流域洛林省的新步骤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40年12月的秘密《人道报》上。

本着革命的失敗主义精神，人們还反对了法西斯意大利对科西嘉·尼斯和突尼斯的野心：

“德国共产党人和意大利共产党人都反对这种兼并和征服的政策。”

“一切帝国主义者”，英国的，德国的，都是罪犯；号召“在各国人民友好的旗帜下”爭取独立。

1941年初发表的《給共产党员的信》，反对那些“打算让法国人給外国充当炮灰”的人的企图。

“爭夺資本主义世界統治的战争正在繼續，还看不出这场战争有短期結束的可能。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一方，以美国支持的英国为另一方的繼續搏斗，就目前来看，有在今后几个月中更加扩大的危險。因此，可能有人企图再一次把我們这个不幸的国家拖入帝国主义战争中去。叛徒多里奧和吉頓要法国人拷上

‘背包’去‘帮助德国’打英国，戴高乐的代理人则要法国人卖命去帮助英国打德国。

“共产党像过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样，反对任何让法国再投入帝国主义战争的企图。

“法国不是英国的自治領，也不是德国的保护国，法国属于法国人，这是千百万法国人的心願。我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来，团結起来，引导他們进行斗争。”^①

具有反法西斯思想并且看到当时正是納粹分子占領着法国的黨員們，竭尽全力来反对占領者，而不再坚持攻击英国以及在伦敦鼓吹抗敌的人。

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在意識形态方面展开了斗争，人們公开散发传单和进行讲演，为第一批武装队的行动开辟道路。

事实上，武装队是在为保护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語的人以及党的报告員和联络員而成立的自卫小組的基础上产生的。

党的地下领导仍然打算保持“平衡”和不損害德苏条約的生命力。所以，它还在自己出版和发行的一些秘密文件中一再强调听信号召继续抗击納粹德国的“戴高乐將軍和英国金融代理人的話”的危險。

1941年1月的秘密《人道报》上有这样几段話：

“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宣布，他要把为自由而战的全体法国人团結起来。可是，这位先生曾經是甘末林、魏刚和其他伪善的將軍們所組成的参謀部的一員，他們这伙人虽然很了解当时的兵力，却还要把士兵們送进屠宰場。

“戴高乐在英国作了英国貴族和銀行家的反动政府的盟友，

^① 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到过这封信。印了五万份。

他正在那里继续操他的旧业。”

1941年2月中的一号秘密《人道报》指出：

“戴高乐希望英帝国主义胜利，因为这符合他个人的利益。”

最后，1941年3月18日，《人道报》纪念巴黎公社的专号上，登载了由雅克·杜克洛和莫里斯·多列士签署的一项声明（莫里斯·多列士的名字是由别人代签的，因为他和让纳特·维美徐当时正在莫斯科），声明依然坚持这样的宣传：

“戴高乐和拉米纳之流的彻头彻尾的反动和反民主的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在英国获胜的情况下剥夺我国的一切自由。”

在同一时期，由雅克·杜克洛署名的一本小册子谴责美国对英国的物质援助。这位地下党的书记在这本以《美帝国主义与世界战争》为题的小册子中写道：

“我们必须弄清楚：那个来自大西洋彼岸，披着钢甲，动员本国公民为战争而劳动，它的飞机划破欧洲天空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着托拉斯的极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权力。投入战场的是寡头政治的几个家族的独裁统治。”

由此可见，尽管纳粹分子正在进行掠夺、吞并和勒索，党中央领导核心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当时世界战争中的行动所采取的方针，依然受着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临时条约的错误影响。他们决不该忘记这个条约是由希特勒提出的。

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顽固立场是：只求在法国实现和平，而不是在交战国之间进行选择！

诚然，戴高乐所发起的运动本质上是反共反人民的，并且实际上是为大资本家的利益首先是英国的利益服务的。但是，这个运动已经得到仇恨占领者、感到失败之耻的广大人民阶层的

响应。对于倾向“伦敦的人们”的爱国潮流估计不足，是一个严重错误。

2月底，莫里斯·多列士从苏联寄来了一篇庄严的号召书的文稿，为了能够以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发，雅克·杜克洛向地下领导机构的几名委员即支持当时政治路线的那些人读了这篇东西，却没有征求已经组织抗敌斗争的干部们的意见。

这篇号召书的题目是《拯救法国人民》，地下领导机构把它印了二十万份。为了便于了解散发这份号召书时（1941年3月）的局势，有必要多摘录其中的几段：

“对维希和巴黎的那群政客极为蔑视的法国人民，既不愿替英国充当炮灰，也不愿替德国充当炮灰，既不愿为丘吉尔卖命，也不愿为希特勒卖命；法国人民不愿给以任何面貌出现的财阀政治卖命。

“法国人民要和平。法国人民希望国土能够得到解放，希望被俘的儿子们能够得到释放。从1940年6月底停战协定签订以来，法国人民已向占领者付出高达七百三十亿法郎的巨款；不仅如此，法国人民还看到，胜利者违反停战条款，并吞了阿尔萨斯—洛林，他们非但没有征求当地人民的意见，反而把当地人民大量地驱赶出来；法国人民看到，法国领土被割裂成两部分，随后占领区又被割裂成两部分。这一切成了解决我国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的额外障碍。

“法国人民要结束这一切，他们摒弃形形色色好战分子的一切号召。

“不，法国人民不愿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希望同所有国家，同各国人民建立和平关系。

“此外，法国人民认为，同强大的苏维埃国家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

但是，鉴于維希政府不可能也不願意制定同苏联建立牢固的友好的政策，号召书提出下述解决办法：

“共产党人要告訴工人、农民、中产階級、知識分子和所有不願当奴隶的法国人：我們号召你們为之献出全部力量、全部智慧和全部信心的那个任务，就是有系統地組織一条广泛的斗争陣綫，以便筹划每天的行动和群众运动，通过群众运动来消灭維希资本主义集团，让人民当家作主即**建立人民政府**。”

共产党所提出的法国人民政府的綱領是什么呢？

“对 外 政 策：

“一、解放国土和释放战俘。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人民政府将竭尽全力同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和平关系；它要依靠法国人民的信任、其他各国人民的同情和苏联的友誼所給予它的力量。

“二、通过宣揚共产党人和法国人民在反对凡尔賽条約、反对占領魯尔矿区、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所采取过的行动，建立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三、同苏联簽訂一項友好同盟条約和一項貿易协定，并且坚决遵循旨在使法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的和平政策。

“四、宣布給予少数民族、殖民地、托管地和保护国的人民以独立权和自决权。人民政府要宣揚苏联已經做出的在各民族完全独立和权利絕對平等的情况下团结起来的榜样。

“五、人民政府要废除在它成立之前簽訂的、违背自己所奉行的和平和民族独立政策原則的一切公开或秘密的协定。

“国内政策：

“为了清除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毒害，必須：

“无偿地把銀行、保險公司、矿山、铁路以及亚利安人和犹太人的所有资本主义公司（电力、化学产品、紡織、冶金、煤气等……）收归国有。

“由工人、农民和平民代表組成委员会，审查所有战争交易；沒收所有的战争利潤，并在当事人的住处张贴布告，說明沒收的款額和財產被沒收者的姓名。

“剝夺资本主义公司的經理和大股东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問其宗教信仰和种族如何。

“为了防止資本家成立利益联盟的任何企图，取消資本家的結社权，违者严惩。

“調查登記大資本家（亚利安人和犹太人）的財富，以便征收或沒收，用以滿足劳动群众的迫切需要。

“为了使劳动人民在国家中享有应有的地位，必須：

“恢复产业工人、商业工人、农业工人和公务人員的工会权利。

“恢复工人报刊的出版自由。

“恢复被資本家政府撤职的那些由工人选出的工会干部的职权。

“恢复由选举产生的工人代表的职权。

“給工会組織以会址。

“介紹职业的組織必須接受工人工会的監督。

“規定与生活費用相适应的工資。

“按照集体合同的条件让失业者恢复工作并立即毫无例外

地发给所有失业者一笔相当于生活所必需的最低工资的津贴。

“立即为年老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店员等)建立相当于生活所必需的最低工资的养老金。

“在工人工会的监督之下改革社会保险,以便保证每个公民在患病和丧失工作能力时的生活。

“实行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除非所有失业者完全恢复了工作,不得无故增加工时。

“建立全体劳动人民假期工资照付制度。

“通过选举代表的办法让工人参加国有化工厂的管理工作。

“为了法国农民,必须:

“没收资本家的大地产,由农业工人和中、小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把土地分配给农业工人和中、小农。

“取消农民和农业工人欠大地主、银行家和高利贷者的一切债务。

“按产值规定农产品的价格,以保证农民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取消资本主义的中间人——昂贵生活制造者的中间剥削。”

这个纲领还提到:

“把为战争服务的工厂改成农具制造厂。

“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

“把大商店收归国有。

“没收私人旅馆和资本家的大房产,分配给劳动者家庭居住。

“禁止教会办教育,取消私立学校,等等。”

这个纲领实际上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纲领。

实行这个纲领就意味着建立法国人民民主制度。

但是,号召书依然坚持以前确定的立场,即要求在里翁审判前统治者的时候让共产党议员出庭作证。

号召书中有一整項完全是这个要求：

“为了审判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必須：

“由工人、农民、退伍軍人和被监禁的爱国人士組成一个最高人民法庭，审判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

“一、共和国前总统(勒伯伦)；

“二、前参議院和众議院議長(让內和赫里欧)；

“三、1933年以后历届內閣总理(保罗·彭古、薩罗、肖湯、弗兰亭、賴伐尔、勃魯姆、达拉第、保罗·雷諾)；

“四、1933年以后历任国防部(陆軍部、空軍部、海軍部)部长：达拉第、法布里上校、莫兰將軍、貝当元帅、皮埃尔·科特、吉·拉·尚布尔、德南將軍、馬賽尔·戴亚、康潘希等等……；

“五、前外交部长(龐奈、賴伐尔、戴尔博、弗兰亭)；

“六、支持达拉第一雷諾战争政策的众議員和参議員；

“七、怀着削弱法国和准备法国失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反苏战争宣传的新聞記者、国家官員和暗藏的代理人；

“八、甘末林將軍、魏刚將軍和1933年以后历届陆海空軍各部的最高委員會委員；

“九、在停战协定以后出卖法国利益、破坏社会自由、无耻地为了托拉斯利益和資本主义寡头政治的利益而牺牲民族利益的政府、政客和新聞記者。

“公布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责任的人的一切材料。”

地下共产党提出的这些“要求”并没有使那些納粹领导人感到多么不高兴，虽然他們正在“懲罰”由于遭受他們一系列的侵略而犯了向他們宣战的过错的法国。这些要求等于为德国納粹分子开脫罪責，因为它毫不含糊地单单指出1933年即希特勒上台那一年以后法国資產阶级领导人和政客的“好战”罪行。

但是，党的领导既然是在国家处于希特勒軍隊占領之下发

出呼吁法国人民夺取政权的号召，那么它打算怎样实现这个号召？依靠哪些同盟者？

号召书說，“法国男女同胞們，不管你們是誰，不論你們以前是跟着社会党走的，是追随激进党的，还是跟随天主教团体或其他团体的（因为你們确曾认为那里有打倒垄断資本家的手段），共产党都向你們呼吁，同时也向你們——过去在法国总工会里追随对无穷的灾难負有責任的伯兰、石鳥之流的工人們呼吁。

“你們大家要一步一步地进行斗争；不要一味暗中哀叹时代的不幸，或者只在心里咒罵应对发动战争承担責任的人。

“德国的伟大詩人哥德說过：‘行动才是开始。’你們未来的解放的开始，只能是我们大家的行动。千万不要忘記，你們的局部斗争，甚至是目标最小的斗争，都能使人民群众的組織日益增强，使人民群众对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越来越大。

“在全国各地，从法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人民都要提出恢复权利的要求；公民都要求自己应得的权利，对于敗坏我国荣誉的可耻的剝削的制度的任何打击都会加速这种制度的崩潰。

“如同小溪能汇聚成汹涌的大河，小規模的要求恢复权利的斗争同样能酿成大規模的社会斗争，并且将由此誕生人民共和国，誕生新的法国，摆脱資本主义剝削的法国，人人有面包、自由和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法国。”

但是，在这个篇幅很长、对許多点作了明确闡述的綱領中絲毫沒有談到，在希特勒軍隊占領着我国的情况下，人民如何能够从一些細小的恢复权利的要求着手夺取政权。

号召也絲毫沒有談到如何赶走占領者和如何解放国土。

充其量我們只能从这个《拯救法国人民》的号召书的末尾作几点推論，号召书的結尾是这样写的：

“法国人民，

“你們解放自己的武器就在你們自己手里；你們團結和战斗，才能得救，才能在擺脫了資本主义統治的欧洲把我国变成一个自由、强大和幸福的法国。”

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国际方針，它的实现显然是以欧洲所有国家同时得到成功为前提的。

依照号召书中所闡明的綱領，要把法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須使德国人民也擺脫他們的希特勒主子的奴役。

这条路綫无疑是斯大林强加給共产国际的，因为它是根据斯大林对德苏条約的观点和他所設想的結果（帝国主义交战国两敗俱伤）而提出的，这条路綫是想在另一种形式下繼續“法国无产者同德国无产者兄弟合作”的路綫，但是沒有同时提出同占領軍斗争的具体口号。

在当时，任何批評都未能消除斯大林的幻想和这些幻想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因为还必须同时駁倒产生这种幻想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斯大林的設計，英国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将是一个使法国社会主义化和使共产党掌握政权成为不可能的历史进程。

假使人們預見到希特勒不久就侵略苏联的話，显然路綫和策略是会不同的。

值得庆幸的是，很多沒有受斯大林的幻想影响并深知自己所联系的群众的心情的党员，通过反法西斯的行动已經为后来的武装斗争作了准备。

战斗特別組織（主要是在青年战斗营的推动之下），不仅保护了党的宣传員和散发員，还建立了自己的武器儲藏所。

1941年3月，南部地区地下党領導的二十五名委員（其中包括让·香特隆〔又名巴尔太耳〕、亨利·內佛、太尔內等人）的被捕，又引起了一場震惊，并且波及北部地区。于是各地都加强了

安全措施，提高了警惕。

南斯拉夫对德宣战以后，1941年3月27日，示威群众在馬賽的卡內比埃尔大街正中，在标志着亚历山大国王^①遇刺地点的石板上放了鮮花。

1941年4月，加布里埃·佩里的一篇一針見血的文告《不，納粹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突然出現了。

加布里埃·佩里是預料到德苏之間必然爆发战争、主张进行反納粹斗争的人之一，他在这篇文告里詳尽說明了什么是正确的道路。

佩里对奥托·阿貝茲这个納粹間諜、在慕尼黑时期进行間諜活动的第五纵队的头子作了猛烈的抨击，可以看出，他决不贊成借口这个間諜現在当了希特勒駐維希大使就让人寄明信片要求他释放被监禁的共产党員的那些人。

莫里斯·多列士的《拯救法国人民》的号召书对法国资产阶级統治者和政論家們的責任最远追溯到1933年，即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那一年，佩里的追述要远得多，他闡述了納粹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同时指出反对可耻的凡尔賽条約的斗争不过是一个虛伪的借口。

加布里埃·佩里用下面的話譴責了希特勒分子所玩弄的伎倆：

“他們向顛栗不安的德国人民群眾說，外国資本主义是主要的敌人，因为它把不合理的凡尔賽条約强加給了德国，它从德国人民身上榨取了用以支付巨額賠款的重稅，等等。

“因此，必須打倒国际資本主义！”

^① 指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re I, 1888—1934)，1921—1934年的南斯拉夫国王。1934年10月9日，和法国外交部长巴尔杜在馬賽一同被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德意法西斯特务暗杀。——譯者

“这是博取負外債的人、梦想重新武装和德国复仇的人以及憎恨資本主义剝削的人一致鼓掌欢迎的狡猾演說。

“1918年的胜利者所奉行的无理性的政策給这种宣传提供了宝贵的援助。

“有一些做法，像 1923 年占領魯尔的行动，給納粹的煽动宣传帮了大忙。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来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世界各国无产者同情的德国人民对凡尔賽强制条約的斗争，一經納粹党垄断，就被引导到**侵略性的沙文主义**方向去了。

“群众反对資本主义的正当愤怒，由于国社党的魔法而变成了一场反对凡尔賽条約的斗争，随后又变成了对爭夺世界霸权战争的激烈煽动。”

加布里埃·佩里用納粹分子蓄謀侵略因而負主要責任的論点，代替了地下党领导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該打五十大板”的論点。

佩里对于党的宣传所沒有坚决反对的排犹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在指出排犹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救命草”之后，他提出了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同前一个月散发的“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书含含糊糊提出的办法不同，他写道：

“法国人民，敌人的代理人要把你們綁在納粹侵略者的战車上；他們要你們当国社党德国的奴隶和炮灰。这些自称是你們的朋友的恶棍不准許你們有别的命运，只准許你們有当納粹奴才的命运。

“共产党人决不会让你们走这种絕路。他們說过，你們的得救不会从希特勒的胜利中来，而是从法国的解放中来。共产党人为把国土从納粹占領下解放出来，为改变人民群众的命运而斗争，而不是像一些呆在溫泉城市或栖身于秘密警察中的‘革命者’那样，希望‘卐’字旗到处飄揚。”

佩里通过对納粹“元首”的抨击，給所有昧着良心和理智服从一个最高領袖的人上了絕好的一課。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是这样的人：

“他們歌頌領袖的原則。但是，他們的領袖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些領袖是由誰指定的呢？他們有什么职权呢？他們是另外一些領袖指定的，是从独裁者所寵信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然后再把他們集中在一座宮殿或是首領（德国人对領袖的称呼）訓練所去，他們在那里学习发号施令和馴服別人。于是，一个特权阶层，一个首領王朝就形成了，这些首領和最高元首共同支配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未来。

“我們共产党的領導人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选出的。他們不是由一个參謀部指定。他們由战友們选举。根据什么标准选举呢？根据他們对人民事业的忠誠、他們同群众的紧密联系、他們自己辨别方向和担当責任的能力以及他們的紀律性。

“同‘首領’不同，共产党的領導人不享有任何特权，更确切地說，他們的唯一特权是承担最艰巨、最危險的任务。共产党領導人决不說自己有决定人民命运的权利，而是宣布人民的命运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共产党决不叫法国人民依靠某些人物的天才和权威，而是号召人民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加布里埃·佩里明确指出，“迷信領袖”的目的就是让人接受一种强加于人的、剝夺人民最高权利的权威，給那些盲目的領導人上了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反对个人迷信的第一課。

当时正是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不顾一切地”把不理解德苏条約的人和“不守紀律、批評地下領導小組的口号的人驅逐出去”的时期。在絕对服从由多列士迅速传达过来的斯大林命令的那一小撮領導人看来，加布里埃·佩里是一个危險的“目无紀律的

人”。

別名阿尔芒的埃尔芒·貝尔太耳告发了加布里埃·佩里。他是被杜克洛选拔为干部負責人的莫里斯·特雷昂的助手，莫里斯·特雷昂曾为《人道报》在納粹审核下复刊而同占領者“首領們”进行过交涉。

1941年5月18日，当加布里埃·佩里留宿在安德烈·香特隆家里的时候，他俩一起被捕了。

加布里埃·佩里被捕发生在紅十字会和共产党让人们向“法国駐巴黎占領当局的大使德·布里农先生閣下”投递明信片要求释放共产党人的时期，这确是一场灾难。既然这场灾难是由曾經負責为《人道报》在納粹审核下复刊进行交涉的一个干部負責人的直接助手告发而引起的，那么問題就特別清楚了，党总有一天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

但是，良种发芽是很快的。如果說“官方”路綫在这个时期沒有得到支持，那么各地发出的战斗口号却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为解放祖国的領土和改善劳动人民的命运而斗争”，就是諾尔和加来海峡两省的矿工在加布里埃·佩里的小册子出版后不到一个月所做的事情。他們响应党的号召，发动了占領时期的第一次大罢工。运动的負責人內斯托尔·卡洛納和奥古斯特·勒克尔在卡佩耳和德巴尔日领导的头一批武装小组的保护之下散发了很多号召书，1941年5月15日，有十万“煤黑子”不顾占領軍对“禁区”內各矿山的控制，举行了罢工。

罢工持續着。5月27日，一度停息的罢工运动又在貝頓附近的杜尔日各矿山爆发。5月31日，扩大到庫里埃尔。1941年6月7日，罢工蔓延到整个矿区。

紅旗在变压器和废矿堆上飄揚。在布律埃，有一个工程师看到罢工者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后仍不复工，奇怪地問道：

“你們已經像你們所要求的那樣，有了肥皂，有了面包，還要什麼呢？”

矿工回答說：“槍！”

游行队伍走遍了工人住宅区，同荷枪实弹并装着刺刀的貝当宪兵和納粹宪兵发生了冲突。人們接受了教訓，开始建立武器、給养和炸药貯藏所。

1941年6月20日，秘密《人道报》向那些以实际行动使党采取另一条政治“路綫”的人致敬。但是，《人道报》在这样做的同时又提出了它那“帝国主义都有責任”的口号，它写道：

“所有并肩战斗的人，你們要保持团結，你們說得很对，我們共同的得救不在于一个帝国主义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胜利。”

請允許作者再強調一下，这一号秘密《人道报》的日期是1941年6月20日。

在党的領導要求参加罢工反对納粹帝国主义占領的人不要把自己得救寄托在英帝国主义胜利上，这个“提示”发出了两天之后，希特勒的軍隊进攻了苏联，于是在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苏联变成了帝国主义英国的盟国。

領導核心的第一个反应是驚訝，他們的表述使人完全看清楚了过去任何人都无权討論的斯大林的幻想政策。

在1941年6月22日的《人道报》上，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說法：

“當我們获悉德苏之間的战争爆发这个令人痛心的消息时，这一号《人道报》已經完全排好版了。在这种痛苦的时刻，使我們感到安慰的是，我們伟大的領袖斯大林曾經尽力避免这样一場战争。

“在最近，即4月10日，由貿易人民委員、我們的米高揚同志代表苏联在莫斯科簽訂了一項协定，在已經答应的数量之外，

再卖给德国一百万吨石油。在政治方面，德国军队刚一赶走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傀儡政府，斯大林也就赶走了这两国的外交代表。

“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片面撕毁了1939年8月签订的德苏友好条约！”

“他应该承担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全部责任！是他一个人破坏了斯大林坚决而忠实地奉行的德苏友好政策。希特勒自取灭亡！现在红军有权利发言了！”

斯大林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他在1941年7月3日发表的历史性演说中谈到：

“法西斯德国突然背信弃义破坏了它同苏联所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①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5日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特别报告中指出，斯大林不相信德苏条约会严重破裂。

在这篇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到，斯大林非但没有作保卫苏联领土的准备，而且否认希特勒威胁的存在并反对在国境线上构筑防御工事：

“在希特勒军队进犯苏联之前，后来在前线牺牲了的基辅军区司令科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报告德国军队驻扎在布格河，正做进攻的准备，可能短期就要进犯。他建议组织强大的防御，把边境地区的三十万人撤走，并在这些地区构筑几个包括反坦克壕、士兵掩体的强大据点。

“莫斯科对这个建议的答复是：这可能成为一种挑衅，不必在边境构筑预备性的防御工事，以免德国人有任何一点对我们

^① 参阅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13页。——译者

采取軍事行动的借口。結果，我們的边境就沒有反击敌人的充分准备。”

赫魯曉夫引用了丘吉尔 1941 年 4 月 18 日給斯大林的一份着重談到德国軍隊重新在欧洲东部集結的通知。

赫魯曉夫一方面明确指出丘吉尔这样做不是出于他对苏联的友誼，而是怀着德苏之間发生一場血战从而使英帝国主义在战后得到加强的不可告人的希望。同时指出：

“斯大林不重視这个通知”，反而“指示不要相信这类通知，以免引起軍事行动的发动”。

“我們應該肯定，我們也早就从自己的軍事和外交部門获悉了有关德軍侵略苏联領土的威胁方面的情报。但是，由于人們知道最高当局无視这类通知，所以只好心怀恐惧地用一些保留說法提出这些事实。”

当攻击令下达到納粹軍隊以后，德国战争机器开动前一小时，国防軍士兵、德国工人威廉·舒茨跳进桑河，虽然他被本連其他士兵开枪打伤了，終於到达苏联这边的河岸，发出了他为之牺牲了生命的警告：“一个小时以后……战争”。他白白地牺牲了，人們沒有相信他。^①

赫魯曉夫在二十大的这个报告中还談到：

“当法西斯軍隊实际上侵入苏联領土，軍事行动正在进行的时候，莫斯科下令不向德軍还击。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不顾明显的事实，认为战争还没有开始，这只不过是几个不守紀律的德軍士兵的挑衅行动，我們还击可能給德国人提供进行战争的借口。”^②

① 普·杜朗的叙述，載 1961 年 6 月 18 日《人道报星期刊》。

② 赫魯曉夫先生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这个报告的全文将在《法国共产党史》第 3 卷发表。

不管当时的情况如何，苏联的参战毕竟使得法国劳动人民和法国共产党人感到松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有了重新建立起来的平衡。共产党员又回到正常的岗位上，明确而有纪律地进行反对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此外，这种正义的斗争还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国际主义的支持。

丘吉尔和罗斯福支持苏联的声明，战争的性质改变了，由于苏联出现在反纳粹阵营的最前列，这场战争就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民主力量反法西斯侵略的世界战争。

由于党领导在事态发展的影响下改变了方针，同党内先进的抗敌战区委员会的党员们站到同样的战斗立场上来，党立刻又团结起来了。

放弃了四十八小时以前单方面对“伦敦金融中心的戴高乐分子”和“企图奴役法国的英帝国主义”进行的辱骂，而发表了赞扬伦敦的爱国者和英国“盟友”的文章和声明。

从此以后，共产党各抗敌小组、各种抗敌运动和戴高乐派的通讯网之间实现了合作和联盟。

斯大林发表演说以后不久，首先在圣太田出现的“红军万岁”的标语就贴遍全国各地的墙上。1941年7月14日，在巴黎的林荫大道上，在拉丁区和许多城市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真正的爱国游行队伍。

暗中破坏活动的范围扩大了。从个别的主动行动变成了普遍的口号。从袭击德国的军火库到炸翻它们的军用列车；接着是伏击纳粹国防军的巡逻队。

在通过矿工罢工而建立了公开抗敌的第一道战线的北方各省，纳粹分遣队遭到了手榴弹的猛烈袭击。

第一批义勇军游击队在诺尔省和巴黎突击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起来，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各地

便組成了許多游击队伍。

在武器方面，除了基层組織的一些从密室里走出来的有远見战士所收集和精心儲存的武器之外，还有以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在博韦，街道上的一場激烈射击，揭开了日后战斗的序幕。

除了共产党之外，工会运动、后来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监督下由让·普隆托领导的爱国青年联盟、法国妇女联合会、退伍軍人运动等，在行动中开始把以前都是零散的武装运动組織到一起。

1941年7月31日，在无产階級巴黎的別利維尔爆发了大規模的群众示威。北方各省在5—6月份举行罢工的人采取了另一种活动形式：为了阻止德国的給养和軍用列車通过，他們开始破坏煤矿和铁路。

原来拟定得不明确的民族陣綫口号有了实现的可能。1941年7月，在占領区成立了民族陣綫組織秘密委员会。

它立刻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号召：

“一、不让法国的資源为德国战争机器服务；

“二、不让法国的工厂为希特勒生产；支持通过保卫自己和孩子們的面包来为法国事业服务的工人們爭取切身权利的斗争；

“三、不让我們的铁路把我国財富和我国工业产品运往德国；

“四、組織农民抗拒向祖国的压迫者交納农产品；

“五、組織反对希特勒—維希迫害的斗争；民族陣綫中的每个战士，不論无神論者还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論激进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应该得到全民的支持；

“六、散发民族陣綫的著作、呼吁书和文件，系統地揭露敌人

的謊言；

“七、为了对付侵略者及其走狗，要宣传和激励爱国热情和为解放法国而斗争的意志。”

在党的保卫“特别组织”的武装小组基础上诞生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所参加的民族阵线，很快就在遭受占领者压迫的饥饿的法国人民当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说明在德国进攻苏联时法国人民担负着多大赋税，只要提一下法国人民当时要“维持”四百万德国士兵和行政官员的生活就够了，为此，不仅国家供应部门要征集大量物资，人民还要缴纳一笔每天达五亿 1940 年法郎的捐税。

由于对苏联发动了战争，驻法的纳粹军队数目减少了，但“课税”仍然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这项“税收”的总额相当于 1938 年法国正常预算的三倍。

因此，普遍的不满推动了反对占领者的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展开武装斗争把占领者赶出法国的号召。此外，由于一部分占领军开往苏联前线，抗敌运动容易开展了，群众对最后胜利的信心有了增强，因为现在苏联也在同希特勒作战了。

第四章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襲击

在德国侵略苏联初期,由于苏联沒有准备(这是对这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决定拥有绝对权力的斯大林的騙人幻想所造成的),納粹軍隊像他們在欧洲各国进行閃电战时一样,进展得很順利。仅仅二十天的時間,苏联国境綫就被全面突破。

前面提到的尼·赫魯曉夫向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在談到这个問題时說:

“从战争一开始,刚刚打了几天,敌人就在我国边境地区毁灭了我們的大部分空軍、炮兵和其他軍事装备。敌人消灭了我們許多軍事干部,使我們的參謀部陷于混乱。这样一来,我們就无法阻擋敌人深入我国内地。”

赫魯曉夫认为斯大林应負的責任并不仅仅是在技术上沒有准备,因为他还說:

“这些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在战争最初几天)是由于斯大林在1937至1941年間清洗政治工作人員所造成的。在这几年中,对某些軍事干部,从营連級指揮官到最高軍事部門实行了迫害。在这个时期,曾經在西班牙和远东获得軍事經驗的將領几乎全部被清洗了。对軍事干部的这种大規模迫害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是破坏紀律。因为在許多年中,人們在党内和共青团的支部里教育各級軍官甚至士兵要把他們的上級当作暗藏的敌人来‘揭发’。”

貝当派投敌分子的宣传机构利用希特勒軍隊輕而易举地深

入苏联境内的情況，急忙預言苏联不久就要崩潰，竭力瓦解劳动人民的斗志。

維希政府只知阿諛逢迎，甚至协助建立反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法国志願軍团”。这个軍团于1941年8月成立，准备同苏联作战并“分享德国的胜利”。

这支雇佣軍穿着带有三色徽章的希特勒軍装。

維希政府不仅屈从于希特勒，而且屈从于希特勒的盟国，例如他在7月28日把印度支那交給了日本人。面对着这个反人民政权所奉行的卖国政策，义勇軍游击队扩大并加强了自己的活动。

在劳动人民积极“串通”和配合之下，破坏的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直接攻击占领軍的战斗頻繁起来了。

皮埃尔·乔治——众所周知的費边上校——用一支从德国兵手里夺得的手枪，在巴尔貝斯—罗舍舒阿尔地下火車站打死了德国海軍士官生莫泽尔。

占领者立即要求維希政府頒布一項特別法令，把共产党人送交特別法庭受审。按照納粹的指示，必須在8月28日即莫泽尔士官生出殯那一天，枪毙六名共产党員，虽然这六个人是在皮埃尔·乔治枪击事件发生以前很久被监禁的。貝当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为了掩盖他的卑鄙行徑，他更改了这项法令的頒布日期，硬說这个8月24日頒布的法令是8月13日即巴尔貝斯地下火車站枪击事件发生以前就制訂了的。

但是，蓬勃发展的抵抗运动和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活动，在群众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下依然不断取得进展。

这种进展使得維希分子大为恐慌，他們感觉到人心之所向越来越有利于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便痛罵“共产党恐怖分子”，同时硬說任何赶走占领者的企图都注定要失敗，要人們提防“瘋

狂行为的不幸后果”。

除了这种忍受和屈从的宣传以外，占领者还施展恐怖手段，居然采取了处死人质的作法。

占领者要求成立一个有权宣判死刑的法国特别法庭，作为对1941年8月12日和13日的示威游行以及游击队员皮埃尔·乔治(费边)的枪击事件的反击。

8月27日，该法庭宣布了第一批判决：几个人被罚做苦役，三个人被判处死刑。

第二天早晨，年轻的马塞隆、果太罗和提斯泽耳芒被枪毙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立即用传单和小册子宣布，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必须清算纳粹分子这三件罪行。但是，占领者觉得已经作出的“惩罚”还不够，他们要求再把包括地下党中央委员让·加特拉斯在内的其他被判刑人也处死。不到一个月，占领军的要求就得到了满足！

1941年8月29日，德军司令部把第一号黑字红字布告《AVIS-BEKANNT-MACHUNG》^①在法国张贴出来：

“韦索中尉艾蒂安·多尔夫伯爵；

“商业代理人莫里斯—夏尔—埃米耳·巴尔利埃；

“商人让—路易·多尔尼克；

“上列三人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已被枪决。”

在参加抵抗运动的第一批死难烈士中，除了共产党人之外，还有一些爱国人士。面临着这些事实，伦敦抵抗系统的领导人戴高乐采取了什么立场呢？他在1941年8月23日以“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名义发表的文告中说：

“法国人杀死德国人是绝对正当的，绝对正确的。但是，战

^① AVIS 是法文，黑色字；BEKANNT-MACHUNG 是德文，红色字。意思都是布告。——译者

爭有一个战略。法国人的战争必须由负有这种责任的人来指挥，就是说，必须由我本人和民族委员会来指挥。国内外的战斗人员都必须严格服从命令。

“据此，我给占领区的命令是，目前不要在那里杀德国人。

“这样做的唯一但十分正确的理由是：目前极容易引起敌人采取屠杀我们的战斗人员和暂时没有武器的战斗人员的手段来进行反击。”

渴望着独揽对敌斗争全部领导权、不要任何群众运动的戴高乐，就这样把纳粹迫害的责任推到义勇军游击队身上了，殊不知他这种论调实际上与维希的责难毫无区别。

义勇军游击队不仅没向来自两方面的想使他们放弃对敌采取直接行动的温情主义的要挟屈服，反而更广泛地执行了当时的口号：“扰乱占领者，不给他们以任何喘息机会。”

工人不是都能识别党秘密散发的文件的，为了欺骗他们，维希政府也找到了一小撮叛徒。

这一小撮叛徒加入了叛徒马赛尔·吉顿叛党时建立的“法国工农党”，他们在贝当和希特勒的授意之下，专门从事蛊惑宣传，以要求恢复权利的口号掩盖他们无耻的反共主张。

他们当中有一些害怕坐牢而叛党的议员：卡普龙、克拉马姆、布鲁、帕尔萨、瓦拉、皮洛、皮吉尼埃、里果、布律诺、德韦、富里埃、富夏尔、雅尔东，还有几个同类的“工会运动者”：布尔訥通、贝腊尔、夏珀兰、韦克斯滕等……

他们在德国宣传部门同意之下，于1941年9月4日发表了《给共产党员工人的公开信》。就在这同一天，共产党地下出版物的巴黎负责人布勒歇被维希法庭判处死刑。

不到一个星期，法国工农党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马赛尔·吉顿被一个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小组打死了；蒙特勒伊的前共

产党员市长苏普受到惩罚，变成了残废；《工人生活报》的前主编克勒芒用他的生命抵偿了他所犯下的叛变罪行。人民和它的党进行的这种自卫是完全正当的。

但是，应该谴责的是一些草率的处决和一些从肉体上消灭丝毫没有背叛自己的理想或没有参加反共组织的党员的号召。难道我们能够认为这种“拿着武器”审讯被揭发的在党内而不是在党外进行私人谈话时批评过德苏条约的党员的号召是正确的吗？难道我们能够赞成这种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不同意在德国侵略苏联之前发出的一些违反常情的指示而且从1941年7月就渴望回到他们从未背叛过的党内自己战斗岗位上的人的命令吗？

地下党领导自己虽然迫于形势回到正常的立场上，改变了党的方针，却没有原谅敢于批评斯大林1940年的指示是错误的或不能接受的人们。

纳粹的发言人、党卫军的头子迪特里希过早地发出了胜利的叫嚣，庆祝“苏俄被消灭”。他没有想到苏联军队的抵抗会得到纳粹军队的后方，纳粹军队占领的广大地区内游击队积极活动的大力支援，也没有想到俄罗斯的严冬会成为苏联军队反击侵略者的盟友。

此后同苏联游击队、红军、红军的一些新盟军采取共同行动的义勇军游击队和其他抵抗组织的战斗十倍地加强了：高压线塔被炸毁，列车被炸翻，粮食仓库被夺取。战士们在战斗中取得武器和给养。占领军的军官们受到袭击却抓不到袭击者，纳粹分子气得暴跳如雷。维希政府受命从监狱里向纳粹分子提供人质，无疑维希政府要挑选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在这种战争中是最积极的。

1941年10月20日，“南特要地”的警备司令霍耳兹中校被

打死。馮·施托普納格怒不可遏，決定處死五十名人質作為報復。

不久就有四十八人被殺害，其中十六人於10月21日死在南特；10月22日有五人死在巴黎，二十七人死在夏托布里昂。

巴黎的共產黨議員夏爾·米歇爾、化學產品工會領導人普耳馬爾希、五金工人工會領導人讓一皮埃爾·坦博、紙張和硬紙板業工會領導人戴濟雷·格拉內、小學教師巴爾托利、醫生特寧、惹納維利埃市長格朗代耳、奧弗雷、特利埃、加爾代特、十七歲的青年大學生居伊·莫蓋以及其他許多英雄，在劊子手面前都毫無懼色，從容就義，他們知道，這些劊子手將來一定會被打垮的。

一個10月屠殺的目擊者（後來他在1941年12月15日也被槍殺）留下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紀事，敘述了在夏托布里昂遭到殺害的人在最後時刻的情況。

這篇紀事是以這樣的題目秘密發表的：

《法國人看一看吧：經貝當—達爾朗—浦舍集團指定，根據馮·施托普納格命令，在1941年10月22日槍殺的二十七名人質是怎樣就義的》。下面是其中的幾段：

“十四時，二十七名人質被關在6號牢房里。凱里韋耳得到允許向同他一樣被關在集中營里的妻子告別。人們交給他們每人一張紙和一個信封寫遺言。憲兵和當局把這間牢房包圍起來。門窗都用靠在板壁上的床封閉住。

“我們在‘19號牢房’注視着表上每一分鐘的走動，不用提有多麼緊張和焦灼了。

“本堂神甫應當局的邀請來到了集中營。有先見之明的夏托布里昂本堂神甫，借口集中營不屬他的本堂區沒有來。同意來的是比爾本堂神甫。沒有一個‘被判刑人’接受他的宗教上的

帮助。但有几个人托他带出一些东西或信件。

“本堂神甫在准许他的时间的最后几分钟——十四点五十五分左右，走出6号牢房。

“十四点三十分。解运我们同志们的德国卡车从路上驶来。忽然，‘被判刑人’放开喉咙高声唱起《马赛曲》。P1号营的同志们也应声合唱起来。

“十五时。开来的卡车停在6号牢房前面。一个中尉打开了牢门，开始最后一次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走上前去。

“他们依次被宪兵们搜查；口袋掏空了，双手绑起来，然后依次登上指定的卡车，每辆车九个人。

“《马赛曲》的歌声越来越响，响彻整个集中营，后来又回荡在大路上。

“我们在窗口望着自己的同志们，他们向我们示意告别。多么令人痛心的时刻啊。

“特宁质问德国军官说：

“‘对法国人来说，死在德国的子弹下是光荣的！’

“接着，他指着刚满十七岁的莫盖说：

“‘杀死一个孩子是罪恶！’

“‘不要这样说！特宁。我同你是一样的共产主义者。’年轻的居伊回答道。

“十五点二十五分。卡车要开了。顿日中尉和德国军官互相行礼和握手。宪兵们僵直地立正站着。看到我们的朋友们的这种英勇姿态，所有的人都哭了……汽车开走了。我们心痛欲裂，拳头握得紧紧的。我们激动到了极点。

“过了几分钟，我们眼看着汽车在大路上滚动，把我们的同志带向他们的归宿。我们的朋友们的歌声更响亮了。他们昂然无畏，尽情高唱《马赛曲》的不朽歌段。

“有人告訴我們，他們將在十六點十五分被槍決。後來，我們聽說，行刑的地点在离夏托布里昂两公里的一个沙石場上。我們走出自己的牢房，一起走进六号牢房。我們的同志們用强有力的手在牆壁上写出了自己最后的想法、希望和对未来的不可动搖的信心。

“十六點十五分。举行了英雄的点名仪式。每个营都集合起来，由一个同志呼唤烈士的名字。

“‘被枪杀了！’每呼唤一个烈士的名字就有一个被监禁的人这样回答。

“夜幕降临了。我得到了关于这件惨案的第一批消息。我們的朋友們在通过夏托布里昂时不停地高唱《馬賽曲》。一路都有人向他們脫帽致敬。全市感动到了极点。沙石場附近的农庄居民都被关在家里，禁止外出。

“10月23日，星期四。中午。德国司令部的一个軍官来通知頓日中尉，說不再从这个集中营里提取人质了。

“‘法国共产党人是勇敢的人！’他在我們的朋友們的英雄行为面前不得不承认說。

“10月24日，星期五。我們同志們的遺体入殮。夏托布里昂市政府不同意用柏木棺材，由于它的照料，人們用橡木棺材装殮了烈士的遺体。

“10月26日，星期日。有五千多人到这个沙石場凭吊。多么激动人心的場面啊！多么伟大的发自全体法国人民內心的尊敬和同情啊！”

后来，还有一些证人談到这次屠杀。人們才知道，五金工人工会领导人三十七岁的皮埃尔·坦博曾經在行刑队面前高呼：“德国共产党万岁！”

面对着德国士兵的枪口，这个口号具有多么伟大的国际意

义……

战士们意識到，他們的斗争是反对世界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組成部分，也是帮助遭受侵略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一种手段。

斯大林在 1941 年 11 月 7 日的演說中，对苏联紅軍和游击队员們說道：

“全世界都望着你們，认定你們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者匪軍的力量。陷在德国侵略者枷鎖下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望着你們，认定你們是他們的解放者。伟大的解放使命落到了你們的肩上。要不愧为这个使命的担負者呵！”^①

由于目标的一致，为解放国土进行具体斗争的人們很快就接近起来。1941 年 10 月 31 日，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了举行五分钟总罢工的号召。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响应了这个口号，要求劳动人民在这天十六点到十六点五分停止工作，表示紀念在南特和夏托布里昂被枪杀的烈士們。

以后，代表地下共产党领导和义勇軍游击队到伦敦参加戴高乐参謀部的費尔南·格列尼埃，就是从夏托布里昂集中营逃出来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

另一个从夏托布里昂逃出来的欧仁·埃納夫，与萊翁·摩維共同致力于編組“游击队”的工作，他作了游击队司令杜蒙的政治委員。杜蒙以前是西班牙国际纵队第十四国际旅的领导人，又是一个以工会干部馬賽尔·保罗和国际旅前委員皮埃尔·勒比埃尔为主要成員的参謀部的领导人。

“青年战斗营”的政治委員是从奥地利斯塔拉格战俘营逃出来的阿耳貝尔·烏祖利阿，軍事领导人是皮埃尔·乔治——費

^① 斯大林：《論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36 頁。

边。他的參謀部还有几个受过考驗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例如达涅尔·加桑諾瓦和馬賽尔·貝尔托諾等。

此外，还有一个称作“国际工人运动”的組織，由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位中央委員領導。

后来，这些不同的战斗組織都并入“特別組織”，并且在夏尔·狄戎的領導下于1941年底統一了行动。当时同夏尔·狄戎一起工作的有政治委員埃納夫、軍事委員腊烏耳·沃累，副政治委員烏祖利阿。在这个參謀部里乔治·拜耶負責技术問題方面的工作。这个參謀部在1942年初成为义勇軍游击队的集中組織以前領導着一些叫做“特別工作队”的武装队。

于是，包括副政治委員勒內·康凡在內的同样的干部，又在同杜克洛—弗拉商書記处有直接联系的夏尔·狄戎的領導下，成立了义勇軍游击队全国軍事委員會。几个月之后，一个因年老被德国战俘营释放出来的軍官馬賽尔·普勒南参加了这个參謀部，担任軍事參謀。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全国軍事委員會着手訓練参加进来的战士们，教会他們使用武器和运用爆炸物，掌握游击战的要領和游击队的战略。在共产党倡議下誕生的、初期主要是由革命工人組織起来的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很快就吸收了农民、知識分子和干部，从而成了新法国的象征。

1941年11月11日，在巴黎凱旋門廣場和外省許多地方的烈士紀念建筑物前面举行了新的爱国示威游行。号召进行积极抵抗的小册子的散发量增多了，新生力量的吸收随之扩大，由于殘酷迫害而殘废了的战士有了接班人。同納粹分子的期望相反，他們屠杀人质的做法並沒有把法国人民吓倒，他們只是起了动員更多的新的坚决的战士起来战斗的作用。

* * *

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击了集結在珍珠港进行演习的美国海軍，把美国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希特勒主义又多了一个敌人。

希特勒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可怕的俄罗斯的“冬將軍”（过去拿破侖一世也忽略了这个人）也来支援在苏联淪陷地区騷扰納粹軍隊的游击队和在大反攻之前把对手阻擋在道越来越坚固的战綫上的紅軍。

希特勒分子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們就更加猖狂起来。

希特勒的軍隊由于在被占領的整个欧洲到处受威胁，到处挨打，便采取了恐怖手段。他們在巴黎和里尔处决了一些新的人质。

1941年12月16日，維希政府把根据1939年逮捕状逮捕的“违反禁止共产党法令犯”加布里埃·佩里交給希特勒分子，希特勒分子在蒙瓦累廉把他枪杀了。

在临刑之前，加布里埃·佩里用得到的信紙信封写了遺言。

下面是他的遺书：

“星期日，二十点。

“歇尔希米迪監獄的指导神甫来通知我，我即将作为人质被枪决。

“我恳求你們向歇尔希米迪監獄要回我留下的东西。我的一些文稿可能有留作紀念的意义。

“希望我的同志們知道，我始終忠于我的終身理想；希望我的同胞們知道，我即将为法国的生存而死。

“我作了最后一次反省：我是毫无錯誤的。这一点我希望你們向周圍的人說明白。假如我还能有第二次生命的話，我仍然要走同样的道路。

“昨夜我反复想了很久，我亲爱的瓦揚·古久里說的完全正

确：共产主义是世界的青春，它創造着美好的明天。

“我即将为美好的明天作出貢獻。

“当然，我完全是因为以馬賽尔·加香作为导师才如此勇敢地迎接死亡的。

“永別了，法国万岁！

加布里埃”

在最后的时刻，有两个“密使”（其中之一证实是党的叛徒貝尔通律师）来到牢房劝誘等待就义的加布里埃·佩里：只要他写了悔过书，就能保证他平安无事。佩里輕蔑地把他們斥責出去。

同一天，呂西恩·桑佩在岡市被处决。維希政府和納粹分子处死这两个英勇的編輯，无疑是想打击党的报纸《人道报》。

人們印刷和散发了十万份《哀悼加布里埃·佩里和呂西恩·桑佩的信》。地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篇为他們报仇的文告散发了十五万份。印刷的、油印的、打字和抄录的《人道报》的一些专号，都宣布了这个消息，并号召加强行动。其中載有加布里埃·佩里传记的专号是1942年初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达到当时出版的秘密文件的最高印刷量：一百万份。

处决，远远沒有把抵抗战士吓倒，反而激起了他們强烈的憤慨，十倍地加强了武装行动。因为他們要为新的死难者报仇……

除了对德軍輜重、武器、給养的仓库和列車进行直接破坏之外，在为占領者工作的企业里，特别是軍事工业中，破坏活动也越来越多。一些传单向劳动人民闡明了为什么“消磨一分钟，破坏一个零件就能救一条人命”。

五金工人学会了拧松哪个螺栓来破坏一个齿輪的咬合。人們要铁路工人“在給車箱上油的时候掺上砂子”。人們向罐頭工厂的工人說明了“在罐頭盒上凿一个針眼的作用”。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口号提出之后，占领者的生命变得朝不保夕了。由于各被占领地区不断出现为支援苏联战斗部队而发动的袭击，占领军兵力减少了，他们的困难加大了。第一年德国士兵按照“元首”向占领法国的部队下达的采取“感化”策略的指示而装出的笑脸，现在换成了仇视的态度，他们知道，大多数人民是见了他们的服装就咒骂的。

1942年3月9日，纳粹分子枪杀了费边游击队的七名战士，事实上承认了义勇军游击队的存在。

* * *

希特勒原打算六个月解决的战争已经拖延到隆冬，甚至是否能在1942年结束战争也没有把握。因为苏联这个巨人越来越强大了……

纳粹参谋部曾经动员全部德国壮丁，同时还从被吞并的阿尔萨斯和波兰征召了所谓德裔男子入伍，展开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企图一举侵占莫斯科，但是这次进攻在它兵临莫斯科城下并且庆祝胜利的时候被挫败了。

为了填补这次大规模的征召而在德国工厂和农田里造成的真空，德国当局向各个被占领国家发出了志愿劳动的号召。

在法国，除了极少数流浪者、冒险分子和一些渴望暂时找个避难地的被控告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响应这种号召。于是帝国采用了欺骗伎俩，以“替换”法国战俘作为感情诱饵，说什么有三个劳动者应征就释放一个战俘。尽管维希政府开动宣传机器予以支持，这个企图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于是纳粹分子索凯尔便受命建立义务劳动局，实行强迫征召。

征调法国工厂的职工到德国去，实行“劳工流放”的时代就要开始了。逃避这种劳动成了一项国民义务。

纳粹分子给法国壮丁摆出两种抉择：或者是被流放到德国

工厂里去，或者是逃走过非法的生活。这样一来，納粹分子无意中就参加了建立抵抗运动的馬基游击队根据地的的工作。抗拒到德国去做苦工而投奔游击队的人群一周比一周多。

甚至在賴伐尔頒布义务劳动局的法令以前，一些青年馬基游击队就成立了。

在利木贊，在格勒諾布尔地区，首先是在惹尼西阿附近，后来慢慢地在“反抗分子”和重新集結的抵抗战士可以藏身的山林里，都有了馬基游击队。在城市里直接受到迫害威胁的人，被敌人发现了的或者受到严重伤亡的抵抗組織战士，也参加了馬基游击队。

監獄里从来沒有像这个时候这样拥挤。巴黎桑第監獄里，原供一千犯人住的监舍，現在监禁了四千人。据官方消息，从1940年3月到1942年3月，政治犯的数目已經由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八万人（其中有三万人是未决的行政拘留犯）。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战士们向那些被警察追踪准备送往德国或監獄里的人指出了馬基游击队的道路。馬基游击队武装起来了。这样，人們很快就由零星的襲击发展成为真正的集体武装战斗，一个新的斗争阶段开始了。

妇女在义勇軍游击队中的作用也有重大意义。她們寻找失掉联系的单独活动的战士。她們担任联络工作，传递公文，运送經費，有时甚至运送武器。在发生逮捕嫌疑犯的情况时，她們担任調查、警戒和預先报警等工作。同时，她們还照顾被捕的同志和他們的家属，照顾烈士們留下的寡妇和孤儿。

在許許多多事例中，埃米蓮娜·莫尔提的事例足以說明妇女們的活动。她在埃南利埃塔尔被捕之后，想到同志们要来到这里也会落入陷阱。她掙脫了警察的手，逃了出去。她终于碰

見了德巴尔日，通知他在他当天晚上要主持的一次會議的地方已被設下了埋伏。埃米蓮娜再次被捕之后，被押到德国，用斧头斬首。义勇軍游击队里有几百名妇女由于参加这种可歌可泣的战斗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些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盟軍粉碎德国的人散布等待主义，他們指望依靠美国的威力，在他們看来，美国的力量决定着一切。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机关报《法兰西第一》反駁道：

“不！对于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各国人民來說，战争法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侵略者赶出去！

“享有瓦耳米光荣的法国不应该等待別人来解放，应该尽快地对胜利做出自己的貢獻。

“法国应该通过战斗来解放自己。

“法国如果不把学会按照本国游击队的榜样从压迫者手中夺取武器、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人民的力量投入到反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中去，它就不会在光荣中取得自由。”^①

这个正确的思想激励了为了使法国自己解放自己而入伍的体力劳动者和知識分子。大規模的战斗在酝酿着。

^① 《法兰西第一》，1942年2月号。

第五章

1942年——决定性考驗的一年

1942年1月6日，苏联政府向同苏联保持外交关系的各国发出了一份“照会”。

苏联通过这个照会請求世界各国負起自己的責任，向它們揭露了納粹軍隊所犯下的罪行和暴行：瘋狂屠殺、破壞、死亡營，仅仅在利沃夫一个城市就屠殺了六千人。这些冷酷狠毒的屠殺駭人听闻！

“一个嬰兒被一刺刀扎死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十二岁的儿童被用来当作他們练习射击的靶子。在基輔組織的一次有計劃的屠殺中，有五万二千人被杀害。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也有犹太人。”

照会最后呼吁人們进行无情的战争：

“德国軍隊不仅是同苏联軍隊作战，而且是甚至主要是同和平居民作战。必須打倒纵容和命令进行这种罪行的万恶政府。

“苏联政府宣布，苏联的斗争是一场维护人权和自由的斗争，而且不仅是维护苏联人民的斗争，也是维护受希特勒德国压迫的各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的斗争。不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斗争决不停止。”

1942年1月13日，盟国签署了一项声明，作为对这个照会的答复，声明把以下的内容列为战争的主要目标：“惩罚实行监禁和集体驅逐人民、处决人质和进行屠殺的罪犯或責任者，不論他們在这些勾当中是发布命令的、亲自动手的还是参与其事

的。”

地下党中央委员会抓住红军建军第二十四周年的机会，在1942年2月的《人道报》上发出号召，要求法国人民团结到以义勇军游击队为行动力量的为法国独立而斗争的民族阵线各委员会中来，以便打倒希特勒的残暴统治。

在标题是《行动才能使我们得救》的一段中明确地提出了当时的目标：

“在红军英雄榜样的鼓舞下，所有法国人都应该准备投入解放我们国家的战斗。全体法国人都应该用自己每天的行动来加速解放时刻的到来。

“为此必须：

“一、工人要通过一切手段，包括罢工在内，来加强争取切身利益的斗争；要全体加入工会，扩大破坏供给德国人的一切产品；

“二、农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收获物隐藏起来，直接卖给法国人，采取一切办法阻止德国人拿走法国的农产品。

“三、爱国人士应该同停战军队中的士兵、下级军官和军官建立友好的接触，以便在他们中间发展爱国思想和增加对压迫者及其维希走狗的仇恨；

“四、法国青年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拒绝执行德国人所强加的罪恶的愚民和奴化教育计划；不仅如此，还要在青年中间发扬对祖国的热爱和增加对压迫者及其走狗的仇恨。

“五、法国的家庭主妇和妈妈们应该采取坚决行动，阻止德国鬼子和投敌分子掠夺法国和抢走我们的孩子们的口粮；她们应该在行动中学习塞特的妇女们的榜样。塞特的妇女们在地中海这个港口的码头工人的帮助下，在一艘从阿尔及利亚开来的船上抢走了德国鬼子刚刚征来的粮食。

“六、爱国人士应该就地援助和支持由他们当中最坚决和最勇敢的人组织起来准备随时同压迫者及其代理人进行战斗的义勇军游击队。

“七、把‘为法国独立而斗争的民族阵线’委员会在法国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兄弟般团结的爱国者们要随时随地检举应受人民惩罚的叛徒和间谍，要肩并肩地起来反对为德国法西斯分子服务的内战集团。

“八、法国青年要在各地积极进行争取面包、争取劳动权、争取就业权和争取前途等切身利益的斗争；法国各地的男女青年要成立一个反对祖国的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强大的法国青年爱国阵线。

“如果我们对红军做出的光荣伟大榜样只从道理上表示赞赏，那我们将是不幸的。

“在正上演的决定世界命运的大悲剧中，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演员：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从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拯救出来。”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秘密机关报《前卫》周刊响应了党的号召，并且宣布：

“在这场烧遍我们星球的大战中，有两个对峙的集团。一方面是为独立自由而战的文明国家，另一方面是想把世界投进愚昧深渊、阻止进步、使各国人民沦为奴隶的暴君集团。

“苏联、英国和美国将战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将是反强暴的胜利。”

德国人要求的并希维希同意的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引起了法国的普遍震惊。党员们很快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曾经在失败的绝望中迷信过贝当元帅的威望、认为他是在同敌人玩弄诡计的人民的支持。

党的口号后来在国内许多地方实现了。主妇们支持义勇军游击队活动的运动继塞特之后，又在蒙彼利埃、貝耳福尔和巴黎等地爆发。

这里，一队人到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儲煤場搶走了当时十分缺乏的煤；那里，一个小队襲击了投敌分子同他們的占領者朋友們正开怀暢飲的酒吧間；“非配售品”的食粮被分散了；万人唾罵的奸商眼看着自己宝贵的商店后院存貨被搶光，让一无所有的母亲們均分了。

游击队的战斗越来越頻繁，人們給予战士們直接的支持。大多数市政府里都有一些爱国者設法給弄到伪身份证和供应证。小农們也拿出自己的产品来供应战士——“馬基游击队员”。

在拒絕給予这种必要的支持的地方，义勇军游击队就自己搞人們所不肯供給的东西。他們拿着武器夺取敌伪市长或拥护貝当的农民所拒絕支援的供应品和成袋的土豆。

随着同情有組織的抵抗运动的趋势的加强，納粹的迫害也加剧了。維希当局撕下溫情主义的面具，对納粹的迫害做出了罪恶的貢獻。

党的前总書記、法国总工会的書記皮埃尔·色馬尔就在这种情况下被交給了納粹分子，并在1942年3月7日被枪杀。

1942年春天，占領当局要求法国提供的粮食必須增加一倍，此外还要向他們提供三万节貨車車皮、一千台机車和两千五百公里铁軌，这些铁軌須从法国拆下来运到德国去。它还强迫供給二十万吨的法国商船或封鎖在地中海各港口的中立国家商船。

党的宣传和行动有力地打击了納粹分子对法国加紧掠夺的活动。

散发了大量的传单，要求生产者保护自己的收获物，要求消

費者夺取准备供給占領者的小麦。

这些传单說明了：最近口粮定量特别是每日面包定量的降低，并不是因为收成不好，而是因为占領者征收的数量增多了；小麦的收成比原規定的口粮量多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公担。既然博納富部长硬說要“接上口”还短少五百万公担小麦，那就表明有三千到三千三百万公担小麦“不翼而飞”了。

向法国人民說明面包定量是能够增加的，那就是叫他們起来反对饥荒的真正責任者。所有传单的結尾都号召人民进行以民族独立为先决条件的爭取面包、和平和自由的爱国斗争。

秘密出版的《工人生活报》还号召工人参加到維希当局“允許存在”的工会里去，以便在那里掀起爭取切身利益的斗争。

《工人生活报》回答那些对参加貝当派工会的前途感到耽心的人們說：

“在工会领导机构中，有不少人过去充滿幻想，而在现实的教育下对事情有了比較正确的了解。

“法西斯分子企图通过保留一个他們竭力使之放弃自己历史使命的合法組織来进行欺騙。我們則應該利用这个合法的形式来組織斗争。工会是一回事，变节的领导人是另一回事。

“你們参加工会吧，你們将会看到，尽管工会有几个叛徒从中阻撓，却是可能进行活动的。”

实际上，工会活动起来了，有时甚至进行了罢工。

在知識分子方面，有一些值得欽佩的工作組繼續着由郎之万教授的女婿雅克·薩洛蒙从1940年10月就开始了的动員任务。薩洛蒙曾經在德庫尔德芒舍（他的化名雅克·德庫尔更为人所熟知）、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乔治·波利塞尔、皮埃尔·莫舍腊和郎之万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出版了《自由大学》。

雅克·德庫尔还在1941年2月出版过《自由思想》。在这个

地下印刷所被秘密警察破获之后，他就筹备出版《法兰西文学》，《法兰西文学》创刊号于1942年9月出版。

多么可惜！它的创办人在为它找到支持、征到文章并筹备了散发工作之后便牺牲了。雅克·德库尔先遭到德国人逮捕，后来在1942年5月30日被枪杀。

负责党中央联络工作的阿尔图尔·达利戴，地下党的组织书记菲利克斯·加德拉斯也都倒在同一个纳粹执行队的枪弹之下。

两天以前，纳粹分子在蒙瓦累廉枪杀了两名英勇的共产党员：大学教授雅克·萨洛蒙和乔治·波利塞尔，这表明他们多么重视共产党知识分子在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活动及其影响。

《法兰西文学》继续执行着自己的使命，所有的抵抗战士都背熟了保罗·艾吕雅的自由诗篇和“忿怒的弗朗索瓦”的论文。“忿怒的弗朗索瓦”的真名是路易·阿拉贡，当时他避难于维尔纳夫—勒—阿维尼翁，同抗敌出版商皮埃尔·塞格尔在一起。

还出现一些“子夜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在敌人占领期间表现出超人想像的本领，竟然秘密出版了三十三部著作，其中有英勇的非共产党人抵抗战士维尔高尔写的令人难忘的《海的沉默》。

占领者意识到各阶层人民对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仇恨，他们就只好施展一个办法：加剧迫害。

面对着正在扩大的报复行动，有些人就起来响应伦敦的命令，对处决人质会引起人民起来反对义勇军游击队表示担心。

夏尔·德巴尔日在“日记”里提到1942年4月11日晚上的事情，当他建议袭击一个德国哨所时，他听到抵抗运动的某些同志回答说：

“如果我们干掉纳粹分子，他们就会枪毙我们在监狱里的同

志。”

“好吧！”德巴尔日反駁道，“咱們看看到底誰先屈服，是納粹分子還是我們。在塞扎琳橋下有两个哨所。願意去的，跟我走，不然我就一個人去”。

其他人都跟着他参加了这次战斗，結果打死打伤德軍各兩名。

由此可見，在党中央領導机构中的一个派別同在“民族陣綫”旗帜下組織在一起的抵抗运动、义勇軍游击队或馬基游击队的共产党员战士之間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虽然形势逼着人們建立馬基游击队，而領導机构对这个問題即使不說是持反对的态度，也是长期抱着怀疑态度。領導不仅坚持只增加城市义勇軍游击队的武装队伍，同时还硬性限制党的干部和战士在义勇軍游击队武装队伍中不得超过20%。

地下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同地区委員，特别是南部地区委員，在談到最大的馬基游击队之一的組織者岡古安的时候說：

“这是一个生活在树林里的瘋子！”

义勇軍游击队參謀部一致同意把各个队伍都集中到山林里，以便准备大規模的襲击。馬基游击队和义勇軍游击队考虑到即将到来的解放斗争，考虑到那些在哨兵保护下安全进行訓練的部队对最后战斗所能作出的貢獻。

但是，日益发展的馬基游击队必須防止靜待抵抗或消极抵抗的危險傾向。馬基游击队必須把軍事訓練和理論教育同具体有效而又能鼓舞士气的战斗結合起来。

他們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为了保证和保护自己安全而使自己脫离群众和避免同敌人接触。

科雷茲和利木贊的馬基游击队员很清楚这一点，他們經常出击，小則在某些市鎮(于塞耳、梅馬克等地)公开散发传单，大

則有破壞蒙屠佩工厂冶炉的軍事行动。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用加强必要的游击战，来反对由伦敦建立的仅限于“收集情报”的秘密軍和小資产階級抵抗組織的等待主义。

他們指出，要想有效地参加即将到来的起义，必須在不停的战斗中鍛炼自己。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地下机关报《法兰西第一》于1942年5月又一次談到了这个問題：

“敌人和投敌的殘忍成性的胆小鬼們的恐怖力量，正是由于我們的忍耐和等待外来的奇迹而纵容起来的。就法国的利益來說，必須首先在法国进行战斗。一个决心要生存和战斗的民族永远比劊子手强大。”

为了在法国强制实行德国人民已經嚐到的同样恐怖政策，納粹分子决定，占領区的全体犹太人都必須在衣服上佩戴一个黄星。

維希政府无耻地遵照了德国制訂的《犹太人法令》的条款，于1941年7月22日頒布了《法国法令》。虽然当时貝当的負責“犹太人問題”的总监克薩維埃·瓦拉坚决保证“犹太人不必为他們的生命財產担心”，犹太退伍軍人还可以得到一些特別照顾，但是，他却下令让今后将成为“少数民族”的全体犹太人进行登記。

实际上，这次調查登記为实行佩戴黄星的法令、沒收财产和随后的大規模流放作好了准备。

然而，种族主义的宣传的确也欺騙了一部分輿論。貝当的部长狡猾地先建立了一个外国犹太人（1936年1月1日以后迁入法国的犹太人）的拘留营。由于还存在旧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人們对这种措施並沒有引起多大反感，因为受到打击的是一

些“外国人”，一些“新近”迁入的移民。

认真研究地下共产党在占领时期所出版的一些文件就可以看出，在最初两年，我党保卫受希特勒种族主义迫害的人的行动是不够的。

在这方面，荷兰抵抗组织做出了卓越的榜样，它要求所有的爱国者打起大卫的黄星旗，以此表示对被罚佩戴这种符号的犹太人的支持。

* * *

1942年5月标志着疯狂迫害的一年，它的第一阶段的排犹迫害只不过是一个方面。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把一个月倒在纳粹分子枪弹下的几百名共产党员一一提到。单单提一下像加德拉斯、波利塞尔、达利戴、索洛蒙这样一些最为人所熟悉的人，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一排排倒下去的那些英雄牺牲的价值较小。拿下塞纳省（今塞纳海濱省）抵抗运动所受的駭人听闻的迫害来说，当皮康·安德烈于5月23日在蒙瓦累廉壕沟里倒下的时候，纳粹分子仅在他从事活动地区的马罗默一个县就杀害了巴尔代耳、布里厄、杜弗洛、貝累、勒瓦塞尔……等三十五名爱国者，全县的市镇没有一个不治丧的。

作为对这种迫害的反击，参加抵抗运动的妇女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把1942年5月30日的母亲节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全国抗议日。所有的理由都被利用上了，如反对配给脂肪不及时，反对只有有钱人才能接近的黑市。

妇女们的呼声响彻巴黎郊区。在尼姆、塞特、蒙彼利埃等地肉店空空的公共市场上，妇女们也要求供应养活她们孩子的东西。

第二天，5月31日，主妇们在安德烈·戴耳马和馬德萊娜·馬尔臧的率领下闯进了巴黎市中心的布錫大街。这里有一

些供应納粹軍人的埃科大商店。妇女們依靠义勇軍游击队的保护，搶走了許多粮食，装走了一籃又一籃的罐頭。当时有馬德萊娜·馬尔臧、安德烈·戴耳馬、默尼埃和勒弗布尔四个党员被捕，都被判处死刑。

过了不到两个月，戴耳馬、默尼埃和勒弗布尔三个人被斬首。馬德萊娜·馬尔臧改判为終身苦役刑，后来借义勇軍游击队一次勇敢襲击的机会逃了出来。

安德烈·戴耳馬在他留下的一封遺书中写道：

“在宣布判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发抖，那就是审判长……”

各抵抗組織之間商定，一致发出号召：1942年7月14日在各市鎮的主要場所举行群众示威。

在巴黎、馬賽、里昂、里尔、圣太田、阿維尼翁、罗昂、克勒蒙菲朗、昂貝里厄和埃克斯等地，游行群众在市政府和县政府門前示威。传单越来越公开地散布起来。

希特勒再一次懲罰了他的傳統的替罪羊——以色列人，企图以此昭示于众，强施恐怖。

7月21日和22日，法国警察遵照納粹分子的命令在占領区逮捕了两万名犹太人。

“自由”区的警察也为討好敌人另外逮捕了一万零四百一十名犹太人，并把他們移交給德国人，关在集中营里，等待着流放。

有四千名两岁到十二岁被迫离开父母的犹太儿童送到德朗錫，关在可容納一百名“犯人”的“集体监舍”里，他們由于每天只吃白菜湯，都病倒了。几天之后，这些无辜的儿童便被堆积在車厢里运到德国的焚尸炉那里去了。

《人道报》对这种罪行提出了强烈的抗議。

但是，流放和处决并没有能够阻止抗敌行动。納粹分子确实害怕哪里有食物就到哪里拿取的妇女运动，他們曾經认为处

决布錫街事件的三名党员以后就不会再鬧这种事情。然而，1942年8月1日，主妇們突然襲击了达盖尔街的菲利克斯·波坦的一家支店。当看守这类商店的員当警察出面干涉时，担任保卫工作的义勇軍游击队反击了他們，打死了一个开枪协助法国警察的德国兵。

战斗在到处蔓延。为了阻止这种蔓延，占領者在8月12日又枪杀了九十三名人质。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战士“从黑屋子走上自己的崗位”。从監獄里逃出来的人又归了队，重新投入战斗。乔治·谷尼欧和另外十八名党员在铁刺网下面挖通一条地道，从这条地道“离开了”貢比涅(康边)的魯瓦雅利厄集中营。其中之一，党总书记的兄弟路易·多列士不幸又被捕，并被枪杀。

发表在1942年8月号《法兰西第一》上的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第十号公报，对于过去半个月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总结报道：

“在7月后半月，法国义勇軍游击队着重襲击了敌人的运输。特别是在費尔太—苏—惹阿尔、默伦、瑟堡、布賴、楓丹白露、阿腊斯、格勒茲、奥斯特尔利茲等車站附近，炸翻列車很多。炸毀滿載着德国器材的八十多节車皮和五台機車。在阿希埃(諾尔省)，炸翻了滿載从东綫开到法国来休整的士兵的七个車厢。摧毀了許多地区的变压器和信号箱，破坏了六十八节車厢和四台機車。

“在夏特罗附近，炸毀了两个铁路高压綫塔。在貝臧松附近，一个游击分队用手榴弹向一队德軍发动了突然襲击，毙伤德軍四十二人。在巴黎帕提梅納日街，一顆手榴弹投中了一个德軍分队。在翁热，全部焚毀了停在那里的八辆大卡車上的汽油和托德式包裹。德国人对此把哨兵枪毙了。

“在巴黎，襲击并搗毀了五个德国人办的‘职业介紹所’。公

开捉拿招募法国工人的人。在諾尔省，打死了三个招工的人。在塞納—馬恩省，处决了一个軍人团的軍官。

“在里昂車站，用燃燒瓶燒毀了德國人办的交易所，在巴黎第十九区燒毀了一个合成汽油實驗室。

“在默尔特—摩泽尔省和安納省，燒毀了一些很大的儲草場。在四个省里燒掉了許多儲备冬季搭营棚的木料的倉庫。伊夫里的一个灯泡厂和佩雷尔大街的一个机动車停車場被燒毀。据证实，C. I. B. 的大火使德國人損失了价值二千五百万的貴重器材。

“在諾尔省，破坏了一个水閘。由于敌人极力用平底駁船来克服运输上的困难，船夫們就意識到給敌人运貨的危險。有二百五十名被解散并准备运到德國去的工人，在一个星期之內都参加了义勇軍游击队。”

这篇总结虽然十分枯燥，但是很有說服力，它比任何評論都能說明問題。在义勇軍游击队的公报中，关于游击队战斗的报道越来越多了。

1942年8—9月份的秘密《人道报》号召法国人在9月20日紀念瓦耳米战役一百五十周年。

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巴黎的准备工作，达到了极大的規模，以致于納粹分子下令，自9月20日十五时起，禁止上街。但是，示威游行还是声势浩大地举行了。在这些示威游行当中，克罗佐的冶金工人和上馬恩的农民的示威游行具有人民团结大集会的性质。号召已深入到各个乡村，乡村的爱国者有的在自己的窗子上挂起了国旗，有的挂一些象征着国旗的三色彩带和布条。

示威游行接連不断地发生。地下党的传单和《人道报》要求家庭妇女学习布錫街妇女的榜样，“自取所需”。受到被征到德

国去的威胁的工人也都团结起来。例如，里昂的铁路工人就为了对付征调几千名铁路工人的命令而在“战斗”、“解放”和“义勇军”三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它们曾经同“民族阵线”和地下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彼此协作。不久，这五个组织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号召拒绝征调并举行罢工，这一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人们不得不撤回征调的命令。

9月里昂罢工以后不久，1942年10月10日马孔又爆发了罢工，同时在拉马丁码头街举行了公开示威。10月14日，安省的布尔市场爆发了同样性质的运动。

共产党把这种群众运动引导到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方面，要求“所有爱国者同心同德团结起来，以便加强义勇军游击队，因为义勇军游击队正以自己的前哨战为反对侵略者和效忠于侵略者的卖国贼的全民武装起义创造必要条件”。

1942年10—11月的秘密《人道报》出版专号号召11月11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刊登了一篇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最近一个月的战果，其中报道了在巴黎外林荫道焚毁卡车和用手榴弹袭击纳粹军分队；在伊西—莱—木利诺第十三区和第十五区击毙纳粹军官；在奥贝尔维尔埃烧毁了占领军哨兵宿舍，炸毁了占领军的操场；在杜省破坏了发电厂，等等。

在准备11月11日示威游行的高潮中，美国军队在北非登陆的消息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似的（1942年11月8日）。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全国军事委员会认为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在取得法国共产党地下领导的同意以后，向伦敦掌握着大量在国内作战所不可少的金钱和武器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请求援助。

全国军事委员会在说明了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性质及目的之后，进一步阐明了发展义勇军游击队的必要条件：

“一、得到武器和炸药；

“二、得到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这个第一次呼吁没有被接受。空投的武器、金钱和药品都给了属于国外抵抗运动指挥总部的“秘密”组织中的观望主义派。这些“秘密”组织的负责人不仅毫无节制地滥用资金，并且以留下来等到行动日使用为名，把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作战急需的武器埋藏了起来。

1942年11月11日，德军违反停战条款，借口阻擋盟军前进，侵入了突尼斯。同一天，德军还在法国占领了所谓“自由”区。实际上，德国秘密警察已经在这里活动了一些时候。

维希政府指示仅有十万人的停战的法国军队按兵不动，留守待命。拉特尔·塔西尼将军拒绝服从这个指示，打算把自己的军队带到科尔比埃尔高原，摆脱圈套，并在那里抗击背信弃义的德军。他被捕了。

11月23日，法属西非洲的殖民地都加入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力量。卖国贼当就此事提出抗议，并且哀叹法兰西“帝国”从此完了。

在拉特尔“叛变”之后，德军司令部对停战的法国军队如此微薄的力量也害怕起来。11月27日，德军司令部决定解散停战的法国军队。当天深夜，德国士兵闖入兵营和军官宿舍，把卸下武装只穿着衬衣的士兵和军官赶了出去。

预料到自己将会遭到同样命运和停泊在土伦港的海军舰只将被抢走，当11月27日纳粹军队逼近港口的时候，法国海军凿船自沉了。

党的领导为了向土伦海军的英雄行为致敬，同时为了把战斗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立即印发了题为《战斗的号角》的传单，下面是这个传单的摘要。

首先譴責了希特勒的新罪行，然后用很大的篇幅贊揚了“全國抵抗運動的英雄們”的光榮事迹：

“土倫海軍艦隊的人員抵抗了德國鬼子，他們炸毀了輜重庫、重油庫；凿沉了艦只，並且有幾艘兵艦開到海外，投奔了盟軍。

“有些海員光榮地犧牲了，他們寧可與自己的船隻同歸於盡，也不願意看着這些船隻落入敵人手中。

“我們要向全國抵抗運動的英雄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他們為了法國的生存付出了自己的鮮血，他們的犧牲是同比爾一哈克姆^①士兵的犧牲，同埃斯田訥·多爾夫、加布里埃·佩里、皮埃爾·色馬爾、夏爾·米歇爾、坦博、年輕的居伊·莫蓋和所有其他在高唱《馬賽曲》和高呼“法蘭西萬歲”聲中倒在德國鬼子槍彈下的愛國志士的犧牲聯在一起的。

“土倫水兵的犧牲是同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員——不穿軍服的士兵，無名的民族解放戰士，被敵人稱為‘恐怖分子’而實際上是祖國領土上的戰鬥法國的武裝先鋒隊，是非洲士兵和土倫水兵的戰鬥兄弟——的犧牲聯在一起的。”

這個號召書要求凡是可以用動的法國人都參加到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的行列中來以後，接着說：

“你們，剛被德國鬼子解除武裝的停戰軍隊的軍官、下級軍官和士兵們，海軍軍官和水兵們，你們能夠而且應該為你們自己報仇，為法國報仇。

“你們要組織起來，組成法蘭克團，然後到阿爾卑斯山區、比利牛斯山區、中央山區和其他適合於展開游擊戰的地區去，學習游擊隊將軍米海洛維奇^②的光輝榜樣，讓占領我們親愛的法蘭

① 利比亞的一個地方。1942年6月，蓋尼將軍率領的法軍，曾在此抵抗隆美爾率領的德軍六晝夜，終於粉碎了德軍的包圍。——譯者

西領土的敌人知道法国人的厉害。”

由于党中央领导机构下达了一些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分子、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指示，满足了战斗的基层组织 and 群众的愿望，因而党又恢复了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但是，党领导机构在同占领初期所主张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策略的相反的方向上，又犯了一些矫枉过正的錯誤。

共产党员完全懂得必须推动从大多数人民中产生的爱国潮流，以便把它引导到最高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没有忘掉自己既是为战胜纳粹主义和支援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战斗，又是为在法国创造有助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而斗争。

某些民族沙文主义的歪曲，企图使人忘记人们所反对的是纳粹独裁制度及其帮凶，而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德国人就加以反对的德国人民。很多党员对这种歪曲感到疑惑不解。

在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23 日签署的红军最高统帅部第五十五号通报中明确指出：

“红军的力量就在于，它没有而且不能有对其他民族的种族仇恨心理，对于德意志民族也是一样……”

同一通报还指出：

“如果把希特勒党羽与德意志民族混为一谈，与德意志国家混为一谈，那就很可笑了。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就会下台，而德意志民族，德意志国家则依然是存在的。”^②

这种立场比那种不理睬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德国劳动人民和在国内勇敢地进行怠工活动的德国工人的立场，显然更符合馬

② 米海洛维奇 (Mikhailovitch, 1893—1946)，南斯拉夫旧军官。——译者

③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41 页。——译者

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当然,要想把尽可能多的非党战士动员到共产党人一边来,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盟友的曲解,必须激发全国最广大阶层甚至包括政治上进步最差的阶层的爱国心;总之一句话,必须尽一切办法作到积极的、全面的动员。

尽管如此,有许多共产党员是不肯轻易把纳粹党卫军和被投进死亡营或者在继续进行地下斗争的像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那样的德国革命者,都用“德国鬼子”这个民族沙文主义的字眼来混称的。

要实现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即把所有德国人都从法国赶出去同要求与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原则协调起来,确实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全党及其领导机构基本上克服了这个困难。

* * *

法国舰队在土伦凿船自沉一事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的情绪都激动起来了。

维希政府以保留一个“自由”区、一支象征性军队和一支法国舰队而在人们心目中所保持的幻想的破灭,也必然使那些把赌注押在德国胜利和投敌上面的人再一次感到极大的失望。

1942年9月以后,希特勒派去攻打斯大林格勒的精锐部队出乎意料地被苏军的抵抗阻止住了。11月,红军发动了德军入侵苏联国土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反攻,很快就把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箝制在一把无情的铁钳之中。

1942年11月19日发动的这次战役,以歼灭三十三万多人组成的二十二个德国师而宣告结束。

正如1960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所明确阐述的那样:“战争史上还没有过全部包围和歼灭这么多军队的先例……斯

大林格勒近郊的胜利是伟大卫国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根本性转折的开始。”^①

当自由的命运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决定下来的时候，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正在生气勃勃地发展着。1942年11月的示威游行，在人数上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11月11日，从最大的城市到最小的乡村，爱国者都活跃起来，为了表明自己的心意，他们纷纷向本地烈士纪念建筑物献了花。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所组织的袭击和破坏规模越来越大，打得越来越准。

1942年底，在乔治（费边）领导下，为袭击巴黎左岸书店所做的周密准备，就是一个例子。

这家被占领者征用的书店座落在巴黎大学广场，店里陈列着种种纳粹书籍，橱窗里摆着反苏文件。自从书店的橱窗被人用石头砸过一次以后，经常有一队人数众多的警察保护这家书店。

在巴黎大学开学的那天，由一个袭击组和两个保卫组组成的一支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分队炸毁了这家书店。

这一行动计划的周密、执行的细致以及它的圆满成功，激起了大学生的热情，后来有很多大学生参加了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

许多宪兵和警察都变得“谨慎”了。共产党向他们发出了一些特别的号召，要他们反对迫害，否则他们不久就会受到惩罚。

维希政权的许多拥护者嗅到了失败的气息，开始停止发表攻击抵抗运动的言论，稍后，甚至有人出于个人利益给抵抗运动

^① 《苏联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3页。——译者

帮了一些忙。

法国资产阶级看出德国人结局要失败，就设法投靠一个在他们看来能够在法国防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他们“选定了”美国……

因此，浦舍和弗兰亭之流同另外一些维希分子便乘船到阿尔及尔去“投靠”了美国人。

美国人亲切地接待了这些“迟到的”反纳粹人士，甚至让他们担任了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怎样考虑释放被贝当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劳役所的共产党委员和共产党员的问题。

然而，不能不承认所有人民都知道的事实：在法国群众中影响日益扩大的共产党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所发动的战斗的成效。因此，1942年11月25日，戴高乐通过他在法国的秘密代表勒米上校表示同意地下党中央委员会派费尔南·格列尼埃到勒米上校那里所进行的一次接触。

为了共同准备全国起义，拟定了一个规定战斗法国军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之间密切配合的行动纲领。

还商定了共产党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派费尔南·格列尼埃到伦敦去，作为共产党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驻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代表。

1942年12月3日，秘密《人道报》发表了共产党武装力量参加法兰西民族委员会（这时已经改名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目标五点。

“一、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并武装爱国人民；

“二、惩办卖国贼并清洗行政机构；

“三、实行适于发动人民积极参加解放战争的民主的和社会的政策；

“四、在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之间实行兄弟团结的政策；

“五、法国应该通过发挥自己的战斗力而在盟国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

1943年1月8日，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和地下法国共产党的代表费尔南·格列尼埃抵达伦敦，共产党人和战斗法国之间的正式联系从此建立起来。

抵抗运动史上新的一页很快就揭开了……

第六章

阿尔及利亚的跳板作用

几个月以来，地下共产党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宣传就呼吁开辟“第二战场”，以便从西方支援东线红军的斗争。北非解放所创造的新条件，给第二战场的开辟提供了便利。

1942年11月13日，斯大林在一次答美国通讯社美联社记者问时说：

“问题首先在于这次在非洲发动的战役标志着战争的主动权已经转到我们盟国手中，所以它就根本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而有利于英苏美联盟。它破坏了在轴心国系统中作为领导力量的希特勒德国的威信，并瓦解了希特勒在欧洲的同盟者。它使法国摆脱了麻痹状态；唤醒了法国的反希特勒力量，并且奠定了组织反对希特勒的法国军队的基础。它为在最靠近德国的要害中心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是在组织战胜希特勒暴政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①

几天以后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展开的全面反攻，表明了苏联在共同斗争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证明了在西方开辟一个欧洲战场对于尽快打败敌人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

但是美国最高司令部并不急于开辟第二战场，因为这将会减轻对红军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共产党人已在其中占了上风的法国的解放。

^① 参阅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3页。

在北非取得胜利的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北非排挤法国殖民主义，以便把自己的剝削霸权伸展到整个地中海沿岸。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克拉克將軍把馬格里布的行政权交給了实用投降艺术場中的老手維希政府。于是，准备作貝当的继承人的达尔朗海軍將軍粉墨登場。共产党人仍旧被监禁在梅宗卡雷監獄和博絮埃拘留营。

在这些基本問題解决以后，美国就繼續同它的英国盟友一起推行“地中海計劃”，派軍隊在西西里，希腊，随后又在意大利登陸。

在这种情况下，让戴高乐所領導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抵抗运动战士的身份和共产党人正式加入解放委员会的权利，就成了最主要的問題。这一正确策略也是为团结进行解放斗争的各种抗敌力量准备条件。

因此，地下党領導派自己的代表費尔南·格列尼埃到伦敦去进行妥协。

但是，地下党領導过去由于不考虑戴高乐派宣传机构在法国的反应，就在党的秘密刊物里宣称戴高乐是“为英帝国主义服务的伦敦金融界代理人”，以致犯了极端的宗派主义錯誤，現在則又陷入了机会主义的另一极端。

格列尼埃在 1943 年 1 月 21 日的秘密《人道报》上写道：

“我們通过宣布我們信賴第一个举起抗战大旗的戴高乐將軍和非洲軍隊的领导人吉罗德將軍，通过表明我們要致力于为解放法国而斗争的法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意志，表达了法国人民的心願。”

尽管戴高乐不太高兴人們把他的政敌——从一个德国要塞逃出来的亲美人物吉罗德將軍同他相提并論，但是他並沒有忽視共产党和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所代表的武装力量的貢獻。

戴高乐于1943年1月10日給地下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在策略上要比共产党发言人的声明老练得多。信中說：

“費尔南·格列尼埃的来到，他的代表你們党参加民族委员会，并把你們所成立和鼓舞的英勇的游击队的組織交給作为法国武装部队統帅的我来掌握，这一切都是法国統一的表现；这再一次表明了你們希望为我国的解放和我国的伟大做出貢獻。

“我确信你們的决定会給民族利益带来重大貢獻，为此我向你們表示真誠的謝意。

“你們的党员为法国已經做出一切努力和牺牲，今后还要要求你們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同我一样，你們也知道，各个抵抗組織之間的有效配合，是达到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法国人民积极有效的参加下尽快地解放法国——所不可缺少的。

“我确信我所指派的代表会在法国共产党的負責人那里看到具有牺牲精神的合作意志和在你們各組織內已經得到恪守的那种紀律。

“做出最艰巨的努力的时刻已經来到。值此德国的力量在英勇的俄国軍队的打击之下搖搖欲墜的时候，爱国的法国人必須同我們的俄国和英美盟友站在一起，去解放我国国土。我知道，战斗法国可以信賴法国共产党。”

反对美国控制北非的利益集团的代表戴高乐认为，依靠群众来抵制克拉克—达尔朗协定是适宜的。維希政权駐阿尔及利亚的高級专员、同美国人簽訂了一項保持他的权力的停战协定的达尔朗海軍將軍，于1942年12月24日遇刺身死。

爭取释放被監禁的共产党人的运动扩大了，1943年2月初，走在“光荣之路”上的二十七名共产党議員^①終于被释放了。

① 巴雷耳、巴托利尼、貝諾瓦、伯利奧、皮佑、邦特、科尔納万、科松璠、科斯特、克里斯托夫尔、克罗瓦札、德姆苏瓦、法戎、加奧、格雷薩、拉雷普、勒

但是，四百名流放在博絮埃拘留营的党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依然被监禁着，直到1943年2月底至6月才分批获得释放。那些在监狱当局面前表现最坚决、曾因支持同看守勾结的干部而被迦罗迪称作“白痴”的人，如佩罗内和凡克等，自然是最后获得释放的。

所有这些党员和议员不久就组成一个法国共产党驻北非代表团，并且积极活动起来。

在此期间，抵抗运动已经在被纳粹全部占领了的法国大规模地展开了。

1943年1月3日，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一个突击队袭击了德国士兵经常去玩的旧马赛区的一家妓院。打死打伤了一些德国兵。

为了报复，占领军遵照希特勒亲自下的命令，决定炸毁马赛旧港周围的各个旧区，因为那里每一所房子都是游击队的隐蔽所。占领者在把居民赶走并且把20%的居民当作嫌疑犯拘留在弗雷瑞斯集中营之后，于1月24日完成了这项破坏工作。

在破坏前夕，从罗曼维勒堡开出了第一列向纳粹集中营运送流放居民的列车。达涅尔·加桑诺瓦就在这些人当中。

2月2日，抵抗运动收到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消息：被希特勒任命为“大帝国”元帅的馮·保罗斯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了。这是在这场有史以来最大的战役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德国军队开始在苏联的各个战线上撤退了。

以后每天都有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德国国防军撤出了罗斯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格勒。列宁格勒的包围被粉碎了。哈尔科夫、库尔斯克和高加索不久也全部收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

维、洛兹雷、马尔太耳、米多耳、莫盖、穆斯莫、帕蒂、普拉萨依、普罗、罗歇和图夏尔。

生了根本性的轉折。在頓河和北頓涅茨河之間的納粹軍隊，被趕到伏尔加河以西六百公里的地方。

为了避免彻底失敗，德国司令部大規模地抽調了駐欧洲和法国的占領軍。从此以后，盟国的策略步驟是推迟开辟能够加速德国失敗的第二戰場，把歼灭納粹軍隊的最大負擔留給苏联，使苏联在做出这种努力时遭到損失。

在法国，爭取統一抵抗运动的斗争，正在排除重重困难，頑强地进行着。

1943年初，秘密軍隊第一軍事委員會在德累斯特兰將軍(后来他在流放中死去)的主持下举行了會議；馬賽尔·普勒南在会上以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全国軍事委員會的名义提出了一个有关組織秘密軍隊的計劃草案。有人借口有招致敌人报复的危險和力量悬殊等等来反对这个以立即行动为基础的計劃草案。但是，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这份文件后来仍然成了組織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藍本。由法兰西义勇軍的軍事教练訓練出来的游击队战士的补充，对于組成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必須指出，在党的領導机构里仍然存在着某些令人遺憾的不一致的情况，党領導反对一个由共产党员領導的最大的馬基游击队的活动，就是一个例子。

領導机构駐这个地区的代表，地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并且是对党忠心耿耿的优秀党员，居然坐在家里要求別人向他汇报，不許別人根据情况采取任何必要的主动性，在他看来，只能进行事先經他同意的活动。这样一来，他同这个地区的馬基游击队的負責人、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上校乔治·岡古安很快就发生了冲突。乔治·岡古安从1940年就从事抗敌活动，在遭到警察追踪以后，为了避免被捕，不得不打死几个宪兵，結果被缺席判处

終身苦役。有一次乔治·岡古安要求这位中央委员会的負責人到他隱藏的地方来会面^①，因为他亲自到里摩日去实在太冒险。这位中央委員竟作了这样的答复：“領導人是我，我不是听任岡古安支配的，岡古安應該服从我的支配。我不准你再跟我談他！”

后来，有一个不和的原因說明了許多严重摩擦的根源：利木贊的馬基游击队員知道德国人准备征收小麦了，他們认为必須使小麦收获不成，便叫人炸毀了捆麦机、打麦机和其他农业机器。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占領軍所能搶走的小麦的数量。由于領導机构的代表只看到“民族团結政策”，害怕农民不能够理解进行这些破坏的政治意义，因而指責馬基游击队的指揮員“企图挑起农民反对抵抗运动”，并且要求他停止这种抵制德国人征粮的行动。而在这种“无紀律的”行动繼續发生之后，人們甚至向一些聯絡人員发出了“从肉体上消灭”乔治·岡古安的“命令”！

可是事实证明，大多数农民都贊成这种破坏，因为这使他們有了无可否认的借口和无法克服的困难，可以逃避德国人征粮。

到后来，中央領導机构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行动是正确的，并且鼓励这样做了。

这些意外事件往往是由于政治干部和軍事干部之間配合上的困难造成的，或者是由于一些得不到监督的人員的无限权力而引起的。尽管如此，共产党員始終还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們的工作成效成了抵抗运动中其他組織的榜样。

敌人并没有受騙，他們把所有的抗敌战士都說成是共产党人，因而更多地杀害了作为人质的共产党員。

1943年4月，“战斗”、“义勇軍”和“解放”等抵抗組織統一了他們的活動，把他們的馬基游击队和义勇軍队伍联合起来，成立

^① 我們掌握着了解这个情况的一些聯絡員所簽署的两份笔証。

了“統一抵抗运动”。

1943年4月17日，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和共产党的工会工作人员签订了佩勒协议，宣告工会重新统一。1943年5月1日爆发的许许多多统一示威游行显示了这种协议的初步作用。

但是，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了的法国社会党的地下领导机构和共产党地下领导机构之间，却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1943年2月两党举行谈判。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是“韦尔散惹托里克斯”，即乔治·马腊纳，社会党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达尼埃·迈耶。

法国社会党实际上有两个严重分裂的领导机构，这两个领导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附于英国情报局所豢养的中央情报和行动局。

社会党的代表所以坚持要同法国共产党接触，主要是因为法国社会党希望挽回自己在1940年所采取的反共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共产党的代表根据社会党领导人最近的表现和他们的真正代表性而提出一些要求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否认中央领导机构在这些谈判中所采取的必要的坚定态度是正确的，然而我们认为，同我们对激进党的甚至对右派的政客采取的多方面的妥协比较起来，这样做就有些过分了，因为激进党和右派的政客也是在世界大战的进程使他们确信希特勒必败之后才又出头露面的。

例如，在议定有必要起草一篇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声明，甚至连声明的提纲都已拟定之后，党的中央领导竟命令中断了接触。只是过了几个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时，才恢复了接触。关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以后还有机会谈。

在突尼斯和比塞大解放八天之后，1943年5月15日，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党、重新统一的总工会、法兰西义勇军游

击队 and 所有抵抗組織的代表組成的全国抵抗委員會成立了。5月27日，全国抵抗委員會在伦敦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特派員让·穆兰的主持下，在巴黎富尔大街四十八号举行了第一次會議。

會議決定，把各方面的力量都統一起來，并且決定制訂一个全面的共同綱領。

斯大林借口消除盟国所謂各国共产党都“听命于一个設在莫斯科的机构”因而被排除在外的异議和保留，決定解散共产国际。

斯大林确知共产国际执行委員會的委員，像一直住在苏联的莫里斯·多列士那样，不征詢本国党的意見就表示“本党”同意的委員們是听話的，所以将解散共产国际說成是一项集体決定。

这样，1943年5月15日，国际工人运动的領導中心就不存在了，这个中心虽然有官僚主义作风和对斯大林的迷信，但在協調各国的革命斗争和参考各国的經驗拟定論点方面，仍然起着它的重大作用。

后来有人試圖利用下面的說法来为这种行为辯解：

——第三国际已經完成了自己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任务；

——第三国际沒有必要存在了，它已經成了各党为使总方針适应本国条件而采取独立策略的障碍。

人們还在党内散布这样一种思想：这样做既可以消除盟国的异議，又可以通过“秘密的”协商来保持繼續不断的联系。

可見，这项重大決定的理論基础是互相矛盾、軟弱无力的，归根結蒂是一种打算欺騙資本主义領導人而他們并不会上当的下策。

这个打击使法国共产党員感到十分沉重，首先是因为本国

的目标和苏联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致过，其次是因为他们每天要从事战斗，不但很少有分析这个问题的时间，而且也缺乏作深刻的理论性讨论的资料。

地下活动必须有一种严格的、每个党都承认其必要性的集中制，虽然每个党都承担着由此而产生的一些不便。此外，取消共产国际的决定等于加强了斯大林的无上权威，各国共产党此后再也没有任何讨论的权利了。

就当时来说，苏联军队的胜利前进对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武装行动是一种无比的援助，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武装行动对苏联人民的斗争也是一种援助。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1943年取得的战果是巨大的：当时盟国的空军宣布对列车和铁路采取一千六百次行动，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同一时期完成了两千次！

然而，直到1943年6月，设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才终于撤销了达拉第1939年签署的禁止共产党的命令。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德将军这两个新领导人之间妥协的产物。他们各自代表着“同床异梦”的利益集团。戴高乐有英国的支持，吉罗德则有美国的支持。

以“通过一切形式在一切场合把法国的力量运用到战争中去”为主要目的而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由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德将军轮流主持的。

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初期的成员来看，不仅可以使人了解1958年法国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动的原由，还可以看出它所代表的利益。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前陆军总参谋长、在希特勒侵略法国时主张投降最迫切的人物之一乔治将军；同大银行有联系的财政视察员，1942年还在维希政府财政部当司长的顾夫·德姆维尔；国际卧车公司的董事长、洛希尔财团的代表、还

在皮埃尔·赖伐尔的办公厅里当过专员的勒内·迈耶。

人们可以设想，这班人绝不会开展一个最后能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大好处的民族解放运动。

人们还可以看到，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没有急于释放共产党议员，而是一直等到1943年6月，即在阿尔及利亚登陆七个月以后，才释放了最后一批监禁在博絮埃拘留营里的共产党员。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迟迟作出的撤销禁止法国共产党的命令的决定，主要应该归功于已经获释的议员和党员在重新组织起来的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人的支持之下不断施加的压力。

以弗朗索瓦·皮佑担任领导的共产党议员从梅宗卡雷监狱获释以后，立即在取得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一项声明，主张：

“一、成立各种工会，团结全体劳动人民，有计划地清除维希政权的一切残余，取消所谓‘劳工法’；

“二、把法国的所有爱国者（戴高乐派、共产党人，等等）团结起来，组成战斗法国统一运动；

“三、通过满足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正当要求，实现欧洲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最广泛的团结。”

成立起来的各个工会表现得十分活跃。

1943年的五一节，在阿尔及利亚的职工进行了义务劳动，甚至加点工作，以使用所得工资购买飞机，组成一个“劳动小队”。

在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人重新提出了地下党中央委员会4月1日在法国提出的口号，极力要求“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成为法国临时政府，并在法国领土上发布它的决议。

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提出这个主张，不仅是希望产生一个能

够影响法国局势的中央权力机构，而且也是希望成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足以制止“盟国”在北非玩弄阴谋的政府。

因为人们在北非继续玩弄阴谋手段，而且反共主张又已出现，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内部，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分歧更加严重了。例如：戴高乐派拒绝在解放军中实行人民体制，他们反对清洗贝当派的军官，而且反对真正恢复共和自由。他们指责“共产党人想独立行动”，或者说共产党人指望“为自己的利益取得作战的指挥权”。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共产党人认真地支持了法国共产党人在北非所采取的行动。这三个重新建立起来的政党很快就吸收了两万名成员，他们选出了一些受过维希政权迫害、经过考验的人作为自己的领导人，如：乌泽加訥、卡巴列罗、雅腊、尼查德、絮耳汤和拉费，等等。

法国共产党一面向三个北非党重申只有在满足人民的正当要求时才能够实现兄弟般的团结，同时宣布：

“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的利益是和法国人一道同希特勒主义进行斗争，希特勒主义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特别是穆斯林的敌人，因为它把穆斯林列为第十四等人种。北非人民进行这样的斗争也就是帮助一个从纳粹占领者手中，从法国和北非人民的共同敌人——托拉斯手中解放出来的法国的诞生。”

人们在这里散发了几万份传单，并且在1943年7月出版了共产党的周刊《自由报》。这份周刊在宣传给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提供武器和金钱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3年7月，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普尔塔累携带各种指示到达阿尔及利亚，这些指示着重指出，根据情况需要而在北非成立的法国共产党分支机构同法国共产党领导机构之间的观

点是一致的。

8月28日，戴高乐將軍終於接見了在阿尔及尔的二十六名共产党議員^①。艾蒂安·法戎是他們的發言人。他們重新提出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改組成临时政府的主张。他們同时展开了实行戴高乐本人在伦敦广播电台所发表的綱領的斗争。

戴高乐必須“舍其輕而取其重”了，他派人多次征詢一直在伦敦的費尔南·格列尼埃是否願意参加法兰西委員會。格列尼埃每次都答复說，應該由共产党决定自己的代表。

不过，既然接受了这个原則，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向改組成为有共产党参加的临时政府的道路迈进了一步。戴高乐派所以有所轉变，是同人民的压力、共产党的口号得到群众拥护分不开的。

1943年11月，即盟軍在北非登陆后一年，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进行了改組，戴高乐終於把担任武装部队首脑的吉罗德排挤出去，单独担任主席。

在一些同大金融資本家集团或維希当局有特別明显关系的人物被謹慎地排除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之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就变成了各党派和各抵抗組織的代表机构。但是，它的代表性还不是普遍的，因为里面还没有共产党人。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是：

主席：戴高乐。委員：賈德魯將軍、曾任貝当政府駐安卡拉大使的馬西格里、社会党人蒂克西尔、曾任駐国际联盟高級官員的让·蒙納和亨利·龐奈、实业家普利文和迪特尔姆，洛希尔銀行的迈耶自然也在內，《战斗报》的弗萊乃、基督教社会党人菲利普、天主教徒德芒通、“战斗”小組的加比当，激进党人葛义和孟

^① 普拉薩依由于监禁期間生活条件恶劣，出獄后不久就逝世了。

戴斯—弗朗斯、社会党人勒特劳盖、共和联盟的雅基諾（反动的右派）和《解放报》的达斯迪埃·德·拉·維热里（进步人士）。

要想使共产党人在这个反对派占多数的“临时政府”里有自己的由于在国土上参加抵抗运动而理应得到的代表权，还必须进行艰巨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目的并不在于“参加”这个没有经过选举在海外領地上建立起来的只有相对意义的政权，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得到毫无疑义的、人所公认的应有的地位，以便继续进行解放国土和管理以后法国的事务的斗争。

由于北非解放后有了合法行动和公开宣传的方便，法国共产党可以更好地让人们承认它在抵抗运动中的地位，并更好地准备解放斗争。

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的崩溃为自由越过大海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也使法国向解放迈进了一大步。

第七章

科西嘉島的解放

1943年9月8日，科西嘉島上爆发了起义，到处展开了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战斗。

这个消息比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更加鼓起了法国人民的热情和希望。

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并不是由于它在整个大规模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因为它给党的历史提供了经验教训。

因此，有必要追述一下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生的条件。

在1940年6月停战协定刚刚签订不久，科西嘉同法国的所谓“自由”区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这就是说，除了德国秘密警察、墨索里尼的警察和他们的贝当派走狗之外，在科西嘉没有占领军。

科西嘉的共产党人由于同法国本土的党领导长期失掉联系，他们几乎不知道我们前面论述的那些模糊的口号和所犯的錯誤。

从战败以后不久起，他们始终不渝地采取了十分直接的反法西斯行动和其他抵抗潮流的友好立场，而没有抨击继续作战的英国。

党的“地区委员会”的报纸《科西嘉土地报》始终正常地秘密出版。

正是由于这些有利的条件，所以1941年初就在科西嘉成立了民族斗争阵线，它的中央领导机构的五名委员中不久就有了

三名共產黨員。民族鬥爭陣綫在很多鄉村里建立了村委員會，在城市里建立了許多基層組織。民族鬥爭陣綫的報紙《愛國者報》也在島北部一個山洞里定期出版。

這個組織的最主要的負責人以前擔任西班牙第十四國際旅政委的弗朗索瓦·維托里、黨的地區委員會書記腊烏耳·貝利尼、農斯·貝尼埃利、阿爾圖爾·紀奧沃尼，後來有莫里斯·舒里。同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有戴高樂派的亨利·馬約和吉羅德將軍的軍事代表團團長塞薩里。

在年輕的共產黨員米歇利推動下的青年愛國陣綫的配合行動，也值得在這裡提一下。

和法國南部地區一樣，這個島也是在1942年11月11日被意大利人和德國人占領的。占領軍在巴斯提亞登陸。

但是，就在這一天，科西嘉全島爆發了民族陣綫組織的非法示威和在大街上的愛國遊行。

人民仇視占領軍的情緒逐漸朝着具體地準備武裝起義的方向發展。這絕不是輕率從事，而是根據對戰爭發展中的軍事和政治事件的分析，在時機成熟時就毫不遲疑地發動起義。

1943年7月10日，盟軍在西西里登陸，接着他們就從巴勒莫挺進到錫腊庫扎，同時轟炸了羅馬。在盟軍的這種沉重的打擊之下，柏林—羅馬軸心的伙伴之間發生了衝突。

7月25日，墨索里尼在瀕於崩潰的法西斯大會中變成少數派，被“解除職務”。德軍占領羅馬後，解救了墨索里尼，又讓他當了在意大利北部成立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頭子。當這個政府垮台的時候，人民又在意大利北部抓到了他，並把他懸尸示眾。

在羅馬接替墨索里尼的是以巴多格里奧元帥為首的軍人政府，它在面臨盟軍挺進的情況下準備投降。

1943年8月初，科西嘉的共產黨領導就清楚地了解到這種

情况并从中得出正确的結論：如果意大利投降，占領全島五分之四的八万意大利軍隊保持中立，人們就可以集中最大的力量去打击占領着巴斯提亚和沿海地区的那一万五千德軍。

因此，人們决定，以意大利的投降为起义的信号。民族陣綫不顾吉罗德的代表的沉默和阿尔及尔方面的劝告，接受了并在所有基层委员会中传达了这个建議，同时要求作好实现这个建議的准备。

看到科西嘉人民的这种战斗精神，吉罗德將軍不顾政客的議論，利用卡扎比昂卡号潛水艇（艇长是累米尼埃）并在八十個場所进行空投，給島上的馬基游击队提供了一些武器。

殘酷的迫害並沒有阻擋住斗争的发展。尽管让·尼科利、安德烈·格里菲、多米尼克·万塞提、儒勒·蒙多利尼和另外十八名党员被处决或在战斗中牺牲了，“民族陣綫”还是組織了一万一千七百名有絕大多数人民支持、准备投入战斗的战士。

在敌人方面，有意軍八万人，配备一百二十輛坦克的德軍一万五千人；不言而喻，还有維希政府建立的整套行政和警察机器。

9月8日晚，当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传到科西嘉的时候，人民群众馬上举行集会并立即采取了行动。晚八时，示威群众当着占領軍的面，在阿雅克修市的各条大街唱着《国际歌》和《馬賽曲》列队游行。阿雅克修民族斗争陣綫的领导人要求人民在第二天上午十时集合。

1943年9月9日，一万五千阿雅克修人在預定時間集合到省政府前面。有一千五百名示威群众是公开武装的。警察慑于普遍的爱国声势，有80%投到抵抗者方面来。

維希政府任命的省长宣布投降，并同意签署一項成立“省議會”的命令。“省議會”宣布科西嘉重归自由法国，要求居民懸旗

結彩，宣布解散各个投敌組織并沒收其財產。民族陣綫的战斗部队成了警察后备队。

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除了被剝夺了权力的省长的签字之外，还有民族陣綫領導人的签字。

当这一行动在一枪不放的情况下在阿雅克修进行着的时候，义勇軍游击队正向盘踞在巴斯提亚的德軍进攻，另一部分队伍則監視着意軍。意大利軍隊有的投降，有的甚至参加到抵抗运动方面来。

义勇軍游击队在弗朗索瓦·維托里的指揮之下战斗了三天。德軍虽然損失惨重，但是他們仍旧在巴斯提亚和东部海岸地区負隅頑抗。不过，他們深入該島腹地的一切嘗試都被打退了。

在这場战斗期間，維希政权的各个市政府都被剝夺了权力，絕大部分投敌分子被逮捕。

9月13日，卡扎比昂卡号潜水艇載着一支九十七人的部队和阿尔图尔·吉奥沃尼，从阿尔及尔开到了这里。

这支配备着必要的重武器的武装力量，完全投入消灭被包围在巴斯提亚和海岸地区德軍的战斗。科西嘉的战士积极地参加了这場战斗，战斗于10月4日以我軍全胜而告終。

阿尔及尔派来的省长路伊泽被迫批准了省議會从9月9日到14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但他終於把省議會变成了一个沒有权力的“諮詢机构”。

排挤解放科西嘉的人的阴謀开始了。人們以民主和恢复法制为借口，把一些戴高乐派的政客塞进解放委员会来破坏胜利果实。看来这种实际目的在于使共产党人成为少数派的“比例分配制”似乎还不够，省长路伊泽根据阿尔及尔戴高乐当局的指示，又任命了一个解放委员会的省领导机构和一个省議會。不

抵抗分子和維希分子可以根据阿尔及尔发来的指示而額手相庆了。

人們所追求的目的實現了一部分：民族斗争陣綫这个統一的机构已經分裂成几个对立的集团。反共分子甚至用腐蝕手段企图分化共产党人；这里有人大搞“私人請客”、誘劝和阿諛奉承，那里有人授予奖状、勳章和带有“个人头衔的肩章”之类的东西，或者給予某种职务和好处。

但是，过去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現在获释的法国共产党人——普通党员或議員，援助了长期同本土领导机构失掉联系的科西嘉共产党人。

前瓦尔議員、土伦兵工厂工人让·巴托利尼被派到阿雅克修，传达了党的意見和指示。他还利用同阿尔及尔的联系解决了不少問題，避免了人們設下的大部分圈套。

1943年10月12日，安德烈·馬尔梯从苏联到达阿尔及利亚，負責在自由領土上作党的领导工作。后来他以这种身份帮助巴托利尼和科西嘉最坚决的共产党领导人克服了由资产階級抵抗組織和維希分子的共同阴谋所造成的缺点和偏向。

地下党中央委员会則从科西嘉的解放中吸取了可以作为解放法国的斗争的教訓。这一分析的結論如下：

第一，行动的統一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它可以避免許多牺牲。

第二，共产党人曾經为其統一进行过有效斗争的科西嘉抵抗运动的胜利，是由于党无情地揭露了抵抗运动中表現出来的各种“观望主义”傾向而取得的。

第三点教訓是，起义的迅速胜利是随时准备着投入战斗的抵抗运动战士做了細致的日常准备，同时又毫不間断地吸收新生力量，說服人民群眾，訓練人民群眾在行动时支持自己而取得

的結果。

作出這些結論的目的在于鼓動法國抵抗戰士的行動，因此，必須花費一定的心血去推廣這些經驗。對於法國人民本身來說，作為法國一省的科西嘉的解放比阿爾及利亞的解放更能激勵人心。

在法國人民看來，科西嘉的解放是向前邁進了一步，它意味着解放“臨近了”法國，解放的腳步已經踏上淪陷的法國領土。

但是，在分析這些事件的時候，人們很少考慮科西嘉所存在的一些對起義的成功特別有利的條件。

從地理方面來看，科西嘉是一個小島，不能同法國本土相比，也不能同敵人在那裏所掌握的交通工具相比；從事實方面來看，這裏的占領軍屬於兩個而且是突然分裂的國家，這些都是科西嘉愛國者取得勝利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很显然，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崩潰和意大利的投降、墨索里尼的被監禁、巴多格里奧向意大利軍隊發出的號召，這一切在科西嘉的占領軍當中造成了極大的紊亂。因為在科西嘉的占領軍當中，意軍占大多數，德軍只占八分之一。

同樣很显然，八萬名意軍的突然投降，使得一萬五千名德國占領軍在戰略上和心理上都陷於極端不利的地位，他們更加孤立了。

另外還要考慮到科西嘉人民的十分強烈的反意情緒，因為這個島上的同內地中央領導失掉聯繫的黨，從一開始就採取了一貫反對占領者的路線。

為了推動巴黎解放委員會學習科西嘉的榜樣，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的湯吉（羅耳）上校在1943年11月5日該委員會的會議上發表了如下聲明：

“你們應該學習我們科西嘉的英勇的兄弟們的榜樣，拿出勇

气，不怕牺牲，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德国鬼子和卖国贼。你们要马上采取行动，准备同全国解放息息相关的全国大起义。”

与此相反，人们对科西嘉解放后不久抵抗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们所进行的腐蚀阴谋的分析，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但是，对于法国本土的共产党人来说，这种阴谋预示着他们必然会遇到障碍。

* * *

除了个别的不同以外，科西嘉事态的顺利发展不正好可以衡量地下领导集团在战争初期和失败之后所采取的錯誤立场给法国造成的障碍是多么大吗？

当然，这种障碍幸好是被抵抗运动中的共产党英雄们克服了，虽然它并不是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害。

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机构是否以足够的英明和远见注视着战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发展，从而按照正确的估计，通过起义的办法在必要时做出它应该做的一切了呢？

这是必须阐明的一点。

首先必须了解 1944 年双方力量的对比如何。

在构成“大西洋之墙”的强大防御工事后面，在法国有六十个希特勒师，亦即将近一百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十个装甲师，约有二百辆火力强大的坦克。

抵抗运动方面大约有十万用轻武器装备起来的游击队，其主要力量是勇气和全体人民的支持。

要消灭在法国这个决定性战场上有了牢固防地和扎了根的强大的德国武力，必须有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从海上和空中在法国着陆。而这支力量只能期待于盟国……

这与科西嘉和某个中欧国家的形势截然不同，如果不是恶意的话，绝对不会硬说法国人民及其游击队有能力用自己

的力量来解放本国。

人們期待并极力呼吁开辟第二战场和在法国登陆是有道理的。

誠然，由于种种权术性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希望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第二战场的开辟被推迟了；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工作的艰巨性。

要开辟第二战场，就必须首先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必须具备迅速运送三十个师的能力，其中十个师必须在预定登陆的行动日一天内运到。除了各空降师之外，还必须要有十五、六个装甲团，随后还要保证每个月增援五个师。

实现“奈普頓海神”海軍计划需要一千艘从装甲舰到扫雷艇的军舰和四千多艘包括登陆艇在内的小型舰只。必须预先在加来海峡下面敷設一道輸油管，以便供应登陆部队所需要的汽油。为了接受一支龐大的登陆舰队和供应舰队，必须用一夜的时间在离开海岸的两个地点建成两个由七十条大船构成的人造港，构成人造港的这些大船必须与几百个由三十万立方米混凝土和三万吨鋼材制成的大浮箱同时沉入海内。

此外，还需要掌握一个精确的海岸地形图，掌握海水深度和炸毁德国防御工事所需的精确資料。

我們要順便指出，有許多英勇的抵抗战士参加了收集情报的工作。这是一項重大的工作，如果借口这不是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作用的主要方面从而低估这种工作，那是錯誤的。無論是誰，想要垄断抵抗运动都是不公正的，归根結蒂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当时力量的对比就是这样。因此，可以預料，正在进行爭取具有社会内容的民族解放的抵抗运动的法国人民，一定会遇到随带着戴高乐及其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强大的盟国軍事力量。

必須根据这些武装力量的必然到来作出决定，虽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科西嘉，意大利的投降創造了人們所期待的良好机会。毫无疑问，盟軍在法国的登陆就是发动人民起义的信号。

第八章

参加临时政府

1943年10月，费尔南·格列尼埃和安德烈·麦尔西埃带着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分别从伦敦和法国到达阿尔及尔，协助马尔梯据理力争，共产党一定要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机构。

他们带来了有关法国形势的激动人心的消息：矿工在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保护之下，最近又在诺尔省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10月13日，罢工人数达五万人）。义勇军游击队的活动正在迅速扩大，以致使占领军不得不派人把守铁路、桥梁，护送辎重，保护他们的巢穴和巡逻队。

法兰克团活跃在巴黎市中心。他们在弗朗克-布尔儒瓦大街把义务劳动局办事处的看门人绑起来，收走了六万张预定要征召的人的卡片，并且把这些卡片扔进塞纳河。10月23日，他们在巴黎市中心市场发动了一次示威游行。

在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这所学校里锻炼出来的马基游击队员，从山上下来袭击德军的辎重和兵营。他们手持武器在去筹办粮食的一些城市的大街上巡逻，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

鉴于自己在抵抗运动中的具体代表性，共产党人用地下党书记处早已通知给他们的下述五项条件回答了戴高乐将军敦促共产党人参加临时政府的再次邀请：

“坚决执行旨在达到下述目的的措施：

“一、动员帝国和法国的一切力量进行战斗，训练一支强大的反希特勒军队和武装爱国者；

“二、严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的所有卖国贼，坚决地把第五纵队分子从各行政部門中清洗出去；

“三、扩大社会民主政治，以調动一切法国力量并創造参加解放战争的热情；

“四、通过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滿足他們的正当要求，奉行最大的法国的团結政策；

“五、通过最大限度地扩大法国人民参加盟国的共同斗争，在我国独立和恢复我国强大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在盟国集团中的作用。”

費尔南·格列尼埃在向戴高乐將軍递交这份文件的时候补充說：

“如果我們党提出的参加临时政府的这些条件能够被接受，关于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人选应由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按照我們党和法国工人运动的原则从我們当中指定。”

1943年11月7日，戴高乐不顾这些条件，直接推荐費尔南·格列尼埃担任“工业、商业和农业委员”的职务，理由是他“認識費尔南·格列尼埃”。

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答复是，戴高乐所提出的委员职务目前无法活动，共产党希望有一个能够行动的职位。

11月8日，戴高乐写給代表团一封信，表示接受作战綱領中的五項条件，同时提出給“共产党代表”另一个次要职位——粮食供应委员。

从11月9日到16日，戴高乐又提出几个不同的建議（生产、公共卫生和情报等部門）。最后，共产党指定呂西安·米多耳和艾蒂安·法戎准备担任“公共卫生”委员和“情报”委员的职务。

面对着党的坚定态度，戴高乐重新改組了他的內閣，連一个委员职位都沒有給共产党。

于是，雅克·杜克洛写了一篇文章，作为《人道报》专号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了二十万份。

这篇文章值得全文予以转载，因为它说明党的领导彻底揭露和谴责了戴高乐排挤共产党人的主要原因和资产阶级所策划的种种阴谋。

我们重读这篇文章，必然会反复考虑：后来为什么和怎样总是不能从这篇文章中吸取各种教训。

《关于共产党人参加法兰西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问题》

“法国共产党以被法国的敌人看作头号敌人而自豪。党的许多战士为祖国的解放不惜流尽鲜血，在法国抵抗运动中占有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重要地位。

“最近，戴高乐将军还说：

“‘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他们不遗余力地对敌人进行斗争。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敬意。’

“戴高乐将军对于以我们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为其公认领袖的共产党的这种看法，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法国人的共同看法，希特勒宣传机构的反共污蔑对法国人越来越不起作用，所以，人们看到最近改组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没有共产党人参加，都觉得非常惊讶。

“最初，我们从广播电台获悉，关于参加的问题，以率领国际旅在西班牙土地上同法西斯分子作过战的我们亲爱的安德烈·马尔梯为首的驻阿尔及尔的共产党议员们，必须向人人都知道是设在法国的中央委员会请示。

“后来电台宣布，任命吕西安·米多耳担任工业生产委员，

艾蒂安·法戎担任公共卫生委員。从那以后直到最近，就沒有下文了。

“最后，伦敦电台告訴我們，共产党人所以还没有代表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是因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要挑选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人，而我們的同志們則坚持由我們党自己指定参加法兰西民族委員會的代表。

“这就是需要作某些說明的情况。首先必須明确指出，党中央委員會曾經明白表示，同意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时也指明参加的目的是坚决执行以前所提出的那些措施^①。

“可見，我們党在它应負的責任前面是不退縮的，它不仅确定了符合祖国利益的政策，而且还要指派自己参加政权的代表。

“有些人可能认为，抵抗运动中的党派和团体对自己的成員进行监督的作法是违反民主的，受人民委托的政府的首腦應該有权选用他所喜欢的人，而无須考虑体现着全民意見的各个組織。事实上，恰恰是这种作法违反民主。我們已經看到这种作法在最近几十年中所造成的恶果。

“人們还記得战前組閣时在各政党中曾經出現的人事更动，其結果是把賴伐尔和弗罗薩尔之流的坏蛋捧上了台。未上台的内閣总理声明他要独立行事，但是，如果說这种声明对有組織的政党來說还可能是真实的，那么，对某些經濟团体來說却不是真实的。

“倘若我們仔細看一看战前时期的閣員名单和維希政权的閣員名单，就会看出，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当上部长，是因为他曾經出錢为某个政党进行竞选，而另一个人則是因为他对电业托拉斯唯命是从……

① 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費尔南·格列尼埃所提出的五項条件。

“还有一些人是由于他們的奴才脑袋而被选用的。这才是沒有监督的制度，它同真正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因此，新法国要吸取过去的經驗教訓，而决不能再容忍领导人有失职行为。

“今天，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以目前代表着法国人民最高权力的抵抗运动的各个团体为基础的，因此，我們认为由抵抗运动中的每个团体自己指定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員是完全合理的。这样，每个委員活动的好坏都由他所属的团体負責，各团体必然不容許战前那样玩弄政治手腕的阴谋詭計重复出現，它們会指派自己的最称职、最坚定的成員，也就是有骨气有毅力的人。在目前許多重大問題亟待解决的时候，政府各委员会里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我們党在阿尔及尔进行討論时所发生的分歧，正是这个民主监督的問題。真正民主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民代表受他們的委任人的监督，只有不是取消各团体对自己成員的监督，而是使这种监督有效，才能避免那种曾經給法国带来无限灾禍的政客作风重复出現。如果每个团体都感觉到对自己的成員負有責任，它所指派的代表只能是正直无私和勇敢的人。人們再也不会看到象經過一系列不可告人的活动之后爬上台的、被絕大多数激进党議員大罵不休的乔治·龐奈那样的人了。

“共产党内部不容許任何清白和爱国心可疑的分子存在，它选作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員的同志都是因譴責希特勒第五纵队的慕尼黑政策及其叛卖行为而遭到希特勒第五纵队迫害的人。他們为祖国受过苦，这一点，甚至連某些在法国抵抗运动中不冒危險和不担負艰巨任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

“在法国本土进行战斗的、連戴高乐將軍也大加称贊的共产党人，对于几个月前获释的議員和最近从法国到达阿尔及尔的

議員沒有任何不同的看法。他們都是民族解放事業的戰士，對於他們的任何歧視都是不能允許的。

“法蘭西的利益要求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必須有共產黨的代表。共產黨要執行它指派自己的黨員去擔任委員的權利，是決心本着它作為這樣一個大黨的責任感來行事的，這個大黨目前在為恢復法蘭西的自由、獨立和強大而進行的鬥爭中是先鋒，將來它在為復興法蘭西和爭取實現以尊重人民主權為基礎（否則就不可能有強大鞏固的政權）的真正民主的行動中也要站在最前列。

雅克·杜克洛”

關於這個原則問題的鬥爭，在安德烈·馬爾梯、弗朗索瓦·皮佑、弗洛里蒙·邦特、費爾南·格列尼埃、安德烈·麥爾西埃和亨利·普爾塔累等人代表共產黨出席的諮詢會議上，一直沒有停止過。

法蘭西抵抗運動按照規定所委派的民族陣綫的代表，始終沒有能夠出席諮詢會議的會議。他們幾次打算從秘密機場乘飛機動身，都被人們以種種借口推遲了，取消了。這種一再阻撓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民族陣綫的三個代表中有兩個是共產黨員（亨利·瓦隆、洛朗·加桑諾瓦）！

鑑於在法蘭西本土對抵抗運動貢獻最大的共產黨人始終被排斥在政權之外，共產黨於1943年12月23日在北非成立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委員會“代表團”，以便加強以前委派的負責人的權力。

這個代表團的成員有：中央委員巴爾托利尼、伯利奧、皮佑、邦特、科爾納萬、科斯特、克羅瓦札、法戎、馬爾太耳、馬爾梯、米多耳、羅歇；還有派往北非的代表格列尼埃、普爾塔累，以及中央委員會所屬殖民地委員會書記洛茲雷。

中央委员会的这个代表团是在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之后成立的，它的任务是确保所有同党的领导机构失掉联系的地区的共产党员的配合和行动。这个代表团的政治目标就是德黑兰会议所拟定的政治目标，即在苏联从东方进攻欧洲的同时，从西方和南方进攻欧洲。

这个代表团在争取开辟第二战场、争取在法国登陆、争取共产党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争取向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运送武器和经费等方面的斗争，都是按照党的战争目标一丝不苟地执行的。

代表团的办事处是由马尔梯、皮佑、邦特、法戎、克罗瓦札和米多耳等人组成的。费克斯负责组织工作，弗洛里蒙·邦特领导《自由》周刊。

在法国本土肩负战争主要担子的共产党员，并没有等到伦敦或阿尔及尔方面给予帮助以后，也没有等到盟军登陆以后才进行斗争。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 1943 年 11 月 15 日发表的第五十一号公报证明了这一点：

“在 11 月 6 日到 13 日的一周中，我们的游击支队炸翻了十三次火车，有十二台机车和二百多节车皮完全摧毁。从 11 月 1 日到 13 日，有一百二十五台停在不同车库里的机车被破坏得不能使用。

“在博安和圣康坦之间，炸翻了一列油车。使敌人损失了四十万公升汽油，七个押车的德国兵被打死。

“在北方各运河上，破坏小组炸毁了四个水闸。炸沉了一只向德国运麦的快艇，凿沉了三十二艘平底驳船。

“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义勇军游击队打死了二十二名德国秘密警察和十四名为敌人效劳的特务。在阿尔萨斯，还烧毁了一

百二十五个被德国鬼子由原业主手里霸占去从事經營的农場。

“在萊訥省，一个游击支队在被敌人包围的威胁中进行了战斗，然后突破包围。在这场战斗中，打死德国鬼子四人，俘虏三人。在索恩—卢瓦尔省，为了支持矿工罢工，一个游击小组炸毁了布朗济和蒙索累明之間的一座运河桥。在歇尔、維也納和科雷兹等省，游击队同占领軍进行了多次战斗。

“在巴黎，有人向舒瓦泽耳街一个駐扎德軍的場所投擲了手榴弹，炸死德国鬼子五人，炸伤多人。”

为了对付这些武装行动(1943年11月份达八百零九次)，德国人不得不进行一場名副其实的內地战，主要是在阿尔卑斯山区，因为在那里，馬基游击队同他們展开了規模越来越大的战斗。法国人不能再无视共产党人英勇参加这些預示着解放起义的战斗的事实了。

戴高乐终于让步，接納了站在抵抗运动最前列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这只是1944年4月4日的事情。

第九章

迎接第二战场的开辟

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之后，把总动员的范围从德国青年扩大到老年人身上，以填补他的军队中的空额。这样一来，德国的工厂和田野也骤然为之一空。为了弥补这批劳动力，希特勒决定通过 1944 年 1 月 4 日的法令强征一百万法国工人和农民，分批到德国去劳动，每个月要去九万一千人。

但是，以巨人的步伐解放乌克兰的红军，把这项计划打乱了。

反对征调法国劳动人民和大学生的爱国抗议浪潮汹涌澎湃。1944 年 1 月整月，各工厂，各行政机关，连同巴黎大学，都弥漫在示威游行之中。大批逃避出发命令的被征青年源源涌向马基游击队。

大量传单的散发和同受到强征威胁的青年的接触，使得流放工人的官方机构变得冷冷清清。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对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的袭击，使这些相应的措施收到完满的效果，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感到安全，甚至连极少数自愿应征的糊涂虫也是如此。

从事征召工作的人也没有逃避了惩罚。在巴黎，负责押送法国青年到德国去的党卫军团长、行政长官索凯尔的助手里泰被打死。在马赛，一个名叫库费的义务劳动局局长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这时候，达尔南的法西斯民警队却更加积极地为敌人效劳，

他們竟然采取了墨索里尼黑衫党的手法，严刑拷打，胡作非为。人权同盟的主席維克多·巴希公民就是1944年1月間在罗訥省一个村庄避难时被他們杀害的。

但是，鼓舞全欧抵抗战士采取配合行动的紅軍的胜利前进，宣告投敌分子横行霸道的日子已經到头了。

当然，大部分法国人比較容易听到伦敦电台的法語广播。但是，人們在截听莫斯科电台广播的苏联情报局的簡明公报中，得到了一股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这里我們举出一份关于1943年夏季(即从7月5日到11月5日)战果的公报为例：

“战綫平均向前推进了三百到四百五十公里。

“解放土地三十五万平方公里。

“解放地区三万八千处，其中包括一百六十二个城市。

“消灭德軍一百四十四师。

“打伤德軍一百八十万人。

“俘擄德軍九十万人。

“繳获或击毁敌人的武器：

“飞机一万零一百八十九架，坦克一万七千七百辆；

“重炮一万九千八百門，机枪七万四千四百六十挺；

“迫击炮一万九千一百八十門，卡車七万五千九百八十二辆”。

抵抗运动乘苏联胜利的有利条件，利用人們听到2月14日列宁格勒解围的消息而高涨起来的情緒，加强了活动。甚至在維希的監獄里，都展开了抵抗运动。1944年2月19日，被押在埃斯中央監獄的一千二百名政治犯举行了暴动。他們拿起事前拆成零件运进去的冲锋枪。典獄长和維希政府派来的总监都作了爱国政治犯的俘虏。但是，監獄当局利用一向歧視政治犯的

普通刑事犯，对政治犯进行了残酷的惩罚。战斗从十六点开始，到第二天早晨四点监狱被三千敌人包围时才停止。德国人在监狱的墙下支起了一排迫击炮和七十七毫米重炮。当时暴动者只能选择一条路：投降或者全部被消灭。人们进行了谈判。被俘的典狱长答应不进行任何报复。但是，那些曾经吓得发抖的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报复。一个爱国者因为在队伍里动了一下就被打死，另有十二名爱国者被枪毙，赖伐尔把剩下的人交给了纳粹分子，纳粹分子把他们送进了死亡营，其中有六百人死在焚尸炉里。

伦敦的参谋部无视这次暴动。后来，人们竟敢否认在参加这次爱国行动之后幸得生还的人的抵抗战士的资格。

“1944年初在埃斯监狱发生的暴动不能算作抵抗运动章程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的正式抗敌行动！”一个戴高乐的部长发布命令说。

由于缺乏联系，其他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都没有得到这次暴动的消息，否则肯定会引起其他的暴动。

为了一个可靠的、能够随时随地应付正在酝酿着的决定性事变的组织，共产党发起了吸收党员的运动：“为了法国的自由发展党员”。

号召爱国者加入法国地下共产党的队伍的那篇文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篇文件在颂扬了在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之后，告诉了人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是怎样的党：

“在共产国际这个有着铁的纪律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法国共产党，是一个不允许政治野心家和居心叵测的冒险家有藏身之地的党。这是一个由不为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们组成的党，这是一所培养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学校，是一个深信其力量在于它是真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和斯大林学說的男人和女人的集体。

“共产党人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即同十八世紀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唯物主义有联系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且由于認識社会的发展規律，懂得从現在起已經存在把共产主义这个人类最早的、最美好的理想变成具体现实的条件。

“共产党人被他們的敌人描繪成粗鄙的唯物主义者，即庸俗的享乐主义者，然而事实证明，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的共产党人懂得为解放全人类和寻求人类幸福的这个指导自己前进的伟大理想而自我牺牲。

“……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在运动的每个阶段識別什么是可能实现的和什么是不可能实现的党，是一个善于以现实主义精神去判断各种情况并且在自己应負的責任面前从不后退的党。

“……共产党是一个党紀对所有党员都是一样的党，在为解放祖国进行无情斗争的現阶段，正常活动时期的党员群众对各级领导人的活动的民主监督为准軍事紀律所代替，任何党员，只要他完不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就必须受处分，不論他是什么人。”

为了法国的自由发展党员的号召书最后写道：

“参加法国共产党吧！”

“法国共产党要求所有願意为团结法国人民为解放和复兴祖国而斗争的法国男女，通过自己所認識的党员的介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那些想入党而又沒有認識的党员可作介紹的法国人，只須找两个邻居、朋友或同事，同他們共同組成一个党的三人小組，这个小組要从事宣传工作，宣揚本号召书所包括的观点；要从事組織反流放和反饥饿制造者的斗争；要組織爭取切身利益的行动，以及尽力为义勇軍游击队的分队吸收新战士。

“党的这些出自群众主动創造的三人小組，不論由同党失去

联系的老党员组成的，还是由新党员组成的，都会很快地通过它们的共产党式的行动引起党的地区组织的注意，或者它们最接近的区委会的注意，并且会很快地建立联系。

“在我们所处的严重时刻，法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建立党的一些新的三人小组、新的支部（最多包含三个三人小组和一个由三个同志组成的领导机构）和一些负责一个或若干个单位的新的总支，总支将参加党的地区委员会，并且加强我们伟大的党为法国最大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

“在建立党的三人小组的时候，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新成员必须注意保守自己小组的秘密。必须懂得摆脱敌人的监视，注意少说闲话，警惕吹牛皮，千万不要说某某最近参加了共产党，千万不要忘记德国鬼子和为他们效劳的维希特务是阴险而又狡猾的，为了祖国的利益，必须比他们更狡猾。

“法国男女们！参加法国共产党吧！壮大我们的队伍吧！做你们的共产主义爱国者的工作吧！出版和散发党的宣传材料，为党募集基金，为义勇军游击队的分队吸收新战士，组织各种形式的对敌活动！在做这些爱国工作的时候，必须谨慎小心，不要暴露自己，以免敌人的打击。千万不要忘记，被捕常常是由于缺乏警惕而造成的；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人的职责就是置身于最优秀和最忠实的民族解放战士的行列之中，他们的最高法律就是‘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以加速敌人的崩溃。’

“参加法国共产党就是投身于最积极、最英明和最勇敢的钢铁队伍，就是加强为团结全体法国人民而斗争的党，就是参加恢复法国的独立、自由和强大的解放斗争。

“法国男女们！参加法国共产党吧！参加由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马尔梯、贝诺瓦·弗拉商、马赛尔·加香、阿尔图尔·腊梅特、加斯頓·蒙穆索、吕西安·米多耳、弗

朗索瓦·皮佑、夏尔·狄戎以及其他許多英明正直的、始終言行一致的領導的党吧！”

地下党領導在进行旨在壮大自己队伍的运动的同時，也加強了对非共产党的抵抗团体的主动行动，以加速它們的統一。

由于社会党領導机构的分裂及其組織上的軟弱，同地下社会党接近还不太容易。

同伦敦戴高乐派取得联系、很早就在伦敦駐有代表的社会党，最初主要是从事“情报”活动，而法国共产党中央地下領導并没有重視它同伦敦方面那些受英国情报局或戴高乐的秘密机构即所謂“中央情报与行动局”直接控制的、也就是法国社会党賴以存在的机构的联系。

此外，我們在后面将会看到，在解放巴黎期間，社会党的領導人达尼埃·麦耶和勒特劳盖曾怎样勾結戴高乐分子一起反对共产党的抵抗战士，以便强制实现对占領軍有利的“停战”。

只有不多黨員的地下社会党的总書記达尼埃·麦耶通过1943年8月的一封信，指責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乔治·馬腊納曾經想“教訓別人怎样做地下工作”，指責他对于共产党烈士和社会党烈士不同等看待，硬說馬腊納說过“馬克斯·多尔摩亚的死不能同加布里埃·佩里的牺牲相提并論”，等等。

共产党代表对社会党代表苏珊娜·比松的指責和怀疑是不恰当的，至少在涉及到她的問題上是如此。这位女战士在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之后，尽管遭到严刑拷打，但是并没有說出同法国共产党代表定期联系的地点。她被送进死亡营，再也没有回来。

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很快就被一种純粹是通过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社会党的承认而制造出来的假团結的傾向所代替，人們給了这个社会党一种与它的实际影响毫不相称的代表性。

法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在拒绝了社会党提出的建立一个由两名共产党人和两名社会党人组成的“调解委员会”（显然，这不是根据两党的力量按比例分派代表的）的建议之后，反而进一步建议两个工人政党完全合并。为此，人们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谈判，甚至在解放以后还在进行这种无结果的谈判。

社会党领导人假借这种合并的建议炫耀自己，以便进行对等的讨论和追求一种徒有其表的势力。这种统一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把那些由于党的无组织性而分散到各个抵抗组织中或者已经完全停止活动的前社会党党员重新组织起来的保证。

1944年3月，各种抗敌力量的合并加速了，武装起来的战士都统一到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中去。于是全国抗敌委员会拟出了一个解放和恢复民主的纲领。

这个在1944年3月15日通过的纲领，要求惩办卖国贼，没收他们的财产；把垄断资本和主要的动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它要求把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它要求给予产业工人参加本企业领导的权利，并且提出了一项改善工人的生活、劳动、休息和社会保险条件的计划。

抵抗人员和战斗人员本着广泛团结的思想，自动成立了一些秘密解放委员会，以便取代已经解放或正在解放的市镇和省份的维希政权。但是，全国抵抗委员会常常干涉这些委员会的委员人选，它规定一些带有日后分裂种子的别有用心的比例。马基游击队员和法兰克团的战士需要阿尔及尔和伦敦给予大量的援助，但这种援助总是空头支票，很少兑现。

为了把共产党驻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所遇到的困难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并找到制服戴高乐观望态度的办法，科松璠受代表团的委托，要求把自己空投到法国去。他在途中失踪……从各

种迹象来判断，他是被人杀害了。

但是，采取行动和向法国战士提供自卫和进攻的手段已经刻不容缓。

德国秘密警察的迫害活动变本加厉了。1月3日，在锡涅（瓦尔省），由于一个伪民警的告密，爱国青年联盟武装力量的十二个人被五十多名纳粹士兵、特务和伪民警包围。十二个青年一直战斗到弹药打光了的时候，他们打死了四个德国兵。被俘的几个人被割掉耳朵，剜掉指甲，削去睾丸，然后被枪毙在希特勒分子事先强迫他们挖好的坑边。

纳粹分子发现一个七十岁的老牧羊人看见了这场屠杀，当即把他打死。这件事是一个头部中弹之后逃出来的年轻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员说的。

有好几百名受牵连的爱国者急忙赶到土伦，但是已经太晚了。

4月1日，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诺尔省一个叫做阿斯克的小村附近，炸翻了一列向东运送一个德国装甲兵团的火车。

没有发生伤亡。但是，党卫军闯进了村子，把各家的男人，不论成年、儿童和老人，都赶到肇事地点，用机枪把他们统统打死在路基的斜坡上。

被打死的共八十六人！阿斯克的副本堂神甫库赞去救助伤员，也遭到毒打，他在地上呻吟了好几个钟头才死去。吉雅尔神甫请求当局准许他在处决他的客人——“被查获的”从敦刻尔克来探望他的人——之前为他们祝福。当局答应了这个请求，但随后也把他打死了。

在洛特省的弗雷锡内一勒一杰拉发生了大屠杀，在尼姆有十七个爱国者被绞死，在圣克劳德（汝拉省）发生了一系列暗杀事件，连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此外，人质被流放，房屋被烧

毀，俘虜遭到嚴刑拷打。

皮埃爾·布羅索累特在空降到法國之後被捕。當敵人帶他去受審的時候，他恐怕在德國秘密警察的拷打之下暴露了機密，就從桑第監獄的六樓上跳樓自殺。

格利埃爾高原的馬基游擊隊由於缺乏武器，在飛機轟炸和德國軍隊與偽民警的包圍之下被擊潰。為了對付這五百名游擊隊員，德國人動用了空軍、炮兵和整整一個師的軍隊……

是誰把這支馬基游擊隊的位置告訴敵人的呢？是兩個被游擊隊抓獲而沒有殺掉的偽警察。這兩個警察逃跑之後，就去向占領軍及其走狗告密，作為對游擊隊給予他們的寬大的報答。

這種教訓雖然付出了重大代價，但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到1944年5月，當法國共產黨地下中央委員會發出“準備和進行全國起義的指示”和義勇軍游擊隊及馬基游擊隊準備轉入一個新的戰鬥階段的時候，鬥爭達到了最高峰。

共產黨駐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和駐阿爾及利亞的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團的團員，在法國共產黨或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黨員和勞動者的支持之下，竭盡全力爭取阿爾及爾方面的更大支持。

1944年4月3日，戴高樂將軍任命弗朗索瓦·皮佑和費爾南·格列尼埃為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委員。前者擔任臨時政府的國務部長，後者擔任臨時政府的空軍部長。

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駐阿爾及利亞代表團發表了一項說明共產黨參加政府的政治意義的聲明，聲明說：“這一參加給政府增加了一股新生力量，使它能夠代表整個法國說話和行事，能夠領導、鼓舞和大大加強全體法國人民的作戰實力，能夠恢復我國在盟國大家庭中應有的地位。”

安德烈·馬爾梯在4月出版的《新法蘭西》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章中毫不含糊地明确了委托給共产党部长的这项任务是“加强在法国的作战行动”。文章談到：

“在我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两个共产党员担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委員。共产党人正是为了拯救民族，即为了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敌人和对效忠于敌人的持观望态度的卖国賊的斗争才参加政府的。”

同观望派、同不及时归来的人、同那些把反共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而害怕将解放的武器交給法国工人和农民的人的斗争，是一场严酷的斗争。

构成法国抵抗运动骨干的劳动人民，虽然通过阿尔及利亚的共产党人要求空投武器，但是他們并没有坐等空投武器。当秘密軍組織把收到的上百万金錢毫无节制地濫用掉，把得到的重要武器“埋藏”起来，留待所謂行动日使用的时候，后来并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义勇軍游击队一直用从占领軍手中夺来的武器困扰占领軍，打击占领軍，在生活上則依靠人民的支持。

納粹分子知道法国人民与抵抗人員是血肉相連的，他們就接連不断地屠杀人民。在錫埃日（汝拉省）把一百零五所房屋烧掉二十九所、枪杀居民五人、流放八人之后，在阿斯克大屠杀之后，他們又瘋狂地拆毀了馬基游击队附近的村庄和义勇軍游击队同他們作战的地点附近的村庄。

由于沒有人不知道法国共产党是站在同占领軍进行武装斗争的最前列的，所以入党的人非常踊跃。“为法国解放”而发展黨員的运动取得了成功。

領導着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勇敢善战的先鋒——的共产党，在民族陣綫里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它的号召变成了真正的总动员布告。1944年5月中旬，爭取法国独立的民族陣綫的各地区委員會都在組織人民准备投入最后的

行动。

这里我們举出民族陣綫普罗文斯地区委员会5月15日发表的一篇号召书(这篇号召书发表在秘密出版的《馬賽曲报》第六号上):

“工人們,技术人員們,企业主們,民族陣綫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向你們呼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挫敗‘梳洗’委员会,挫敗敌人在工厂里的大量征收,挫敗敌人的掠夺和向外移民政策,为此要立刻成立起你們自己的爱国民警队,因为只有你們的团結和你們自己的力量能够拯救你們自己。

“普罗文斯的男女青年們,民族陣綫号召你們拿起武器来。你們要怀着对納粹分子的仇恨,拿起冲锋枪,沿着巴拉^①、維雅拉^②、雅娜·阿賽特^③的足迹前进,为你們的兄弟报仇。你們要把自己鍛炼成純洁而又坚定的人,你們要同全体法国青年一起,以坚定的步伐前进,去爭取自己的自由和幸福。

“特务,宪兵,巡警,充当敌人炮灰的可耻的伪民警們,你們要破坏維希政府的命令,你們不要让自己沾上法国人民的鮮血;你們現在要用为祖国服务的行动来爭取你們将来的地位。党卫軍的工具达尔南向希特勒的宣誓只是代表他自己,并不代表你們! 在检查我們的身体的时候,你要閉上眼;看到我們的传单的时候,只当沒有这回事;在逮捕我們的时候,不要动手。总而言之,你們要作法国人。要記住,即便是在警察局里,民族陣綫也

① 巴拉(Joseph Bara, 1779—1793),法国少年英雄,1793年参加共和軍,在一次陷入埋伏敌人威胁他喊“国王万岁”时,他高呼“共和国万岁”,因被杀害。——譯者

② 維雅拉(Joseph-Agricol Viala, 1780—1793),法国少年英雄,因企图砍断保皇軍过杜朗斯河的浮桥的绳索而牺牲。——譯者

③ 雅娜·阿賽特(Jeanne Hachette, 1454—1472),法国女英雄,1472年为保卫故乡城市博韦而牺牲。——譯者

在監視着你們；要記住，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對犯有賣國罪的人處死刑。

“各行各業的納稅者們，你們不要再交稅！你們的錢養活着壓迫你們的人。沒有錢，維希政府就不能維持它的成群的特務、坐探和搜查員。連一個銅板也不要再給德國鬼子！”

“農民們，拿出禾叉和槍支來！你們應該掩蔽法國人，你們要把收穫物只留給法國人。

“鐵路工人們，你們既要用機智又要用暴力進行破壞。偉大的皮埃爾·色馬爾留給你們的遺訓就是行動。

“公務人員們，你們要銷毀各種卡片；要給愛國者提供偽證件和配售券；要向義勇軍游擊隊供給情報；要破壞維希的政權機器。你們要以現在為法國服務的行動爭取將來為法國服務的權利。

“抗拒勞役的人，你們不要消極等待了！你們只有參加義勇軍游擊隊進行戰鬥，為我們共同的大勝利作出貢獻，才能保全你們爭取到的留在法國的初步勝利。

“戰鬥的時鐘已經響了！……”

另一些單位雖然也參加了“法國國內武裝部隊”，但是他們卻阻止愛國民警隊的成立，因為他們害怕武裝工人階級。

全國抵抗委員會全國委員會的委員皮埃爾·維戎，在軍事行動小組委員會中一直維護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軍事委員會的立場。

法國人民對於愛國起義已經作好準備，但是蘇聯向它的盟國發出正當呼聲的、抵抗運動為之準備好了有利條件的“第二戰場”還沒有開辟。

在紅軍解放了敖德薩和盟軍包圍了羅馬之後，納粹匪幫全面退却，他們只是死死地抓住法國不放。英美統治者再也不能

拖延世界各国人民所期待的、誰都知道将会加速战争結束的那种行动了。

1944年6月6日，正当薩瓦省的馬基游击队由于許多爱国者(他們决心为不久前在于任被屠杀的二十八名人质报仇)参加进来而加强了的时候，传来了盟軍在諾曼第海岸登陆的消息。

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

第十章

解放战斗

行动日，1944年6月6日，盟军大反攻在早晨两点开始了，一千架轰炸机向从勒阿弗尔到瑟堡的“大西洋之墙”投下了数以吨计的炸弹。紧接着，有九百架飞机在科汤坦空投了十三万人。

斯派达尔通知柏林，一个宽二十五公里、深五公里的桥头堡已经建立，交通被切断了。

这时盟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因为德国在东线以外可以调用的一千八百架驱逐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保护合成汽油厂和铁路枢纽免受不断的轰炸了。

敌第三装甲师在距离海岸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它在到达战场以前的三天当中，就损失了一半坦克。盟军的飞机出击了一万架次，舰只在一天之中向敌人发射了三千发重型炮弹。登陆船只源源运来生力军和物资。到6月10日，法国已经有十八个装备着强大火力的盟军师。

得到盟军登陆的消息之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要求党员尽力促使全体人民投到解放法国的战斗中去，要在力所能及的一切地方自己解放自己。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全国军事委员会在行动日那天，就下令全体义勇军执行预定的计划，根据每个地区的军事条件采取一切主动行动。

6月8日，中央委员会驻北非代表团也发出了号召，谴责那些置身于战斗之外主张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把希望寄托在等

待战斗結束上”的人，同时大声疾呼：“給法国以武器！”

当登陆部队在諾曼第建立了一些全面进攻的基地的时候，党中央委员会散发了一份关于《共产党与军队》的重要文件。文章着重指出：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任何法国人都无权置身于行动之外。武装斗争决定着这最后阶段的一切。

“那种要法国人相信可以让盟军来解放自己而不必全体同他们并肩作战的说法，或者要他们相信在这场战斗中几万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就足以代表法国人的说法，都是犯罪行为。这样理解法国参加解放国土的战争对法国的声望和前途是不利的。

“因此，必须使人民群众即刻最大限度地投入各地的斗争中去。

“所有在这一时刻竭力阻止人民群众在解放全国的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人，都要对法国声誉的贬低和法国遭受牺牲和苦难的延长负责。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任务首先是进行游击战争，在一个仍然处于被占领的国家里，在沒有重武器和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战争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的盟国，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任务必须是消灭敌人的力量，而要把其他次要的考虑放在第二位。因此，对于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领导人来说，他的艺术就是打击敌人的要害，而且要以最小的代价造成敌人最大的损失。

“必须根据这种军事思想去考虑和领导占领村庄和城市的行动，要让群众参加这些行动，以便抽出游击队的武装力量去投入战斗，同时壮大游击队的武装力量，使他们能够到别处去打击敌人。

“每个市区，每个村庄，每个工厂，必须不惜一切力量团结起

来，武装起来，从事战斗。这是唤起每个爱国者的口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要时刻不忘和鼓舞他们的意志的口号。”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执行了这个口号，义勇军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的第二号公报中曾明确指出：

“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千百万法国男女动员、组织、奋起前进和投入战斗的速度。目前只有一支先锋队武装起来，参加了战斗。必须在最短期间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使他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战斗中去。”

实际上，全国军事委员会曾向全体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一、加紧建立‘爱国民警队’；

“二、把主要打击对准纳粹战争机器的主要中心，使敌人的交通完全瘫痪。把国家的工业中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三、武装农民，特别要在纳粹军队的要害地方武装农民，让农民自己动手肃清自己村庄里的德国鬼子和卖国贼。”

这些指示是这样结尾的：

“要记住，在全国起义中，守就是死亡；不杀敌人的人就是被敌人杀死的人。”

这些口号的大部分都实现了，群众起义到处发生。

纳粹分子怒不可遏，恐怖使得他们十倍地疯狂了。

在屠耳，他们在遭到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一次成功的袭击之后，吊死了九十九名人质；两天之后（1944年6月10日），“帝国”党卫军师在奥腊杜尔—絮尔—格拉訥屠杀了六百居民。男人被杀死，妇女和儿童被活活烧死在教堂里。

应该接受一个教训：这就是必须根据有组织的战士的实际力量，把盟军的逼近和解放战斗的发动很好地配合起来。

在抵抗运动的实际力量中，还必须避免过分乐观地或过分

肯定地估計其他团体所宣布的人数。

利木贊馬基游击队的負責人岡古安同中央領導机构之間发生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岡古安拒絕接受由“中央聯絡員”莫利尼埃(欧仁)传达給他的在 1944 年 6 月就夺取里摩日市的命令。毫無疑問，这里涉及到起义指示的坚决执行問題，因为，即使馬基游击队确实有力量夺取这个城市，也必須考虑到周围的环境。

如果执行这个指示，里摩日就会成为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华沙，必然要遭到法国中心的全部納粹军队和維希军队的瘋狂扑灭。

这是因为，各省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不仅組織程度不平衡，而且其中还包含秘密軍的核心組織，这些核心組織同英国情报局的联系要比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密切得多。主要的空投物資都落到他們手里，而他們最关心的事情已經成为公开的秘密，簡單說就是：千万不要武装共产党人！

当然，否定构成情报网的抵抗单位的作用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他們有力地而且往往英勇地帮助了战略轰炸的成功和盟軍反攻的胜利。但是，他們的錯誤在于低估了盟軍登陆前后在法国本土展开群众性战斗和游击战的必要性。他們的錯誤还在于他們受着政治成見和反共思想的支配，常常給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在許多地方，同样属于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战士，却致力于一种徒劳无益的行动，比如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要設法寻找秘密軍留作行动日用的武器隱藏所，以便馬上能够用来打击占領軍！

但是，积极的抵抗运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大踏步地前进了。

为了庆祝 1944 年 7 月 14 日，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全国軍

事委员会建議組織一个“吸收抗拒为德国人服役者和各社会阶层爱国者参加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入伍日”，同时为了配合全国抵抗委员会发出的总罢工号召，它又向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官兵发布命令：“你们要以同你们的光荣的过去和你们在武装斗争中所赢得的光荣地位相称的行动来纪念7月14日。

“为了消灭敌人的兵力和一切力量，也就是为全国起义創造决定性的条件，要不間断地无情地进行打击。”

在图迪克和格罗欽斯基周密地准备了战斗行动的巴黎（別利維尔区、共和国广场和民族广场），德国人和“法兰西”警察已經无力阻止群众集会。人民群众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一直在街道上，这时候，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弗罗惹上校的领导下严密地保护着示威游行。

图迪克和格罗欽斯基在亲自为各个群众集会之間进行联系时，被別动队逮捕。他们在押送他們的汽車上同看守进行了一番搏斗之后逃走。图迪克被一梭冲锋枪弹打死，格罗欽斯基受了伤，跑回他的“隐蔽所”，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把他送到圣安东医院，一个外科医生立刻給他动了手术。

同一时刻，外省的許多大城市和小村庄也出現了类似的場面。示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裝飾着三色彩带的自行車队伍到向烈士墓献花，从凭吊抵抗运动英雄們的遇难地到公开张贴标語。在馬賽，一个貼标語的示威群众受到一个想要逮捕他的警察的质問。这位爱国者当即掏出手枪，取下了那个哀求饒命的警察的手枪。

在預示着决定性胜利的統一中，巴黎有五万人示威游行，全法国有几十万人示威游行，1944年的7月14日成了对納粹占領者的最后一次大警告。

这个新的决定性阶段使法国人民及其战斗的先鋒队付出了

重大的代价。义勇军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对陷入绝境的敌人所进行的打击，激起了敌人的杀人狂。东线的消息打破了希特勒胜利的一切希望。现在，红军已经在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初期被抢走的领土上取得胜利了：维耳诺、卢布林……紧接着是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都相继从纳粹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屠杀、焚毁村庄、处决人质，只起了加速人民群众动员的作用。成千上万的平民、安详的老人、青年、妇女等各社会阶层的公民变成了抵抗运动的战士、供应人员、联络人员或者情报人员。

* * *

在诺曼第，盟军的进攻正继续向前推进。6月12日，德国第二党卫军装甲师的坦克几乎刚一离开掩蔽处，就被打得七零八落，完全毁灭了。

到7月2日，盟军已经海运和空投了一百万士兵，十七万辆运输车辆和六十万吨给养。

隆美尔在7月15日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说，他在战火中损失了九万七千人，其中有二千三百名军官和二十八名将官，而他所得到的援军只有六千人。这是因为德国的绝大部分后备兵力集中在东方，而且在那里也正经受着红军的严峻的考验。

在盟军部队接近的时候，城乡人民在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其参谋长为共产党员马勒雷（焦因维耳将军）——的带动之下，攻击占领军和投敌分子，自己解放自己，往往是在已经“肃清”了的战区迎接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武装部队。

在山区，游击队向德军分队和交通要道进行了不断的袭击。德国参谋部发动了疯狂的镇压，以压倒的优势同他们作战。在战斗中，参谋部使用了它所拥有的一切毁灭性的手段。

1944年7月7日，維尔高尔的游击队就受到了这样的攻击。

当时有三万納粹军队包围了三千五百游击队员。被包围的游击队员通过无线电同阿尔及尔进行了联系，要求阿尔及尔派空军支援和空投武器。雅克·苏斯戴尔所领导的情报机构没有把这件事通知由共产党员担任的空军部长。

游击队员一面发出始终得不到答复的紧急呼吁，一面英勇战斗。

有二十三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其中士兵十八人、准尉三人、中尉二人）自动到前沿阵地的一个山洞里，用机枪扫射包围的敌人。敌人遭到了重大的伤亡。

当敌人能够往洞里投掷手榴弹的时候，这些手榴弹很快又被洞里的人朝着敌人扔回去。

納粹分子终于来到这个已经被包围了的山洞的上面。他们放下的一个五公斤炸药盒在洞口爆炸了。幸免于死的十八个人拚命往外冲，结果逃出了这个洞。

那些在高原上等待阿尔及尔方面增援的人进行了决死战斗。当所期待的滑翔机终于来到的时候，着陆的却是德国人！是五百名配备着重机枪、携带着馬基游击队所没有的弹药的德国人！于是对战士和居民，妇女和儿童进行了残酷的屠杀。敌人把他们或者用长木槌穿入肛门扎死，或者車裂而死，或者活活副死，或者用屠宰场的铁钩吊死。连医院里的四十名伤员和他们的护士和医生也一起惨遭杀害。

后来，当费尔南·格列尼埃在7月2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明如何利用飞机支援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維尔高尔的馬基游击队已经被消灭。该游击队在最后一封电报中说道：“那些呆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人对我们的处境

毫无了解，應該說他們是罪犯和懦夫。”在这封电报上签字的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是埃尔維厄总司令所领导的參謀部。

費尔南·格列尼埃在写給戴高乐的信中說，“他决不同意参与在我們法国的兄弟請求援助的时候不用我們所掌握的行动手段的罪惡政策。”

戴高乐无理地要求費尔南·格列尼埃撤銷他自己所說的話，并作出书面道歉，否則就要把他赶出临时政府。格列尼埃遵照駐阿尔及尔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的命令发表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违反事实地說：

“政府尽了一切可能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馬基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因为政府过去始終认为，現在仍然认为，在这最后的战斗已經展开的时刻，观望态度是一种背叛祖国的罪行。”

这封毫未耽擱就写好了的信，在內閣會議上宣讀了，第二天（1944年7月29日）又作为辟謠发表在《阿尔及尔共和党人报》上，这家报纸曾經刊登的前面提到的那个声明就这样否定了。

于是戴高乐說：“好，事情已經解决了。一笔勾銷。”

这个令人难堪的妥协，后来并没有能够阻止戴高乐在他来到巴黎的时候把格列尼埃赶出他的內閣。

* * *

1944年8月7日拂曉，遵照希特勒要求开辟一条海上通路的命令而重新集結起来的四百辆德軍坦克，在馮·克魯格的指揮下又进行了反扑。

但是，天刚破曉，就有几百架盟軍轰炸机輪番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准备支援装甲师的三百架德国驅逐机有的被消灭在地面上，有的被击毀在起飞时。装甲师被炸得落花流水，敗退下来。这个由目空一切的納粹將軍庫尔特·迈耶指揮、拥有二百

多辆坦克的装甲师，剩下的坦克不过四十辆了。

諾曼第战役使納粹軍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死伤二十四万人，被俘二十一万，損失坦克一千五百多辆，他們已經潰不成軍。

在这次战役中，抵抗运动的队伍起了重大作用，他們騷扰敌人后方，阻撓或防止铁路和公路运输，切断敌人的交通联络线，給盟軍提供情报，作向导。但是，如果认为抵抗武装可以自己消灭这样多的敌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解放法国，那就夸大了。

认为抵抗运动是多余的想法和认为盟軍的登陆不过是一种輔助的想法，也是同样可笑的。

* * *

8月10日，爆发了铁路工人总罢工，铁路工人坚决不开动占领軍的列车。这次罢工是在圣乔治新鎮的分类站爆发然后迅速蔓延起来的。

义勇軍游击队在現場保护着罢工，并率領铁路工人攻打了儲存他們所缺乏的武器的納粹軍仓库。

邮电局也参加了罢工，后来連警察局也参加了。

8月14日，巴黎全国解放委员会发出了起义总罢工的口号。

8月15日，由夏尔·狄戎领导的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把参謀部設在巴黎，以便指揮主要战斗。参謀部的地址为第十二区圣芒德大街四十一号。

当盟軍装甲部队接近首都的时候，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已經使占领軍无法自保了。

人們創制了十多吨輪胎爆裂器，战士们把这些輪胎爆裂器撒在伊耳德法兰西地区的所有道路上，于是德国人驅赶塞納—馬恩省和塞納—瓦茲省的居民去清除他們的車輛瘫痪在上面的道路。在东方和南方的各铁路线上，翻車事件越来越多，铁路已

經不能通行。香巴尼—絮尔—塞納水閘被破坏两次，人們凿沉了一些平底駁船，使它阻塞航路。

在費尔太—果歇，由于火車接二連三地出軌，四万要去增援諾曼第前綫的德軍无法开上去。

1944年8月15日，发行了秘密出版的《人道报》的最后一号第三百一十六号。从此以后，《人道报》就准备公开出版了。

8月16日，納粹分子在布伦树林的瀑布下处决了三十四名年輕的示威群众。屠杀非但没有能够阻止住罢工，反而使罢工运动扩大了。8月18日，罢工普遍展开。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公布，据证实，德国人在四天当中处决了五百人。

盟軍的装甲部队逐步向前推进，人民起义走在他們的前面并帮助他們。盟軍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將軍在8月发表的一篇公报中不得不承认：

“6月6日以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大大加强了活动的步伐并扩大了活动范围。这支軍队进行了大規模的破坏活动。他們对铁路的破坏特別有效。他們襲击德国駐軍，占領村庄，展开巷战，消灭敌人分队。游击战活动达到了高潮，而且在某些地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已經掌握了主动。”

就是在这些情况下，正当諾曼第的登陸軍队接近伊耳德法兰西地区的时候，巴黎地区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领导人、共产党员罗耳·湯吉在取得了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全国軍事委员会同意后，在巴黎及其郊区发布了“总动員”令。

第十一章

巴黎自我解放

1944年8月19日破曉張貼在被占領的、被罷工癱瘓了的巴黎牆上的總動員令中說：

“多少個月以來，成千上萬的巴黎居民一直在打擊德國鬼子和偽民警，燒毀或炸毀德國人的卡車、機動車停車場和為德國戰爭機器生產的工廠。現在，所有強壯的男人和婦女都應該參加到戰鬥法國的軍隊和愛國民警隊中來。”

集合在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參謀部的塞納省和塞納—瓦茲省的義勇軍指揮官們接到了下述命令：

“即刻奪取車輛，奪取能夠奪取的一切車輛。禁止車輛通行；並且要在這一天內在各地襲擊經過巴黎撤退的德軍輜重隊；在巴黎和巴黎郊區組織驅逐德國鬼子的行動。”

巴黎地區的共產黨議員也發布了一個公告：

《告巴黎地區人民書》

“我們號召巴黎地區的全体男女公民武裝起來打擊敵人，並加入本區、本單位或本企業的愛國民警隊，以便參加解放戰鬥和保護法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我們號召巴黎人民和巴黎廣大郊區的人民舉行解放起義。

“人人都要按照在全國抵抗委員會指揮下和在戴高樂將軍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領導下進行活動的巴黎地區解放

委员会对塞纳省的指示，以及塞纳—瓦兹省和塞纳—马恩省解放委员会对广大郊区的指示，参加战斗，这是巴黎地区全体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篇号召书上签字的有：

塞纳省参议员马塞尔·加香；塞纳省众议员：莫里斯·多列士、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马尔梯、加斯頓·蒙穆索、夏尔·狄戎、费尔南·格列尼埃、亚尔培·里加尔、雷蒙·居约、乔治·谷尼欧、安德烈·麦尔西埃、弗洛里蒙·邦特、亨利·洛兹雷、昂布魯瓦兹·克罗瓦扎、普罗斯佩·莫盖、奥古斯特·图夏尔、雅克·格雷萨、詹尼·伯利奥、阿耳弗雷·科斯特、艾蒂安·法戎、瓦德克·罗歇、阿耳贝尔·帕蒂。

巴黎市议员：莱翁·摩维、雷蒙·博絮、加斯頓·奥盖、埃马努耳·弗勒里、吕西安·蒙若维。

塞纳省省议员：乔治·马腊纳、亨利·古尔多、达尼埃·勒努、加斯頓·科尔纳万、勒奥纳尔、莫里斯·西莫南、库代尔克·巴尔贝。

塞纳—瓦兹省众议员：吕西安·米多耳、夏尔·贝诺瓦、让·杜克洛、安东·德姆苏瓦、皮埃尔·达多。

告人民书上还有在战斗中牺牲了的巴黎地区议员的姓名：加布里埃·佩里、夏尔·米歇尔、加尔代特、弗罗特、勒加尔、卡里乌、洛瑟朗、皮埃尔·色马尔、格朗代耳、奥弗雷；另外还有由于监禁期间的折磨而在出监后逝世的普拉萨依和执行任务时失踪的科松瑙。

既然本书的编著者只限于追述共产党地下总领导机构和战斗部队参谋部的指示，为什么还要特别提出这份告人民书呢？

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看出——不是从签字者方面，而是从主谋者方面——它标志着走上了埋没和排挤参

加抵抗运动的党员的道路的第一步。

必須指出，这篇告人民书所以又把一直躲在苏联的党的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的名字抬出来，是企图用議員的威望来代替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負責人的威望。

前面已經节录的这篇公告里还有这样两段話：

“我們号召有英勇的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参加战斗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战士们勇敢坚决地执行自己首长的命令。

“我們号召各市区和各单位的爱国民警率領群众行动起来，去占领公共建筑、車站、电报总局和电话总局、电力站、巴黎市政府和各区政府，以便撤換維希伪政权的代理人，解救被监禁的爱国者，逮捕敌人的代理人，粉碎祖国敌人的一切反抗并防止他們进行破坏。”

当然，議員中有一些是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的党员，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全国领导人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說这篇告人民书不是战前的議員企图取代战斗的抵抗运动的各个领导机构而越过这些领导机构以議員的名义发表的。有許多签名的人或是由于在1939—1940年被捕，或是由于象莫里斯·多列士、安德烈·馬尔梯那样躲到苏联去，都沒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战斗。

必須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这篇在必然实现的巴黎解放的前夕发出的“議員告人民书”，因而必須把它看成是莫里斯·多列士重新攫取党的领导权的第一个行动和逐步排挤在国内抵抗运动中經受过考驗和鍛炼的党的干部的第一个步驟。

8月19日早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法兰西島地区的领导人罗耳·湯吉上校发出了下述总行动命令：

“一、自即日十二时起，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所属各部队在巴黎市和整个 P1 地区进行巡邏；

“二、征用一切必要的車輛，以保证巡邏队的机动性；

“三、巡邏的路綫和次数应妥为规划，以便于各巡邏队互相支援；

“四、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占领公共建筑、工厂、仓库、电站、車站，等等；

“五、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所属各部队，包括警察部队、宪兵部队、共和国近卫軍和巡警，应一律佩带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臂章。

“根据胜利取决于人数的原則，必須立刻大規模地征兵。

“所有条件适合的男子都应遵照**总动员令**的附件編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必須把这个附件印刷张贴到 P1 地区。

“P1 地区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任务是：

“为胜利的盟軍打开巴黎的大門并迎接他們。

“本命令对塞納省、塞納—瓦茲省、塞納—馬恩省和瓦茲省一律有效。本命令已分別通知抵抗运动的各組織、警察解放委员会、各宪兵分队、共和国近卫軍各分队、各巡警分队。”

巴黎战役开始了。首先进攻巴黎警察总监公署、巴黎市政府和巴黎中心市場等公共建筑，并占领了这些地方。伪警察都被集中起来，强迫他們脫下“人民不喜欢的”制服，換上带有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肩章的便服。

三色旗在納粹占领巴黎四年之后又飄揚在巴黎警察总监公署和巴黎市政府的上空了。

爱国民警組織了中心市場食品儲备的保卫工作，以防德国人攻击和应该預料到的搶劫的企图。第一区区政府已經收复，但由于德国人布置在塞納河河岸和桥上的虎型坦克和机枪的猛烈射击又被迫放弃。敌坦克炮轰击在各地筑起的街垒，重机枪扫射一切可見的抵抗战士。

納粹軍隊企圖利用裝甲車保護或奪回公共建築，但手榴彈和燃燒瓶像雨點似地向他們擲去。愛國者不顧敵人匆忙貼出來的寫着“法國國內武裝部队的战士將一律按義勇軍對待”（即立刻處死）的紅色布告，就從屋頂和窗口反擊占領軍的進攻。愛國者已經用上他們從占領軍手中奪得的機槍。三百名法國國內武裝部隊從聖雅克大街和塞納河左岸攻擊企圖重新奪回警察總監公署的德國坦克部隊。人們立刻把新得到的武器彈藥分發給赤手待命的新兵。

8月20日，星期日，到處都在進行戰鬥。收復了電話總局。在書籍出版社工人的幫助下收復了占領軍新聞印刷所。郊區也響起了各種槍聲。愛國民警冒着敵人的坦克炮火進攻萬塞納炮台，拿下了德國人據守的警察局。從維勒瑞弗拆卸下來的完整的變壓器由愛國者保管起來。

當戰鬥已經向德國人潰敗轉變的時候，突然获悉，根據戴高樂將軍建立的法國臨時政府的指示，下令停火了！德國人並沒有投降，只是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密使借口避免巴黎遭到破壞，同占領軍達成協議後決定了停戰。駐全國抵抗委員會總部的共產黨代表皮埃爾·維戎和巴黎解放委員會主席安德烈·托累堅決反對停戰，“戴高樂分子”沙邦—戴爾馬則極力主張停戰。

維戎有力地譴責了德國人的欺詐，說明了敵人只不過是打算拖延時間準備撤退。他指出，德國人不可能斷然實行破壞巴黎的計劃，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切斷自己的軍隊在盟軍進攻前的退路。利奧·阿蒙和沙邦—戴爾馬支持停戰的主張，他們甚至說什麼法國國內武裝部隊對於占領者的一百五十輛虎型坦克毫無辦法。

瑞典領事諾德靈“自動”以中間人的資格出來通知說，馮·

科耳提茨忍耐不住了，他已經接到希特勒亲自下达的彻底破坏巴黎的命令。

在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达尼埃·迈耶站到了皮杜尔、沙邦—戴尔馬、阿蒙和其他主张停战的人那一边去了，虽然有共产党委员維戎和奥古斯特·吉約以及路易·賽揚竭力反对也毫无效果。^①正当会议决定延期作出决议时，装了扩音器的车子竟在巴黎各条大街宣布，已经同占领军达成停战协议！

为了防止德国人乘停战机会占领其他阵地，共产党员罗耳上校和非共产党人利茲上校下令在各地构筑街垒，特别是在德国人的阵地周围。

在当费尔—罗舍罗广场下面的地下隧道里，皮埃尔·維戎把法国国内武装部队领导人召集到一起，经全体军官一致同意，拟定了一份从政治和军事观点谴责停战的备忘录。德国人违反诺言向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射击并企图重新占领公共建筑的事实，证明了共产党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后来，人们进一步了解到促使“戴高乐派”的领导人赞成这种骗人交易的政治原因。阿德里安·当塞特在一本为这次停战辩护的历史著作中清楚地透露：“路易泽省长被空投在法国以后，立刻来到巴黎，于1944年8月17日把在伦敦的法国当局的观点传达给戴高乐将军的代表巴罗迪；在伦敦的法国当局被代表团的一些急电吓坏了，既害怕以前的国会议员排挤抵抗运动，又害怕共产党人排挤临时政府。”于是，在持观望态度并拒绝给予在法国本土进行斗争的人以物质援助三年之后，变成了由化名帕西上校的前蒙面党人德瓦兰领导的臭名远扬的秘密机构——国外抵抗运动指挥总部的中央情报与行动局，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它宁肯冒着为占领军效劳的

^① 全国解放委员会巴黎地区委员会的托累只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会议的。

风险也不願意让巴黎的无产者在战斗中武装起来。

德国人破坏了这次停战，他們利用停战机会，不发警告就射击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守卫，例如，維特里电话总局的崗哨，总共杀害了九十九个法国人。

1944年8月21日，星期一，合法的《人道报》第一号从用武力夺取的印刷所里出来，宣告停战協議破裂。

它的标题宣布：“把法国和巴黎的战斗继续下去！”

有一个大字标题要求人們“**悬旗結彩**”欢迎盟軍开进巴黎。

如果人們知道这第一号的主要文章虽然加上了“法国共产党宣言”的标题，其实是两天前巴黎地区共产党議員发出的告人民书的翻版，就会进一步理解我們在前面所作的說明。

8月21日下午，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接到撤銷停战的命令和巴黎地区解放委员会也譴責了停战的时候，全国抵抗委员会总部却仍然试图抓住停战不放。

吉約宣讀了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項声明，证明这次停战的背叛行为和拒絕供給巴黎地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武器之間的关系。維戎也宣讀了民族陣綫的一項声明，宣布不管全国抵抗委员会作出什么决定，任何有关停战的通知都将被指責为敌人的伪造文件。

在伦敦的抵抗人士大談“君子协定”，提出敌人可能轰炸巴黎圣母院以示报复的論点，来向共产党議員們挑衅。吉約、維戎、馬腊納、卡雷耳、阿蒙等人有力地駁斥了繆太、巴罗迪和沙邦—戴尔馬等人出尔反尔的作法。他們要求听取全国抵抗委员会軍事委员会的克里埃热耳—瓦耳里蒙和賽揚的意見。

这两位負責人譴責了停战，并且指出冶金工人和国际旅的老战士罗耳上校怎样通过扩大保卫巴黎地区的街垒給沙邦—戴尔馬“將軍”——几星期以前他还在維希政府里任財政視察

員——上了一堂战略課。

最后，全国抵抗委员会在既成事实面前也不得不同意巴黎地区解放委员会的声明；于是委员会总部拒绝了达尼埃·迈耶提出的“对于为发动一次新的决定性起义而争取了必要时间的总代表巴罗迪表示信任”的决议草案。

路易·赛扬提出的公报说，“巴黎地区解放委员会的命令对于整个抵抗运动一律适用。”同时宣布：“把斗争继续下去，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战斗，人人都要参加战斗！”

被达尔朗的伪民警队占用的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勒佩勒提埃大街四十四号收复了，巴黎市党委会的所在地拉斐特大街一百二十号也收复了。为了把这两个被巴黎的党员亲切地称作“四十四号”和“一百二十号”的地方交还给党，有八个工人牺牲了性命。

8月22日的《人道报》出来宣布：“胆小鬼和阴谋家们退到一边去！巴黎人民，起来战斗！”

停战使得受到社会进步鼓舞的抵抗人员同陷入保守主义和害怕人民的泥坑中的人们之间在地下活动时期就有的矛盾突然爆发出来了。

但是，处于戒备状态的人民警觉地发现了德国的战车，于是转眼间就筑起了一些防御工事——反坦克壕，堵塞了德国战车的一切出路。法兰西妇女联盟制造了一种燃烧瓶（酒瓶炸弹），把它们供给战士。人们在拖延性的停战之后提出了“不让一个德国人活着离开巴黎”或者“不让一个德国人自由离开巴黎”的口号。陷入这个起义首都的陷阱之中的占领军，处于挣扎瓦解状态。

8月24日，法兰西岛地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司令部的公报指出：“总的说来，我们的胜利的反攻现在实际上已经解放了

巴黎的絕大部分地區。敵人只控制着幾個據點進行頑抗。在23日夜和24日一整天的戰鬥中，我們繳獲了大量物資、武器、輜重、車輛、履帶式戰車和幾輛坦克，法國國內武裝部队的裝備非但沒有耗盡，反而加強了。我們俘敵一百多人。僅在別利維爾火車站的一次戰鬥中，就有兩列火車、一個汽油庫和二十四名俘虜落入我手。”

美軍和勒克萊爾的先頭部队推進到巴黎近郊的馬烏萊、特拉普和阿尔帕容。德軍為了避免接觸，望見盟軍即不戰而退。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队和法國國內武裝部队像他們在塞普特伊（塞納—瓦茲省）所做的那樣，從後方進攻敵人的頑抗據點，抓捕德國兵。把抓到的德國兵交給盟軍而留下他們的武器，以便繼續並擴大騷擾性的戰鬥。

法國國內武裝部队司令部會同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队全國軍事委員會於8月24日晚發出的命令，標志着巴黎戰役的最後階段。命令如下：

“一、由默尼埃部队的一個排加強的警衛營的任務是阻止撤退的德軍進入巴黎；

“二、要特別監視三條要道：從楓丹白露到巴黎（意大利門）的國道；從奧爾良到巴黎（奧爾良門）的第二十號國道；最要緊的應該是監視從薩克累到巴黎（夏提榮的門戶）的國道；

“三、每一條要道都應該用障礙物加以堵塞，並用最強的火力進行封鎖；

“要派遣不配備自動武器的哨兵負責在上述要道兩旁進行巡邏；

“四、要在8月25日三點鐘準備就緒。”

當天夜里，盟軍的先頭裝甲部队在佩帶武器、打着旗子的法國國內武裝部队和興高采烈的巴黎居民的歡迎聲中進入巴黎。

当第一支装甲部队到达市政府广场的时候，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奏起了解放之歌。

但是，德国人仍然守着共和国广场和卢森堡宫的一些要塞。在巴黎向一名纳粹军官开第一枪的共产党员费边，在勒克莱尔师的九辆坦克的支援下，于8月25日上午十时向卢森堡宫发动了进攻。不久法国的国旗就飘扬在参议院的屋顶上。以后在共和国广场进行的战斗，时间比较长，因为占领者在那里构筑了钢筋混土地堡，有重机枪和大炮进行掩护。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司令部下令进行反复攻击，把敌人的大炮一个一个地夺过来。最后的一次叛变也没有能够挽救德国驻军。纳粹军队在营房的窗口插出白旗之后，竟然又向走近的战士开火。但这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蒙特勒伊和巴纽累的爱国民警、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队伍、法国第一团的一个分队和外国志愿军的一个分队（加里波的）的支援下，在最后一次势不可挡的攻击中拿下了广场。

正当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头一批战士——圣茹斯特连的士兵——胜利地突入共和国广场的营房中的时候，警车的喇叭宣布巴黎德军最高司令部投降。

冯·科耳提茨无条件投降了，他把自己的残余部队交给了联合胜利者：盟军代表勒克莱尔将军和法兰西岛地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司令共产党人罗耳·汤吉上校。

这时，只须最后清除几所潜藏着武装伪民警的房子和控制几个郊区，巴黎起义就取得彻底胜利了。

现将8月18日到26日几天的战况总结如下：

法国方面死亡：一千四百八十二人，其中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占九百零一人，居民五百八十一人。

法国方面受伤：三千四百六十七人，其中居民二千零十二人。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被俘：二百二十三人。

德国方面死亡：二千八百八十七人；

德国方面受伤：四千九百十一人。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物资损失：被德国人劫去游览车二十一辆，卡车七辆。

德军的损失：强击坦克三十五辆（包括被缴获的虎型坦克十四辆）；坦克五十七辆（包括被击毁的虎型坦克七辆）；装甲汽车七辆（被缴获）；反坦克炮九门，七十五毫米口径和九十毫米口径大炮十三门；机枪三十二挺，高射机枪三挺（被缴获）；自动步枪一千四百八十二枝，步枪六千四百十三枝，手枪五千二百二十五枝，卡车二百辆，履带式装甲车七辆，手榴弹七千箱，各种炸药五千四百六十一箱。

从破坏中挽回的物资价值达一百五十亿1944年的法郎。

沉浸在重获自由的欢乐之中的巴黎男女市民，响应全国抵抗委员会所属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解放委员会巴黎地区委员会的号召，热情洋溢地欢迎了盟军。

人们打着很多用英文写着“欢迎”字样的横幅向我们伟大的美国和英国盟友欢呼，向勒克莱尔的装甲部队欢呼，唱歌颂戴高乐的歌曲。

在这些欢乐的日子里，人们对那些一心一意要把作为抗敌运动的灵魂和先锋的共产党排挤掉的人的颂扬，似乎有些过分了。

人们只顾要求巴黎的无产阶级尽情地喝采，也就是无限地给以信任，却没有预先告诉他们这些欢乐的日子所酝酿的阴谋诡计。

当然，在那个时候还很难攻击戴高乐及其追随者，即曾經企图通过罪恶的停战来挽救巴黎的占领者的那些人；但是，节制頌揚他們的热情，防止坚持反共的人所极欲充分加以利用的民望再提高，肯定是能够做到的。要知道，在相信共产党人的話的劳动群众的心目中戴高乐的地位越高，以后再要使他們觉醒、要他們睜开眼睛就越困难。

本来应该特別強調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早在盟軍到来之前巴黎抵抗运动的战士就用四百枝步枪展开了解放战斗；用敌人的武器逐步武装起来的爱国民兵队則为盟軍扫清了道路。

但是，8月21日合法出版的《人道报》第一号却用通栏大字标题向盟軍致敬：

“悬旗結彩，欢迎盟軍开进巴黎。”

“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国旗到处都和法国国旗飄揚在一起！”

“我們英勇的英、苏、美盟軍万岁！”

画室里繪制出大量写着“戴高乐万岁”的横幅。共产党人往往也站在把这些横幅系在两棵树或两根木柱間的人們中間。

共产党的传单常常表示信任戴高乐。这固然是为了維護一些口号和促进团結，但另一方面却使这个人的危险的威望更高了。要知道，这个人的意图并不是給予法国人民以比战前更多的福利和民主自由。

巴黎解放了，法国战役并没有結束。

受到义勇軍游击队无情追击、变成瓮中之鳖的敌人，还在法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8月20日，敌人为了报复，在圣惹尼—拉瓦耳（罗尼省）活活烧死了居民一百人，其中有男人、妇女，还有儿童。8月25日，当巴黎和布加勒斯特向世界宣告解放的时候，占领者在梅耶（安德尔—卢瓦尔省）屠杀了居民一百二十六人。

在地下斗争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是人民的军队，他们希望在追击败退的德军的战斗中，继续同他们曾经给予大力援助的盟军并肩前进。但是，那些害怕人民武装的人，那些曾经力图通过巴黎停战来挽救占领者的人，竟然谈论起要解散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来了。

首都解放的第二天，党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开会之后发出的指示是很明确的，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 一、解放法国；
- 二、惩办卖国贼；
- 三、给人民以发言权。

第一个口号“解放法国”表明党要求给予仍处在敌人占领地区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以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并且希望努力重建一支更强大和更民主的法国军队，也就是随着在占领区的胜利把抵抗运动的干部和战士编入的法国军队。

第二个口号旨在发动劳动人民去反对那些打算宽恕有投敌罪行的人。雅克·杜克洛向中央委员会会议做的报告中指出：

“共产党表达千百万法国人的愿望，要求审判所有参加维希政权的人，审判所有为德国秘密警察效劳而判决爱国者的法官，审判所有迫害爱国者的别动队中的刽子手，审判所有同敌人狼狽为奸的罪犯。”

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曾经企图抹掉的这两个口号，已经写入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中。

至于第三个口号“给人民以发言权”，显然是要求通过普选来恢复共和国的合法性，即通过普选产生一个代表人民意志的、唯一有资格任命自己政府的议会。

问题不仅仅在于临时政府所代表的政权只不过是戴高乐决定的一个人为的代表机构，而且在于维希政府所设置的大量市

鎮机关和行政人員仍然在行使职权。貝当的国民議會的一些議員和他任命的一些市长都通过反对逮捕他們的伦敦秘密組織得到了“抵抗运动证明书”。

可見，为了遵守和执行全国抵抗委員會的綱領而进行的斗争只不过刚刚开始。

戴高乐支持极力要把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从軍隊中排除出去的高級軍官和政府机构，后来他在《回忆录》里也承认曾經要求艾森豪威尔將軍撥出两个师，“以便必要时維持秩序”。人民軍官在战斗中赢得的軍銜被否认，被貶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席曾让人散布輕蔑抵抗运动的干部們的譏俏話。他在一次檢閱中就拿这种所謂俏皮話挖苦过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一个下級軍官，他指着这位軍官穿的一身軍阶不高的制服让大家看，然后說：“我的朋友，你不懂得怎样縫制吧，嗯？”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員會一方面提醒輿論注意这种情况，同时主张：正当民族利益要求有一支真正代表复兴的共和国的軍隊的时候，必須取消特权阶层的軍隊。

尽管其他抵抗組織和“八·二五返任者”，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一些人物的暗中支持下，設置了重重障碍，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还是有許多人繼續同他們打开首都大門迎接进来的盟軍共同作战。

費边上校于8月27日和夏尔·狄戎一起回到奧貝尔維利埃之后，招募了一千名起义战士，組成一个团，追击敌人。

在此期間，伦敦的戴高乐派国外抵抗运动指揮总部的代理人討論了撤回未經他們那官僚主义式的批准而授予抵抗运动中共产党战士的軍銜的問題。在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中和在其他地方为实现全国抵抗委員會綱領所規定的各項改革而进行了英勇的忘我斗争的共产党員，很快就看出了那些同他們簽訂这个

綱領的人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

于是，很多黨員和党的同情者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既然人民掌握了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而且共产党由于自己在抵抗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已得到絕大多数人民的信賴，难道还没有可能乘垄断資本尚未重新进行欺騙宣传和重新控制国家的时机就根据抵抗运动的迅速发展建立一个以絕大多数人民所贊同的統一綱領为基础的人民政权的有效政体嗎？

党的地下領導机构所出版的某些文件，主要是 1943—1944 年冬季发出的关于論述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是“我国未来紅軍的萌芽和基础”的某些文件，酝酿出一种有利于全国起义的发展从而建立人民政权的思想。

在这个时期，中央委员会回答說：战争并没有結束，联盟可能垮台，而且可能导致建立一个反对苏联的資本主义国家陣綫。

过了将近两年以后出版的一期美国杂志（《美国信使》月刊，1946 年 4 月号）里，艾森豪威尔將軍參謀部的一个名叫当納德·乃·罗宾森的專員写道：

“今天我們可以談出 1944 — 1945 年冬季的情况了，当时局势变得那样危急，以致艾森豪威尔將軍发出了絕密命令，通知在法国的所有盟国軍隊，包括各參謀部和交通地带，要警惕法国起义立即爆发的可能性。

“所有指揮官都接到了随时准备使用自己的部队鎮压騷乱的命令。根据許多观察家的看法，只是由于意識到盟軍已經作好維持秩序的准备，共产党才放下了在这个时期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

虽然應該考虑到这篇文章中有些“臆造”的东西，但是，艾森豪威尔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并且通知盟軍各參謀部保持警惕，要求他們随时准备鎮压这种革命，都是事实。看来，这个指示相当

直接地回答了戴高乐将军提出的希望美国给以军事支持“以便在巴黎维持秩序”的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大部分地区仍处在敌人占领之下的法国，当盟军在法国临时政府的赞成和支持下决心要同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时候，打算在解放了的首都建立社会主义乃是一种冒险，是“妄想一步登天”，其结局将是不堪设想的。

如果法国实际得到了解放而盟军是在德国土地上进行最后的战斗，那么，问题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第十二章

在本国土地上的最后战斗

巴黎解放后不久，法国共产党就吸收了数以千计的新党员。

法国共产党从它成立那天起，还从来没有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活动过。连最反动的分子都不敢再攻击英勇地投身于抵抗运动、受到劳动人民热情支持的共产党人。统治阶级由于陷入投敌的泥坑太深，已经没有资格宣讲爱国主义，紧密的法苏战斗同盟则使“莫斯科代理人”这个反共滥调变成了笑话。

在游击战这所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爱国民警、义勇军游击队和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经过巷战和夺取主要城市神经中枢的战斗的锻炼，成了一支革命的军队。对他们不表同情和信任的人都害怕他们。

1944年8月15日，新的登陆在巴黎战役的酝酿声中，在普罗文斯海岸出现了。

在阿尔卑斯海滨、瓦尔、罗尼河口、下阿尔卑斯、上阿尔卑斯、加尔和沃克吕兹等省，抵抗运动的有组织的武装部队约计一万三千人，其中有作战武器的仅三千三百人。其余的人都在等待着但是迟迟不来的空投装备。

全国抵抗委员会军事行动小组委员会的领导人皮埃尔·维戎宣布了“军事行动小组委员会仍旧是全国起义和法国军事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

由“特务机关”的成员——美、英、法军官——组成的特别计划行动中心，派出了一些公然以“同抵抗运动中的斯大林影响作

斗争”为目的的代表团。由此可见，按照这些代表团的命令将会怎样分配空投的武器和弹药。

但是，编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各次战斗中一直站在最前列，甚至美国第六集团军司令德弗斯将军都承认：

“在向普罗文斯北部推进的过程中，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给予的支援相当于四、五个师的贡献。”

官方的数字表明，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在普罗文斯战役中俘敌四万二千名。

由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包围并从内部加以破坏的土伦，经过一星期的激战之后，于8月28日获得解放，雪了舰队自沉之耻。

在土伦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瓦累特的战斗，是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对盟军和拉特尔将军军队的支援的一个范例。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突然发现有一支德国援军向前推进，将要包围这个市镇，他们就把这支德国援军堵截住，等待“正规军”开来。第二天，由于正规军没有来，市政府便动员居民，有人甚至拿着猎枪走进仓促构筑的防御哨所里。

在马赛，有两千名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8月22日，蒙萨贝尔将军的军队解放了这个城市；但是，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早在8月14日就占领了省政府。

下阿尔卑斯的解放和向伊泽尔的进军，都是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起义之后发生的。

马基游击队走出了丛林，并且根据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组成了武装战斗团。他们炸翻铁轨，破坏桥梁和公路，把德军切断，使之彼此孤立。由于游击战打得漂亮，双方伤亡的数字几乎不成比例，往往死十个德国人才有一个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战士牺牲。

格勒諾布尔光复以后，接着就該解放里昂，由于拉特尔將軍軍隊的前进，这里的解放获得了有利条件，而且一有机会，不等拉特尔將軍的軍隊来到就会实现。一部分盟軍則从法兰西島地区南下第戎，以便彼此会合。

当时，南部地区軍事委员会在始終沒有弄清、党中央领导也从来未肯认真說明的情况下被取消，所以里昂是在沒有爆发人民起义的情况下解放的。

1944年9月3日，这里的德国人投降以后，共和国委員伊夫·法奇就在省政府坐鎮。伊夫·法奇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个廉洁的抵抗战士，他忠誠地遵守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綱領。

戴高乐將軍乘飞机来慰問解放了的里昂时，受到伊夫·法奇的迎接。在布隆机場上，伊夫·法奇向他介紹了馬基游击队的負責人。

戴高乐听到請他去赴有早期抵抗战士参加的晚宴时很不耐烦，就拿一个問題支吾說：“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呢？”

法奇平靜地回答道：“在監獄里，將軍！”

我国西部的解放更是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的功劳，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

的确，第三、四、五、六抗战軍区和波尔多的B区，都沒等盟軍到达或接近就攻占了各交通中心，解放了里摩日、普瓦提埃和夏托魯。

1944年8月17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占領了塔布，并且把伪民警监禁起来。拒絕向爱国民警投降的德軍遭到攻击，并且在爱国者接連不断的襲击之下被迫撤出这个城市。受伤的德国將軍被俘。

第二天，卢尔德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向德軍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們投降了。不到二百名爱国者一枪沒放就俘虏了德軍三

百四十人。

在共和国由于被人出卖而失败以后被迫流亡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成立了馬基游击队，他們同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一道解放了比利牛斯山区各省。

8月21日，阿累斯解放。8月25日，尼姆解放。

由米歇耳·布呂紀埃率領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走出丛林，从埃古瓦耳峰高地下來，打退德軍的一切反扑，然后于8月31日同來到蒙彼利埃的盟軍先头部队会了师。

四千名馬基游击队员抓到了四千多名俘虏，他們在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以前，大多数人沒有武器。

在利木贊，战斗也是在沒有盟軍支援的情况下进行的。从7月17日起，德軍就千方百計地想消灭像夏托訥弗的馬基游击队那样的有几千名武装人員的馬基游击队。

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以牺牲三十八个人的代价打死了三百四十二名德国兵，七名德国軍官，甚至还打落了两架飞机。8月14日，被党領導免除政治职务但升任为本省义勇軍游击队的領導的乔治·岡古安开始围攻里摩日，持續了七天。在这场残酷的战斗的最后阶段，德軍一再企图突围，經過几次血战，一部分守敌投降，包括三百五十名士兵，十三名軍官。其余敌軍在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接連不断的襲击中向克勒茲逃窜。

国际旅前政治委員让·香特隆率領武装的游击队开进了里摩日，占据了省政府。

正当法国經過以共产党領導的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为其先鋒的坚强善战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爱国民警参加战斗而自行解放的时候，資產阶级的政客抵抗人員和“职业”軍人却在层出不穷地玩弄阴谋詭計。

这样的例子很多。只举出一个就够了：

1944年9月11日，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在圣布里厄（北海濱省）举行了一次有夏尔·狄戎参加的军事检閱。在該省的一万五千名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当中，有一万一千名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

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分列式預定在这个城市的烈士紀念碑前进行。有一个叫博尔尼·德·博尔涅的將軍施展各种阴谋手段，要代替义勇军游击队总司令检閱部队。

以戴高乐派省长为首的“当局”策划了这次行动，并且急忙把这位將軍調来頂替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领导人。

只是在进行了一场真正的論战以后，夏尔·狄戎才得以在那天晚上在营房院內向排成方队的营队作一次簡短的讲话。

后来，当人們知道在莫尔比昂、伊耳—維兰和北海濱等省举行的这些閱兵是为了把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和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的营队組成直接作战部队并开赴圣納泽尔、布勒斯特和洛里昂等还有頑抗的德军“据点”的战场时，才进一步了解到，一心想依靠动员最积极的爱国者来全部尽快解放国土的临时政府及其仆从們是害怕和仇恨共产主义的。

共产党人不顾重重障碍，把自己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結合起来，为共同最后消灭集中精銳部队进攻苏联的納粹野兽尽了最大的努力。

皮埃尔·乔治（費边上校）是这种排除万难繼續斗争的意志的不朽典范。費边在巴黎解放后立即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中挑选了一千名最优秀的战士，組成一个团，他自动接受追击逃敌的盟军指揮。他那半編入半不編入的洛林战术組成为盟军参谋部的臂膀，最后編成第一百五十一步兵团，赢得了行伍出身的軍官們的贊揚。

把費边上校1944年9月8日給安德烈（烏祖利阿）上校的

一份关于他同美国第五軍談判的报告轉載在这里，是最恰当不过的：

“9月7日十时，我在他們的參謀部里会見了第五軍团的軍官們。

“經過几小时的討論之后，我終於使那些軍官相信了我提出的要求的必要性，即根据美軍活动地区的地形，有我們义勇軍游击队这样訓練有素的游击队伍，对于美軍有很大的好处。

“我們部队的成員都是同德国人作战多年的战士，他們特別希望把斗争进行到底。我終於說服了那些軍官，他們很願意同一个名叫希尔上校的美国上校交涉一下試試。

“我終於見到了这位上校，他似乎被我的建議說服了，立刻去同指揮美国第五軍团的吉罗德將軍进行商洽。

“經過討論，吉罗德將軍接受了希尔上校的建議：我团由第五軍团的三个步兵师提供給养。

“这位將軍派一名聯絡官領我到第二十八师指揮部；經過反复討論，我終於見到了指揮二十八师的將軍，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問題是我的兵額及其战斗力。我說我手下已有一千人。他似乎相信了，立刻交給我几項战斗任务，肃清整个馬斯河右岸穆宗和斯太內之間的地区；肃清蒙梅迪东北的森林和馬斯河左岸的几个頑抗的据点；所有这些行动囊括着第五軍团的右側。

“这位美国將軍要我第二天中午去見他，并要求我向他作一个关于所承担的行动的报告。

“关于同敌人接触的指示，我要做如下的說明：我完全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并且我是第一个在給你的报告中这样說的；对于我和我們部队的成員來說，战斗是我們行动的目的。

“但是困难还很多：

“我們从巴黎出发时軍需处于不完备状况；

“交通工具和物資，几乎沒有可能征用；

“为了得到美軍司令部的重視和完成我們所承担的任务，在我們队伍里有必要保持相当大的兵額；

“我們所要对付的不是在陣地上防守的敌人，而是一些同我們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分队一样的小股部队。

“为了使这些流动的敌人丧失活动能力，必須掌握足够的可以在一个地区撒下一面相当严密的截击网的兵額。

“我要強調这样一个事实：我們处在遭受敌人掠夺的地区，这些地区既沒有任何粮食貯备，也沒有燃料和交通工具貯备，这是我們前进迟緩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由于我們沒有得到答应派給我們的軍官，我們（夏紐和我）被一系列瑣事糾纏着，常常不知所措。

“我們决心执行有关行动方面的指示，我們要集中全力去实现这个對我們來說始終是头等重要的目标。

費边上校”

安德烈上校給費边上校的回信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參謀部

1944年9月17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費边：

我們对你同美国第五軍团之間的关系和委托給你的任务感到十分高兴。我們希望你們的关系今后只有越来越好。总之，你的部队参加在梅斯和凡尔登地区的战斗是一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

“过些日子，我們將根据你們之間的关系进一步改善的情况把我們所有的营队都集中到这一战斗中去。馬魯瓦营已在今晨从庫洛米埃出发去同你会合。从軍事(技术)方面看，这个营肯

定是火力最强、軍事經驗最多最好的一个营。馬魯瓦营的組織是很严密的，但我要求于你的是，要經常提醒馬魯瓦注意我們的部队和人民之間的关系，因为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應該和人民一样，决不能脫离群众，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同样的思想出发，軍官應該和士兵一样，要和士兵同吃，要关心部队的最微細的需要，把軍餉和軍事津貼用在大家身上，总之，要执行人民軍隊的准則，也就是在这方面不要优惠任何人，但是要做一切必要的工作来培养一些这样的軍官：他們既能使士兵具有最大的紀律性，而自己又是人民的軍官；在物质方面，他們不要求特殊。

“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許不得不給軍官比士兵稍高一些的軍餉，但是，即使能够这样做的话，我們还是坚决反对軍事津貼的分等。軍事津貼應該由集体平均分享。至于軍餉，我們不同意軍官和軍佐之間有差別。

“現在，你們的軍需(汽油、运输等)已由美軍負責，这对你們同人民之間的关系非常有利，你的士兵的处境好得多。

“目前你首先要注意士气，注意各方面的教育工作，而不仅仅限于軍事教育工作。馬魯瓦的助手舍瓦利埃在这方面很擅长，要让他和夏紐以及我們所有的教官和做思想工作的人进行不懈的工作。

“我們是人民的軍隊，同美、英軍隊，特別是同紅軍一样，士兵享有选举权。还享有言論自由，享有随意閱讀各种报纸的自由，享有受軍事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自由。

“我們的有着丰富游击战經驗的义勇軍游击队应当教給別人作战，不是正規軍隊的作战，而是要把游击战的各种原則作为行动准則保持下来。

“最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你們要尽量参加阿尔薩斯和洛林的战役，使自己成为美軍所必不可少的力量。这样你就可

以保证重新建立起来的法国军队还会参加盟军将来在德国进行的战斗，因为到了德国，德国人也要设法打游击战。

“兄弟般地紧紧握手。

安德烈上校”

这两个文件足以证明党对解放的明确立场，证明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战士既有严明的纪律又有勇敢的精神。

1944年12月27日，指挥第15步兵团的费边上校在战场上牺牲了。几百名义勇军和游击队员像他一样，在这支不仅未获得他们在抵抗运动中已经赢得的军衔而且还有人企图把这些朴实的志愿战士排挤出去的军队里献出了生命。

建立一支从本国人民中来、与本国人民息息相关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渐渐同职业军官和政府中多数反动政客的保守和盲目反共的思想发生了冲突。

但是，从张贴传单、破坏铁路直到在盟军两翼以穷亲戚的身份参加作战所付出的代价，并非无谓的牺牲，因为法国已经获得自由了。

军事问题正在解决中。重大的政治问题又已经提了出来……

第十三章

关于参加政权

1944年8月，中央委员会駐北非代表团的由馬尔梯、皮佑和法戎組成的書記处，在阿尔及尔召集了一次代表团會議。

弗朗索瓦·皮佑在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說：

“这是一个沒有政綱的或者更确切地說有‘害怕人民’政綱的政府，因为它是同我們要求它去實現的截然相反的政府。”

在分析了关于維尔高尔問題的格列尼埃事件、破坏全国起义、害怕巴黎无产者这些表明政府加强反共斗争的种种事实之后，皮佑总结說：

“人們可能认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并没有使政府在解放法国的方針方面有什么政治上的和做法上的改变。但是不管怎样，共产党参加政府对于法国一切反对侵略、反对維希政权的力量团的团结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决定我們的态度的应该是法国……”

在法国本土的党领导对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是否适时的問題的答复，大家都知道，是倾向于繼續参加的。

关于这个問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怎样說的呢？

列宁說：“在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統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緩和。”^①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頁。

列宁在同一著作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府只能是保持对无产者进行剥削的种种形式之一，他写道：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①

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性所做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但是列宁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民主程度对无产阶级来说并不是无所谓的，对此漠不关心是错误的。

革命的无产阶级应该努力争取一个最大限度的民主政府形式，使无产阶级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

有人竟然武断地认为，人民没有必要在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法西斯主义或民主政治——之间加以选择，这纯粹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知，或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断章取义，这种狭隘的解释是公式主义的观点，而决不是辩证的观点。

认为无产阶级在防止幻想、防止忘记革命远景的同时，能够而且应该为争取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有一个最大限度的民主的形式而斗争，这是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

可以相信，按照这种观点，经过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后能够把资产阶级引上民主政府的形式，而无产阶级也有力量使自己最可靠的代表在政府里不仅当议员，而且当部长。

共产党不应该不分情况，不分时期，一概武断地拒绝这样做。如果确已具备了某些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丝毫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00—101 页。

也不违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然而，如果把這些原則看成那么絕對的、永恒的、不变的，就是违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質。

但是，这种参加必須具备的条件是：革命前的形勢已經形成，共产党利用自己在国家机器中的“职位”把群众运动推向革命远景的能力已經在握。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显然并非不懂得这些基本概念。

莫里斯·多列士在1936年写的题为《共产党及党的斗争与任务》一书中說：

“人民陣綫政府将是一个給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提供鼓动、宣传、組織和行动各种可能性以便为工人阶级完全夺取政权作准备的政府，簡言之，它将是一个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起义的前奏的政府。”

因此，根据莫里斯·多列士所闡述的概念来看，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权只有在能够創造有利于夺取政权的条件时才适合，否則就有使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政府中的代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质或共同謀犯的危险。

最近有一篇文章說明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所做的这些根本性的估价的全部意义，这就是在本书第二卷編写时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苏联共产党綱領》，这个綱領指出：

“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存在着生产資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实际上也必然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资本家剝削和鎮压絕大多数劳动者的机器。……”^①

^① 參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8頁。——譯者

党领导是在充分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情况下决定参加戴高乐的临时政府的。

不应该用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去评价这个决定，而应该根据采取这个决定所处的环境，用共产主义的理论去判断这个决定。

第一个问题是要弄清楚，对当时的形势和前景的分析是否符合这种参加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要弄清楚，法国共产党是否能够从这种参加中得到使形势朝着对革命前景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一切可能性。

在提出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的时候，党领导可能认为盟军登陆发起的解放起义运动已经创造了革命形势。

当然，盟军的出现阻碍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军事行动的发展还没有最后确定。人们不能保证盟军不会向希特勒的反扑屈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红军向巴黎进军，这样，就会创造出建立以党的总书记为首的法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条件。因此，提出“让多列士执政”的口号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根据这种假定，共产党参加政府是会有利的。这个方案同在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实现的方案颇为类似。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有红军在一旁保护，阻止了一切外国武装干涉。

错误在于人们似乎只考虑了这一种可能性。人们不懂得或是不愿意考虑另一条更符合于当时法国情况的发展道路。

无疑，这就是没有把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和共产党由于这个运动而已经加入政府这一事实运用到这方面来的原因。

在1944年9月5日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部长。9月9日的改组确定了费尔南·格列尼埃的“免职”，虽然他在维尔高尔事件之后表示了“道歉”。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全

法共二

国軍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夏尔·狄戎代替他作了空軍部长，弗朗索瓦·皮佑作了公共卫生部长。

在政府任意指定的临时諮詢議會中，共产党“代表”有：雅克·杜克洛、安德烈·馬尔梯、馬賽尔·加香、加斯頓·蒙穆索、乔治·谷尼欧、弗洛里蒙·邦特、艾蒂安·法戎、雷蒙·居約、詹尼·伯利奥、安德烈·麦尔西埃和費尔南·格列尼埃。

在“得到承认的”抵抗运动組織指派的代表中有：

民族陣綫的代表洛朗·加桑諾瓦、罗惹·魯科特、亨利·瓦隆、乔治·馬腊納、安德烈·托累、阿尔图尔·紀奧沃尼；被俘人員和被迫外移人員全国运动的代表皮埃尔·布若；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代表貝諾瓦·弗拉商、奧古斯特·吉約、皮埃尔·維戎；农业工人总工会的代表瓦德克·罗歇和伯納尔·波米埃；法国总工会的代表亨利·馬尔太耳、昂布魯瓦茲·克罗瓦札、瑪丽·庫埃特、馬克·杜普伊、皮埃尔·法耶；爱国青年联盟陣綫的代表勒內·提利埃和利奥·斐盖尔。法兰西妇女联盟的代表瑪尔蒂德·佩里。

莫里斯·多列士当时还在苏联。

尽管多列士进行了多次交涉，尽管党领导和临时諮詢議會中的共产党代表支持这些交涉，戴高乐还是把对党的总書記宣判的“战时逃避兵役”罪和他被取消法国国籍的事提了出来。

为了让多列士能够返国，《人道报》发动了一次宣传运动，要求法国人收听党的总書記在莫斯科电台的广播。

人們在党的日报上看到了这样的話，“戴高乐已經答应尽快研究让莫里斯·多列士返回法国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期，党领导正在为保持甚至加强爱国民警的队伍而斗争，临时政府則要求解散这支队伍。

1944年10月27日，雅克·杜克洛在互助大厅举行的共产

党巴黎地区报告会上說，

“爱国民警部队应该继续作共和制度的警觉的保卫者，同时它还应该积极从事人民群众的军事教育工作。

“爱国民警部队在每个地方都应该拥有成千上万的忠于公共利益的民警。

“爱国民警队受地方解放委员会和市政府指挥，設有专职干部，配备有武器和輜重，它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成为保卫共和制度的力量。”

第二天，10月28日，戴高乐进行了反击，他不顾两位共产党部长的反对，签署了解散爱国民警部队的命令。

党没有理睬这个命令，并且发出指示，要求民警不要解散，不要交出武器。在大多数省份里，党员們建立了秘密的武器储藏所。

1944年11月6日，《政府公报》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赦免亚眠军事法庭对多列士宣判的自1939年11月28日算起的六年徒刑。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这样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本人，也曾屡次要求我。既然我认为应该而且就在这个时候采取宽大措施，所以我就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考虑到以往的情况，以及那时以后发生的事件和今天的需要，我认为让莫里斯·多列士回来领导共产党，在目前是利多弊少的。”

1944年11月27日，莫里斯·多列士在同他一起去苏联的让纳特·维徐美和阿尔图尔·腊梅特的陪同下返回法国。

他很快就被接纳参加了临时諮詢议会，并且要“再把党掌握到手”。

他喊出的第一个重要口号就是：“单一的国家，单一的警察，单一的军队！”

莫里斯·多列士浸透了由于苏联人民的成就而十倍地扩大了的对大元帅个人的荒謬的迷信，他凭借他同斯大林的私人友誼，很快就在法国共产党内建立了苏联共产党（布）领导的作法和畸形組織。

1944年11月30日在巴黎冬季賽車場举行的群众欢迎大会上，人們給他編織花环，送給他許多礼物。張貼出許多巨幅画像，开始編造占領时期最初几年他在法国的神話。

乔治·谷尼欧在1944年12月1日《人道报》上报道这次群众大会时写道：“勇敢的战士们爭相拥抱这位在所有法国人中最勇敢最英明最伟大的爱国者，拥抱这位最伟大的法国人。”这可以說是这种神話的絕妙之笔。

馬賽尔·加香虽然也跟着这种傾向走了，却以独特的方式道出了事实真相，他在《工作与斗争》这本贊揚多列士的小册子中写道：

“在分別了五年之后，他终于又回到我們当中来了……他在我們中間了，我們看到他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仍然精力充沛，感到非常高兴……”

这时候比任何时候更要懂得用含蓄的写法，更要懂得从字里行间琢磨其言外之意……

1944年12月，发生了一件新的重大事件。戴高乐將軍为了抵制他同英美之間的爭議，訪問了苏联。經過許多折冲之后，12月10日终于在那里簽訂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約。

这项由法国部长乔治·皮杜尔和維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簽字的条約包括如下的条款：

“第一条——締約各方应与另一方及联合国家一起繼續并肩作战直至对德战争的最后胜利。締約各方承允在这次战争中尽其一切能事支援和协助另一方。

“第二条——締約双方决不同德国进行单独談判；未經彼此同意，决不同希特勒政府或其他为繼續推行或保持德国侵略政策而在德国建立的任何其他政府或当局締結停战协定或和約。

“第三条——締約双方約定，在目前对德战争结束后，联合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消除来自德国的任何新威胁，并且防止使德国可能作任何新的侵略企图的那种行动。

“第四条——一旦締約任何一方因德国的侵略或因运用上述第三条的结果，而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时，締約另一方应立即给予它一切可能的支援和协助。

“第五条——締約双方約定不締結或参加反对締約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联合。

“第六条——締約双方同意在战后互相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以便两国的恢复工作得以顺利地加速进行，并有助于世界的繁荣。

“第七条——本条約毫不影响締約双方以前根据公布的条約对第三国所承担的义务。

“第八条——本条約俄文本和法文本都有同等效力。本条約須經双方批准，批准书将尽早在巴黎互换。

“本条約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间为二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締約任何一方表示予以废止时，本条約无限期有效，从此締約任何一方如欲终止其效力，得在前一年以此通知另一方。”^①

受到苏联尊敬的“諾曼第一奈門”团的法国飛行員参加了这项条約的隆重签字仪式。

在党的队伍里，迸发了一片欢乐，由于共产党参加政权而滋

^①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52—454頁。——譯者

长起来的对戴高乐的幻想，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明确的消除。

1945年1月21—23日，在伊夫里市政府礼堂召开的有莫里斯·多列士参加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团结，战斗，劳动”三重口号下进行的。

党的总书记在报告中说：

“把破坏者、卖国贼、间谍和敌特都查出来，交付法庭惩办，难道没有必要吗？不消说，这后一项任务只有有资格代表国家权力的代表才能担当。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进行搜查、逮捕、审判和执行判决却是合法当局的事。

“现在顺便谈谈业已改名为共和国国民卫队的爱国民警队的组织问题。在反对希特勒占领军及其维希走狗的起义之前和起义过程中，这些武装队伍是有存在的理由的。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变了。保证社会治安的，应该是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正规警察部队。民卫队，以及一般地说各种非正规的武装团体，都不应该再长期地保持下去了。”

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谈到当时必须“斩断共产党人的脚爪，收回被他们篡夺去的权力，没收他们所炫耀的武器”时说：

“多列士刚回到法国，就帮助政府解决了‘爱国民警队’余部的复员问题。他……反对了解放委员会制造障碍的企图，阻止了某些过激分子阴谋实行暴力的行动。”

毫无疑问，对于这种评价必须按照对待它的作者的本质和一贯的立场所应有的审慎态度来分析。我们所以摘引这些话，只是因为这些话同党领导的不可否认的改变立场的事实符合，特别是同莫里斯·多列士回到法国以后在爱国民警队问题上的态度符合。

还有，在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第三卷出版以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并不是没有表示意见的手段和讲坛，可是他从来没有

駁斥戴高乐关于他的那种說法。甚至在他的自传小說《人民的儿子》的最新版本里也沒有着重談一談解散愛國民警隊的問題。

但是，在這樣的著作里，是應該着重談一談同戴高乐所說的他從黨的總書記那里得到了反對“解放委員會製造障礙的企圖”的幫助有關的各種問題的。

南方四十個省的解放委員會的代表於1944年10月在阿維尼翁集會時，向各地方委員會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在城市和鄉村召集愛國者大會，在大會上闡明全國抵抗委員會的行動綱領，根據當地情況確定這個綱領，由與會群眾批准地方委員會的組織和活動。”

1944年12月9日和10日，塞納省的各地方解放委員會在巴黎市政府舉行會議，它們在這個運動的启发下也來要求召開人民愛國者大會以籌備有各階層人民代表參加的全體大會。全體大會已經舉行過一些會議，主要是在巴黎夏樂宮舉行的，而且始終以全國抵抗委員會的綱領為基礎舉行的。

法國共產黨沒有能夠使得這個運動充分發展起來，對此應該找一找原因。

1944年6月到1945年初這個時期的局勢是這樣的：

——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由於法國戰敗和投降已經威信掃地並且陷於癱瘓；

——戴高乐建立的代替機構雖然得到了某種響應，可是也很不穩定，所以他不得不尋求在群眾中威信增長了的共產黨為他擔保；

——共產黨推動起來的民族陣綫、法蘭西義勇軍游擊隊、法國國內武裝部隊和愛國民警隊已經把全體人民吸引到爭取民族解放的戰鬥的廣泛統一中來，同時給予這個統一一種即使不是革命的也是社會的和進步的內容；

——重新統一起来的工会以空前的規模恢复了，而且在解放委员会里具体地实现了无产阶级与其同盟軍之間的基层联盟，并根据最高委员会拟定的共同綱領——全国抵抗委员会綱領——管理了市鎮和省。

共产党参加政权是由这些条件决定的，而一旦参加之后反过来又可能促使这些条件进一步发展。

这种革命性的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巩固并扩大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間、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之間的团結。

然而，客观地研究一下事实和文件，并不能证明共产党领导已經尽一切可能去同社会党人接近——这种接近曾經为同更疏远的力量結成妥协联盟提供便利并使之走向更正确的方向。这絕不是說应对統一失敗这个令人遺憾的事实負責的社会党领导人沒有責任，而是为了在共产党内部检查自己負有直接責任的那些缺点和錯誤。

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的分裂作用是問題的一个原因，而不能拿它作为辯解的理由。

1944年11月，法国社会党在其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发表的一項決議中說：

“社会党再次庄严地向法国共产党提出在地下斗爭时期就已提出的統一的建議。”

稍后成立的协商委员会，把起草一份旨在筹备社会党和共产党組織上的統一的备忘录規定为主要任务。

协商委员会中的法国共产党代表^①的建議是果斷的，不可調和的，这种情况同党为了与戴高乐將軍友好相处或参加他的政府而做的原則性让步相比，是不太合适的。

^① 弗洛里蒙·邦特、艾蒂安·法戎、雷蒙·居約。

人們甚至要求在同社会党統一的綱領中写上他們无条件贊成苏联的立場和承认苏联共产党(布)为絕對上級这样一条。

尽管当时共产国际已經解散，而且宣布解散的目的是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的特殊条件自由展开活动，但是法国共产党的建議竟然要求社会党变为服从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共产党。

在实际行动方面，虽然基本協議規定，两党必須預先将各自起草的备忘录草案交給协商委员会审核，可是法国共产党的領導沒有把自己的統一宪章草案交給社会党代表^①审核，也沒有經過共产党基层組織討論就在《人道报》上发表了。

我們有理由认为，統一的具體实现会有助于向一种独特的临时政治制度形式过渡。这同我們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称之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观点有些相似。

不过，对于讀过馬克思著作的人來說，或对于能够从法国和西班牙的有共产党参加的人民陣綫政府的嘗試中吸取教訓的人來說，这条新的道路并沒有任何絕對新的东西。但是，这种观点同党領導头脑里的方案是不同的。他們的方案是：斯大林所喜愛的、由多列士領導的、預定在中欧实行的、在相当短的期限內排除社会党和其他政党的那种人民民主制度。

为了证明在戴高乐政府决心解散爱国民警队时期向“高級阶段”过渡是危險的，人們提出的一个論据是：战争尙未結束，必須避免在盟軍和苏联之間制造分裂的危險。

根据普遍的意見和斯大林 1944 年 11 月 6 日发表的庆祝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的演說，希特勒的失敗只不过是几个月的問題，而且已經无可挽回了。

^① 薩洛蒙·格伦巴赫、安德烈·勒特劳盖和樊尚·奧里約是协商委员会的社会党代表。

在这篇演说中，苏联国家和军队的领袖在谈到三大强国（斯大林没有把法国当作强国）之间的分歧时指出：

“值得惊讶的，倒不是存在有不同的意见，而是不同的意见竟这样少，并且几乎每次都照例是在三大强国间本着一致与协作精神来解决的。”^①

被美国人和英国人断然抛开的、被斯大林看作可以不予理睬的国家的法国，显然不能在三大国之间的关系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使承认世界战争结束以前采取群众行动来“超越”戴高乐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最起码的逻辑也该要求人们在思想上认识到，必须为战争结束以后的这种新跃进保持或是建立一些基础、踏板和跳板。

斯大林认定“人民民主制度”的方案不包括法国，因为在和盟国讨论以后，法国不属于他为苏联所要求的势力范围。

他没有考虑走向社会主义的其他道路，也没有怎样重视西班牙划出的道路。

法国共产党只好乘自己快要成为在野党以前的时机，利用自己的有力地位，提出一些有益的方案来壮大自己，而一旦在野之后，将一直等到一个有利于按斯大林的想法夺取政权的新局面再出现的时候。

这是战略退却。

很明显，让爱国民警队放下武器和依靠警察及“戴高乐的”司法进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所规定的清洗，只不过是解除武装来使爱国民警队变质的一种手段，而决不是准备让无产阶级先锋队进入战斗的最高阶段。

同样明显的是，经过人民选举，建立了从工厂、街道、村庄

^① 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8 页。——译者

到全国三級會議的民主集中制結構以后，使解放委員會保留下來的方針和解放委員會為實行全國抵抗委員會綱領而鬥爭的主張，是可以為下一步前進準備條件的。

人們沒有這樣做，而是要求解散解放委員會，打算干脆放棄光明的遠景，停留在單純地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做官的範圍內。

大資產階級儘管同占領者合作，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仍然很強大，戴高樂政權儘管放過了大量維希分子，還是欺騙了大部分輿論，它們又占了上風。

在抵抗運動中一度實現的團結，很快就瓦解了。

但是，即使說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建立一個工人階級能夠保持自己作用的、具有深刻社會內容的民主政權肯定是可能的。為此，首先應該保持施加群眾壓力和行動的一切手段，以便幫助共產黨的部長和議員們完成這項任務。

這種可能性不僅沒有受到重視，而且由於黨的統一政策的缺點和團結策略上的錯誤（主要是反對在抵抗運動的各個地區幾乎可以自然實現的合併）以及由於否認抵抗運動中其他黨派團體活動的作用的傾向，反而斷送了這種可能性，於是團結也隨着解放瓦解了。

人們反對那些為使政府中的共產黨部長的要求更有份量，而主張繼續從事活動或至少在群眾中進行宣傳鼓動的黨員，他們說，“如果黨激怒了中產階級”，黨就有陷於孤立的危險。

根據占領時期由社會黨人、激進黨人、天主教共和黨人和在倫敦的人們莊嚴通過的唯一的全國抵抗委員會綱領進行鬥爭，是能夠把人民引向更好的條件的。

這個有限的目的並沒有達到。

1954年初，形勢的另一面是，在占領期間並沒有經歷多少風

險的官僚主义的干部从领导机构中排挤抵抗运动干部的倾向，他们认为抵抗运动中的干部有非常严重的“宗派主义”作风，或者是“由于军事行动而变了质”，没有从事领导工作所必需的灵活性，等等。

因此，从共产党在解放后立即出版的题为《你们可以信赖的人》的小册子里可以看到，人们巧妙地把抵抗运动中的真正英雄同一些有意无意地形成一个忠于总书记个人指示的集团的领导人混为一谈，尽管这些人在反纳粹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至少是可以争议的。

在编写本书的时候回顾一下过去，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每年都有把曾经积极参加抵抗运动领导工作的成员从党的领导机构清洗出去的活动。

类似斯大林所做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清洗干部（因为他们的军事成就引起“最高领袖”的怀疑）的事是发生过的，所不同的只是，在法国不具备把失宠的人监禁起来或枪毙的条件。

由于利用种种借口排挤掉了战斗性最强的人，用巨大代价获得的资本都被糟蹋了。有些人是因为年老而被排除，另一些人是因为“英雄无用武之地而遭到冷遇”，甚至连对党内的一些光荣烈士的纪念也无不根据他们生前的立场而成为某种歧视的对象。

在同一时期，为了弥补他们的排挤勾当，人们为一些已经去世的党员或干部编造了一整套参加抵抗运动的经历，为另一些确实多少参加过一点抵抗工作的人的传略追补材料。

特殊恩典的做法更加破坏了党内的平衡。当要求编入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大部分干部依照8月23日法令关于愿意继续进行战斗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在战争期间入伍的规定和所有适龄者同样参军的时候，有些“朋友”却不在中

央的指示之內。

在一个希望看到同自己所从事的战斗相适应的前途的党内，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失望情绪。

* * *

莫里斯·多列士在1945年1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說：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现在并不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要求。我们这样说，不怕那些经常把革命这个字眼挂在嘴边的人把我们看成温和派的。空谈革命已经变得有点时髦，但是在希特勒保护之下的四年‘民族革命’，已经教人民懂得如何提防别人滥用辞藻和歪曲本意用某些辞藻蛊惑人心。”

誰能认为这种把那些由于错误或错觉而谈走向社会主义的人同纳粹独裁者相提并论的说法不是荒谬的呢？

多列士接着說：

“对于我们，我们坦白地说，我们只关心一件事情，因为只有一件事情使人民关心，这就是：尽快地赢得战争；随着和平和自由的恢复，随着远离家乡的人的归来，让家家户户重新过上欢乐的日子，孩子们有牛奶喝，老人有面包吃，人人都有酒喝。

“我们要响应法国总工会的号召，热情地投入到生产斗争中去。”^①

法国总工会的号召是什么呢？

就是貝諾瓦·弗拉商早在1944年9月10日工会干部大会上就表示支持的搞生产的号召。

这项决议肯定是由党的政治局负责的，不用说，在地下时期党的书记之一貝諾瓦·弗拉商没有经党的政治局的事先同意是

^① 《团结，战斗，劳动》，法国共产党1945年1月出版的小册子。

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号召的。

貝諾瓦·弗拉商在他的报告中^①強調了通过迅速恢复被納粹分子破坏的工厂而着手恢复法国經濟的必要性。

但是他又說：“恢复不應該对只图自己特权阶层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独立的金融工业寡头們有利。将来，当向人民征求他們希望什么样的制度的意見时，我們將就消灭托拉斯并采取一些能够用一种为民族利益服务的經濟来代替它們的統治的方法問題提出我們的看法。”

要求人民表达他們的意見以前，要“在更合理的基础上恢复我国的大工业，并保证它充分發揮效率。”

报告強調了要滿足工人階級的正当要求，从把所有的工資至少提高 50% 做起。

不久以后，緩和了工人階級的合理要求，而強調提高生产率的号召：

“我們再次要求全体工人在各个战綫上积极地、忘我地劳动。特别是在軍事工厂里，要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超額完成原定的生产計劃。我們要求我們的全体同志主动地在各地建立爱国生产委员会。”^②

关于工人階級的合理要求，貝諾瓦·弗拉商談道^③：

“法国总工会并不为工人階級要求特权制度。我們完全懂得，情况不允許我們要求过舒适的生活。

“但是我們有权要求大家分担牺牲。目前工人階級所承担的牺牲比它應該承担的要大。

“……刚一解放，我們就要求普遍提高工資和待遇，这一点

① 《生产斗争》，社会出版社。

② 同上。

③ 1945年3月27日弗拉商在法国总工会全国委员会上的报告。

實現了。雖然提高的數額低於法國總工會在地下時期提出的增加 50% 的適當要求，但是我們還是接受了。

“……我們認為，過分輕易地允許增加津貼，只會鼓勵資本家滿足於低產，然而現在卻正需要發揮創造性，得到更多的產品。

“在此時期，有一種合理的不滿情緒在工人階級的队伍里滋長起來。儘管如此，也幾乎沒有發生什麼罷工，這應該完全歸功於勞動人民的高度民族覺悟，歸功於法國總工會及其干部們的威信。”

不久，凡是談論罷工的人就被看作挑畔者，即托拉斯的代理人。

戴高樂在《戰爭回憶錄》中寫道：

“至於多列士，他一面努力推動共產主義事業，一面也在很多場合下為公益服務……他總是不斷地要求他們（工人們）忘我地勞動，盡力地生產。這是不是完全要政治手段呢？我不管這些，只要有利於法國就好。”

在知道戴高樂為誰服務以後，知道大金融資本集團擺脫大規模群眾解放運動和愛國民警隊的“威脅”而掌握起權力來以後，就可以看出，放鬆爭取切身利益的運動並不是一個正確的策略，因為這種運動能夠增加臨時政府中共產黨代表的力量。

人們可能反駁說：當時必須儘快打贏戰爭，必須幫助一向承擔着戰爭重擔的蘇聯。但是，這個站不住腳的理由在 1945 年 5 月德國投降以後就不存在了。

然而，恰恰是在德國投降之後，已經當上副總理的莫里斯·多列士在瓦濟埃礦工集會上講話時卻說：

“遺憾的是，礦工們，特別是我們礦區里的礦工們，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巨大責任。

“懶惰和消极的人絕不是好共產黨員，好革命者。

“礦工們在這個時期的一次罷工是不能得到同意的。三萬噸煤沒有了。這是對國家犯下的嚴重錯誤。”

對解放以後法國共產黨領導機構採取的這種總的態度有各種各樣的解釋。

本書的編著者並不認為法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會不希望在法國建立社會主義。應該譴責的是，他完全絕對地服從斯大林不顧各國共產黨的特殊情況所發出的指示。

人們認為沒有必要向黨員說明的外來的絕對命令，必然要導致一種不可理解的立場，其結果必然要損害法國工人運動。

在占領時期，莫里斯·多列士完全跟着斯大林跑，而且毫無疑問，他知道那個被夸大狂引向採取最有害的暴行、迫害最優秀的布爾什維克的人的目的。

莫里斯·多列士的一位老秘書讓·弗雷維耳有一次寫道，斯大林早在1925年就提出讓莫里斯·多列士“進入黨的領導集團”，他還說：

“從那以後，使斯大林和莫里斯·多列士接近起來的友誼一直不斷增長。

“國際無產階級的領袖和法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舉行了多次會見。他們的會談有着重大的意義，肯定有一天我們會知道他們會談的細節。”^①

十分可能，由斯大林發展了的、實質上是在瞞着有關國家人民的一些會議上分配三大國未來勢力範圍的國際戰略，規定了法國應該繼續作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以同意給蘇聯某種補償作為交換條件。總有一天歷史會揭露出這種分配的性質。蘇聯

① 《新評論》，1953年4—5月號。

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譴責斯大林的錯誤和罪行时所以沒有談到这种分配的性质,无疑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

当領袖迷信成了一个革命政党的法則的时候,这个党就不能够在討論或激烈的批評当中进行独立思考和提出自己的論点。取消思想上的一切交鋒,局限在“領袖人”所划的框子里,就会导致由一个人来单独决定党的政策,他依靠和相信自己的聪明或所謂天才超过人民群众的聪明。

这正好說明,为什么“領袖人”随心所欲地提出来的一些互相矛盾的論点总是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总是不能发生效果。

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在这个充滿幻想的时期所发出的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論点,以及稍后一些时候提出的关于“絕對貧困化”的自相矛盾的狹隘学說,都是这样的东西。

劳动群众无法一致遵循一个甚至连党都沒有参加起草的曲折多变的路綫。这些来自上面的突然轉变既不考虑群众的情感,也不考虑本国的形势,而只是机械地适应斯大林式的苏联外交或策略的轉变。

因此有必要研究一下斯大林在这个时期对法国所采取的态度。

当人們宣布1945年2月要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一次盟国会議的时候,法国政府曾經要求参加有关决定德国命运的討論。

斯大林不顾1944年12月簽訂的法苏条約中关于苏联和法国对有关德国的問題采取一致行动的規定,竟无条件地反对法国代表参加。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证明了斯大林对这件事的輕蔑态度,而丘吉尔和罗斯福支持戴高乐的要求。当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代表采取这种反对立場的真实性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可以肯

定，如果斯大林願意法國參加雅爾塔會議，如果他尊重同盟條約的話，法國是會被排除在會議之外的。

2月16日的《人道報》立即為斯大林排除法國的行為辯護說：

“有人指責三大國沒有邀請法國的代表同他們一起開會。我們只好回答說，如果他們過去听取有遠見的愛國者早在幾個月以前就提出的在法國建立一支擁有一百萬人的強大軍隊的建議的話，毫無疑問，我國是會被邀請到克里米亞去出席會議的。”

這就是說，三大國決定把法國排除在會議之外，是因為法國的戰爭力量不夠。這個借口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說得也實在太簡單了。

人們可以設想一個相當合理的解釋。多半是這樣：如果蘇聯的絕對領導認為法國能夠以人民民主政權的形式進入社會主義陣營的話，他就可能不採取對法國不利的立場。

我們曾經說過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但是這條道路對斯大林來說是不可理解的；而且，莫里斯·多列士根據這些可能性的某種影響提出並正在實行的“關於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的論點，肯定是在斯大林的堅持之下被撤回的。

再說一遍，本書的編著者並不是指責共產黨參加資產階級政權，而是指責那種沒有革命前途的參加方式。

在1905年以後不久，列寧回答那些說在俄國沒有必要拿起武器的人們說，應該“更好地拿起武器”。現在可以引申來說，應該更好地領導這種參加。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1935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對這個問題作了一個十分正確的說明。他說：

“是的，我們承認將來可能發生一種形勢，到那時候，為無產階級打算，不僅可能而且必須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的政

府，或反法西斯人民陣綫的政府。

“这种政府究竟是怎样的政府呢？而且什么情况下才能提出这种政府的问题呢？”

“它主要是对法西斯和反动派作斗争的政府。它必须是由统一战线运动的结果而产生出来的政府；它决不限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活动，相反地，它对反革命的金融巨头和他们的法西斯代理人采取坚决的镇压政策。

“我们要求它实行时势所需要的明确的基本革命要求。例如，监督生产、统制银行、解散警察而代之以武装工人的民兵等等。

“只要这样的政府认真地对人民的敌人斗争到底，并放手让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工作，那末，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尽我们的力量来拥护它，并且要作为革命的战士站到第一道火线上。

“可是，我们坦白地向群众说：彻底的挽救群众不是这个政府所能办到的。它不能够推翻那些剥削者的阶级统治，因而也不能够彻底消除法西斯反革命的危险。所以，必须准备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①

莫里斯·多列士强加给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同这个定义比较起来，只能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

他在我们曾经提到过的 1945 年 1 月中央委员会报告中说：

“马克思主义学说，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不是教条，而是一个行动指南。它的论点和结论必然随着时代改变；它的论点和结论必然为符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结论和论点所代替。”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反对根据历史的发展来应用他们的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国家出版局 1935 年版（参阅《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3、104、108、109、110 页。——译者）

理論的必要性，但是他們希望这样的应用是出于所有的論点都可以提出来闡述的广泛自由討論的結果，而不是出于某个自己要改变什么就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改变什么的个人思維的結果。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认为，运用他們的就其結果看来已为事实否定了的理論的任何行为，都应该受到严格的分析批判，以免这种錯誤繼續存在，并挖掉錯誤的根源。

总有一天，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会本着这种精神来分析共产党在什么条件下放弃了法国解放时的前进陣地——英勇战斗的果实，失掉了优势并丧失了一部分人心，以致共产党的部长們让别人从自己支持了三年之久的資產階級政权中赶了出来。

沒有疑問，到那时候，人們将会进一步理解不少优秀的党员和英勇的抵抗战士常說的一句俗話，而不会再把它当作笑談：

“在解放的时候，我們誤了車！”

这段历史是为了进行調查和討論而写的，免得以后我們再誤車……

第十四章

从解放到第十次代表大会

法国解放以后，民主选举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决定的第一次征求民意是规定在 1945 年 4 月 29 日举行的市政选举。

党的领导机构主张共和人士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但是反动派利用它在左翼党派中的代理人进行阴谋活动，企图保持和加剧分裂。

连社会党和共产党协商委员会都没有能够提出联合候选人名单来。

莱翁·勃鲁姆迫不及待地向法国社会党发表了传统的反苏言论，这个党随即利用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合法主义立场来大唱骗取群众信任的高调，并且企图使共产党（至少是在言论上）转到自己的左边。

例如，在协商委员会上，提出把五十个职工以上的企业社会化作为目标的文件的是法国社会党代表，而共产党代表则以下面的话反驳了这种主张：

“国有化决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成就，更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成就，而纯粹是一种民主性质的要求。”^①

于是，共产党就单独地或者说几乎单独地参加市政选举，致力于提出一些“反法西斯共和爱国同盟”的名单，名单里包括非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时还包括一些拥护统一的地方上的社

^① 《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集》第 51 页。

会党党员。

凡是提出这样统一的候选人名单的市镇，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在马赛、图卢兹、塞纳河上的布伦）。

1935年掌握三百一十个市镇政权的党，现在在一千四百一十三个市镇中获得了多数。

党所取得的票数预示着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共产党将在议会选举中以占选票26%的五百多万票而成为法国的第一大党。

在塞纳省，党由战前二十七个个市镇的行政管理者一跃而成为六十个个市镇的行政管理者。

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在选举中所给予的这种支持，使得党有可能采取全面行动来改变很快形成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结构。这种支持没有被真正用到改变上，也没有能够在党的政策中充分体现出来。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不去号召群众行动起来强制执行戴高乐亲笔签署的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却宣布自己准备“在由戴高乐将军主持并按照民族形式进行改组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担负更大的领导国家事务的责任”。

同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要求尽快地组织议会选举，产生制宪议会，“以便使法国人民指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政府将对之负责的国民议会”。

当时所有的文件都证明，党领导在市政选举获胜之后就考虑，首先通过自己的强大的、可以使共产党人更广泛地参加政府的议会党团的活动，来进行可能的政治制度结构的改变。

同时发出的要求群众遵守纪律的号召，证实了这种策略的方向。

在此期间，在法国进行顽抗的德军“据点”，已经一个接着一

个地被拔除了。

在法国領土几乎全部获得解放的时候，仍然有少数敵軍負隅頑抗：在魯瓦揚有八千人，拉罗舍耳有一万六千人，圣納泽尔有一万七千人，洛里昂有二万七千人。消灭敌人的这些据点是困难的，并且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派去包围这些德軍“据点”的軍隊，大多数是由“法国西部武装部队司令”拉尔米納將軍指揮的前义勇軍游击队組成。魯瓦揚到1945年4月才解放，拉罗舍耳、圣納泽尔和洛里昂到5月8日才解放。

阿尔薩斯的解放也是十分艰巨的。

1945年2月，战斗仍然在牟罗茲附近进行。德軍发动了一次反攻，并且在比特希—維森堡—阿格諾三角地带又占領了阿尔薩斯的一部分，他們在那里頑抗到1945年3月。

美軍在納粹元帥馮·伦斯德的軍隊突然反攻时退却下来，甚至决定放弃斯特拉斯堡。

戴高乐和拉特尔不肯把斯特拉斯堡交給德国秘密警察，以免遭到报复，因此通知艾森豪威尔，由法国軍隊負責保卫阿尔薩斯的省会。后来美軍改变了計劃，中止了退却。

經過几次襲击之后，希特勒野兽就垮了。納粹軍隊把这一要塞放弃給“盟軍”，以保存最后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紅軍。他們对紅軍一直是寸土不让的。

苏联紅軍在解放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之后，于2月間抵达奥得河。

1945年3月底，当第一支法国軍隊跨过莱茵河的时候，苏联紅軍已經深入奥地利。4月13日，維也納解放。十一天以后，苏联的偵察兵深入到柏林郊区，最后的决战即将在这里展开。

第二天，即1945年4月25日，美苏两国的軍隊在托尔高会师。

这次实际上已經結束的战争的最后几个镜头，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相继出现。

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游击队员逮捕了墨索里尼，把他处死，然后倒吊在公共广场上。4月30日，南斯拉夫人民军在铁托元帅的率领下进入了的里雅斯特。

1945年5月3日，斯大林元帅的战报宣布，红军攻克柏林。

希特勒象只耗子似地完蛋了，他在他的地下避弹室里自杀而死。

5月8日，德军签字无条件投降。

* * *

消灭法西斯侵略者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法国的损失后来计算了出来，现在开列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战斗部队（在1939—1940年的战役中）死八万八千六百八十一人；解放军死六万零七十三人；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死二万四千七百零九人。

“在囚禁中死亡的战俘三万九千零六十二人。

“复员后死亡的战俘四千三百六十二人。

“平民方面：在因种族、政治和义务劳动等原因被流放的八十二万人中，死二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三人。

“被飞机炸死的，五万九千八百九十六人。

“由于其他原因死亡的，二万六千二百九十四人。

“被枪杀的，九千八百零六人。

“在侦讯过程中被处死的，七千七百七十三人。

“在监禁中被枪杀一万五千五百人，这就是说，被枪杀的法国人共达三万三千零七十九人，其中包括解放后调查出的各种情况（失踪、疑已死、推想已被处死）。”

某些讀者看到上面這些數字可能感到奇怪，因為這些數字同解放後關於法國共產黨所流傳的“七萬五千名黨員被槍殺的黨”這句話顯然不同。那是一種誇大宣傳，特別是因為表現在這一方面，就更值得譴責。被槍殺的黨員和非黨員的數目已經十分巨大，十分驚人，沒有必要再加以誇大，更沒有必要把他們“強算做自己人”。^①

我們已經說過，應如何認識為了壟斷抵抗運動而唱高調的傾向。法國共產黨領導的這種做法，跟實現統一策略時所遇到的困難不是沒有關係的。

從我們方面來說，我們引用的數字是在1954年12月《蘇聯研究》第八十一期上公布過的。

在同一期雜誌的第二十六頁上，還載有蘇聯在這次戰爭中所遭到的損失的駭人總結：

士兵七百萬，平民一千萬！

蘇聯以攻克柏林結束了戰爭，它消滅了納粹戰爭機器的最重要最堅強的軍事力量。由於它做出的犧牲，它理應受到世界上由於它而得到解放的所有人的永世感激。

* * *

法國共產黨在納粹投降時的狀況如下：

有總支二千七百五十一個，包括六千一百四十五個企業支部和二萬零六百六十個地方支部，黨員總數為五十四萬四千九百二十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舉行最後一次代表大會即1937年12月（阿

① 不少歷史學家，包括蘇聯的歷史學家，都認為德布勒耳先生和庫爾塔奈耳先生的《受到創傷和正在復興的法國》一書中的數字可靠而加以引用。

我們也參考了紐倫堡審判的文件。在紐倫堡審判中，法國檢查官杜博斯指出，從1940年到1945年，占領軍殺人和犯下的戰爭罪行達二萬九千六百六十起（辯論的正式文件，第6卷第145頁以後，第37卷第211—212頁）。

尔)代表大会时,党员总数为三十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七人,分布在九百七十六个区委会里,包含四千零四十一个企业支部和八千九百五十一个地方支部。

象这样一本旨在依靠过去的经验帮助分析当前形势的著作,必须包含一些能从组织方面进行明确比较的细节。

因此,我们把1945年6月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报告中所列举的党员人数分省列出:

安省:总支三十四(企业支部二十五,地方支部一百四十八),党员四千人。

安纳省:总支四十三(企业支部十九,地方支部四百零八),党员一万零四百五十七人。

阿利埃省:总支二十七(企业支部九十二,地方支部二百八十七),党员九千人。

下阿尔卑斯省:总支三十(企业支部十,地方支部一百四十二),党员三千四百人。

上阿尔卑斯省:总支十八(企业支部五,地方支部七十五),党员二千人。

阿尔卑斯海滨省:总支二十八(企业支部一百三十,地方支部四百二十二),党员一万零六百九十一人。

阿尔代希省:总支三十(企业支部三十,地方支部二百二十五),党员四千零二十九人。

阿登省:总支二十二(企业支部二十四,地方支部二百二十),党员四千零二十七人。

阿里埃日省:总支二十二(企业支部十六,地方支部一百六十三),党员三千一百九十人。

奥布省:总支三十一(企业支部四十,地方支部一百七十),党员三千三百五十九人。

奥德省：总支三十六个（企业支部十四个，地方支部一百八十七个），党员三千五百四十六人。

阿韦龙省：总支二十个（企业支部二十七，地方支部一百二十七），党员二千七百人。

卡耳瓦多斯省：总支十四个（企业支部五个，地方支部七十七个），党员一千四百五十人。

康塔耳省：总支十六个（企业支部十六个，地方支部一百一十二个），党员二千五百九十二人。

夏朗德省：总支十八个（企业支部六个，地方支部一百九十二个），党员五千六百七十二人。

夏朗德海滨省：总支二十个（企业支部二十九个，地方支部一百五十三），党员二千六百二十一人。

歇尔省：总支二十一个（企业支部五十五个，地方支部一百九十八个），党员六千人。

科雷兹省：总支二十八（企业支部四十六个，地方支部二百七十七个），党员八千一百五十二人。

科西嘉省：总支五十一个（企业支部七十，地方支部三百三十九），党员八千二百五十人。

黄金海岸省：总支二十九个（企业支部四十四，地方支部一百四十一），党员三千二百四十人。

北海滨省：总支八十三（企业支部三十二，地方支部五百九十），党员一万二千零七十八人。

克勒兹省：总支二十五（企业支部七，地方支部一百六十八），党员四千零四十六人。

双色佛尔省：总支十三（企业支部十七，地方支部一百三十四），党员二千六百八十二人。

多尔多涅省：总支四十六（企业支部四十一，地方支部

四百一十一个), 党员九千零五十八人。

杜省: 总支八个(企业支部二十六个, 地方支部五十九个), 党员一千八百人。

德龙省: 总支三十三(企业支部三十六个, 地方支部二百四十个), 党员五千零五十四人。

厄尔省: 总支二十八个(企业支部二十八个, 地方支部一百三十九个), 党员二千六百八十八人。

厄尔—卢瓦尔省: 总支二十二(企业支部十五个, 地方支部一百二十五个), 党员二千五百七十五人。

菲尼斯太尔省: 总支一百零六个(企业支部四十八个, 地方支部四百二十个), 党员八千九百二十二。

加尔省: 总支三十一(企业支部八十三, 地方支部二百八十), 党员七千九百零三人。

上加龙省: 总支六十七(企业支部一百九十五, 地方支部二百七十六), 党员九千三百零四人。

惹尔省: 总支二十七(企业支部六个, 地方支部一百三十), 党员二千三百四十四人。

纪龙德省: 总支五十七(企业支部五十三, 地方支部二百六十七), 党员六千零四十一人。

埃罗省: 总支三十七(企业支部四十, 地方支部二百三十), 党员五千三百人。

伊耳—维兰省: 总支四十二(企业支部四十六, 地方支部四百), 党员五千六百人。

安德尔省: 总支二十二(企业支部二十五, 地方支部一百六十四), 党员五千二百六十八人。

安德尔—卢瓦尔省: 总支二十三(企业支部二十三, 地方支部一百五十五), 党员三千三百零九人。

伊泽尔省：总支三十四个（企业支部一百零七个，地方支部二百四十六个），党员七千九百四十三人。

汝拉省：总支三十六个（企业支部二十一个，地方支部一百八十八个），党员三千零五十三人。

朗德省：总支二十六个（企业支部十四个，地方支部一百四十五个），党员二千五百十六人。

卢瓦尔省：总支三十个（企业支部二百一十五个，地方支部二百零一个），党员一万零一百三十三人。

上卢瓦尔省：总支二十三个（企业支部，无，地方支部一百一十三个），党员二千八百人。

卢瓦尔一大西洋省：总支十二个（企业支部四十个，地方支部一百二十八个），党员二千四百一十三人。

卢瓦雷省：总支十七个（企业支部三十八个，地方支部一百一十三个），党员二千二百五十二人。

卢瓦尔一歇尔省：总支二十五个（企业支部十五个，地方支部一百七十六个），党员二千九百九十三人。

洛特省：总支二十九个（企业支部十六个，地方支部一百四十八个），党员三千二百五十八人。

洛特一加龙省：总支三十三个（企业支部二十四，地方支部二百五十七个），党员六千六百四十五人。

洛泽尔省：总支七个（企业支部五个，地方支部三十个），党员六百六十五人。

曼恩—卢瓦尔省：总支十一个（企业支部四十六个，地方支部九十九个），党员二千二百五十人。

芒什省：总支二个（企业支部，无，地方支部二十五个），党员五百八十九人。

馬恩省：总支三十一个（企业支部五十三个，地方支部二百

六十个), 党员三千六百人。

上馬恩省: 总支十三个(企业支部三十一个, 地方支部五十个), 党员一千二百八十人。

馬延省: 总支十个(企业支部六个, 地方支部三十五个), 党员七百二十人。

默尔特—摩泽尔省: 总支十八个(企业支部四十四, 地方支部一百七十一), 党员三千五百一十人。

默兹省: 总支八个(企业支部十九个, 地方支部五十六个), 党员一千五百人。

莫尔比昂省: 总支六十二个(企业支部三个, 地方支部一百六十个), 党员五千人。

摩泽尔省: 总支二十个(1937年有企业支部七十二个——1945年没有公布数目, 1937年有地方支部一百零四个——1945年没有公布数目), 党员二千五百人。

涅夫勒省: 总支二十七(企业支部一百一十四, 地方支部二百一十), 党员四千九百三十八人。

諾尔省: 总支六十八(企业支部一百九十九, 地方支部六百七十三), 党员二万九千四百零四人。

瓦兹省: 总支四十一个(企业支部十七, 地方支部三百三十六), 党员六千三百八十九人。

奥恩省: 总支十三个(企业支部十四, 地方支部四十八), 党员一千零六十人。

巴黎市: 总支二十个(企业支部九百零三个, 地方支部八百一十一个), 党员二万九千三百六十八人。

加来海峡省: 总支八十(企业支部二百六十五, 地方支部四百九十六), 党员二万三千九百五十四人。

多姆山省: 总支三十三(企业支部七十六, 地方支部二

百六十一個), 黨員八千人。

下比利牛斯山省: 總支十七個(企業支部二十二個, 地方支部一百四十六個), 黨員二千六百七十四人。

上比利牛斯山省: 總支二十三個(企業支部五十二個, 地方支部八十八個), 黨員三千人。

東比利牛斯省: 總支四十三個(企業支部六個, 地方支部八十八個), 黨員二千六百一十人。

上萊因省: 總支八個(企業支部四個, 地方支部五十九個), 黨員一千九百八十四人。

羅尼河口省: 總支五十個(企業支部五百二十五個, 地方支部六百二十五個), 黨員一萬九千五百零一人。

羅尼省: 總支四十八個(企業支部一百八十四個, 地方支部五百二十六個), 黨員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人。

上索恩省: 總支十四個(企業支部, 無, 地方支部四十個), 黨員一千四百四十七人。

索恩—盧瓦爾省: 總支三十三個(企業支部六十一個, 地方支部二百九十二個), 黨員七千二百二十七人。

薩爾特省: 總支三十四個(企業支部二十個, 地方支部一百零八個), 黨員二千二百一十二人。

薩瓦省: 總支二十個(企業支部三十八個, 地方支部一百六十五個), 黨員四千四百六十四人。

上薩瓦省: 總支二十八個(企業支部三十四個, 地方支部二百一十四個), 黨員四千八百六十六人。

塞納海濱省(下塞納省): 總支四十個(企業支部四十個, 地方支部二百六十九個), 黨員五千零八十四人。

塞納—馬恩省: 總支二十六個(企業支部二十二個, 地方支部二百七十個), 黨員五千二百七十六人。

塞納—瓦茲省：总支八十個（企業支部二百二十六個，地方支部一千零二十個），黨員二萬二千人。

塞納—聖德尼^①：总支三十四個（企業支部六百零一個，地方支部五百六十五個），黨員二萬二千六百零四人。

塞納—索^①：总支三十九個（企業支部一百九十九個，地方支部四百九十一個），黨員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人。

松姆省：总支四十五個（企業支部五十三個，地方支部四百二十四個），黨員八千一百九十九人。

塔爾訥省：总支十九個（企業支部三十個，地方支部八十五個），黨員三千人。

塔爾訥—加龍省：总支十七個（企業支部十六個，地方支部八十五個），黨員二千一百五十人。

瓦爾省：总支三十二個（企業支部九十八個，地方支部二百八十一個），黨員八千五百五十九人。

沃克呂茲省：总支二十一個（企業支部十七個，地方支部二百一十個），黨員四千三百人。

旺代省：总支九個（企業支部三十三個，地方支部八十五個），黨員二千一百九十八人。

維也納省：总支二十七個（企業支部三十一個，地方支部一百三十四個），黨員三千零九十四人。

上維也納省：总支二十七個（企業支部三十五個，地方支部九十四個），黨員八千三百人。

孚日省：总支十三個（企業支部二個，地方支部五十三個），黨員一千二百一十一人。

① 為了同從中央劃分出去的巴黎地區的南塞納、西塞納和東北塞納各省委員會的實際人數相比較，應該把這些數字計算在內。（這兩個省都已撤銷，劃歸塞納省。——譯者）

萊訥省：总支三十八个（企业支部三十一个，地方支部一百七十九个），党员二千八百七十一人。

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党的会计处在分省公布发出的党证和党费票的详细情况时指出，各省委会从中央会计处领取党证八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张，实际发出的党证是五十四万四千九百二十一张。

1945年1月，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布共有十二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名团员。这个组织在1945年复活节举行的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1945年6月宣布有盟员十八万八千四百人；同时法兰西女青年联盟宣布发出盟员证六万四千七百张。

因此，当时有组织的青年和成年共产党人总数接近一百万。

党的日报《人道报》每日的销售量达三十三万六千份。

此外，党还有十六种日报：

圣太田的《人民呼声报》和该报的阿利埃版；阿尔卑斯海滨省的《东南曙光报》，《红色南方报》，《人民纪龙德报》和该报的夏朗德省版及夏朗德海滨省报（《人民夏朗德报》），《人民多尔多涅报》，《南方之声报》（上加龙省），《阿尔卑斯劳动者报》，《自由报》（诺尔—加来海峡省），《火花报》（下比利牛斯省），《军旗报》（上比利牛斯省），《阿尔萨斯—洛林人道报》，《人民之声报》（罗尼省）和《诺曼第前途报》。

党发行周刊五十七种：《斥候周报》（安省）；《自由周刊》（安纳省）；《下阿尔卑斯爱国者》，《阿利埃人民之声》，《阿尔代希人民之声》，《自由》（阿登省）；《阿里埃日爱国者》，《曙光电讯》，《人民之声》（阿韦龙省）；《红色南方报星期日刊》（罗尼河口省）；《卡耳瓦多斯曙光》，《工农康塔耳》，《夏朗德之声》，《解放者》（歇尔省）；《科雷兹劳动者》，《科西嘉土地》，《黄金海岸的前途》，《新曙

光》(北海濱省);《克勒茲劳动者》,《法兰斯孔太人民》(杜省);《德龙人民之声》,《厄尔前途》,《厄尔—卢瓦尔》,《曙光》(菲尼斯太尔省);《加尔—洛泽尔呼声》,《朗格多克劳动者》,《觉醒》(伊耳—維兰省);《安德尔解放者》,《土雷納^①人民之声》,《真理》(汝拉省);《劳动者》(卢瓦雷省);《卢瓦尔—歇尔劳动者》,《我們的凱尔錫^②》(洛特省);《西南劳动者》(洛特—加龙省);《香檳》(馬恩省);《解放的上馬恩》,《东部之声》(默尔特—摩泽尔省);《莫尔比昂的希望》,《解放者》(涅夫勒省);《瓦茲劳动者》,《光明》(加来海峽省);《人民之声》(多姆山省);《卡塔洛尼亚劳动者》(东比利牛斯省);《火花》(索恩—卢瓦尔);《薩尔特曙光》,《火花》(上薩瓦);《松姆劳动者》,《新生》(塔尔訥);《凱尔錫之星》(塔尔訥—加龙省);《沃克呂茲呼声》,《普瓦特万爱国者》(維也納省);《利木贊劳动者》(上維也納省);《新孚日》,《榮訥劳动者》,《塞納—瓦茲的复兴》,《塞納—馬恩新聞》,除此之外,塞納省还有一些周刊。

具有上述力量的党,准备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 1945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在巴黎召开的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继 1937 年 12 月 25—29 日在阿尔举行的人民陣綫代表大会之后过了八年召开的战胜法西斯的代表大会。

* * *

在反法西斯人民陣綫或抵抗运动中所奉行的統一政策,終于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結果。

所有为实现这个政策而斗争的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自由主义者,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法国旧省名,在巴黎盆地的西南地区。——譯者

② 法国旧省名,今分为紀龙德、洛特、洛特—加龙、阿韦龙、多尔多涅等省。

——譯者

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这种政策的唯一的倡导者，但是共产党人有理由为自己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而感到骄傲。

但是，我們进行一次正确的自我批評就会看到，法国共产党并没有从这两次經驗当中吸取它們所包含的一切革命因素。誠然，統一政策所决定的群众运动的大发展，必然会导致充分利用議會的手段，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內閣的手段。共产党不能够也不应该迴避这种作法，否則就会影响团结并伤害群众的积极性。

但是，在采取这样的活动形式时，党比任何时候更应该小心謹慎，不要变成列宁所警告我們的議會迷，陷入改良主义的幻想，走向內閣主义和机会主义，沉淪于資產階級政权所固有的腐化墮落。

在这样的时期，共产党和它的每个党员，即使是部长党员也在內，都要比任何时候更应该加强自己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更应该时刻想着革命的远景。

無論人民陣綫或者民族陣綫，其取得成功的条件或統一政策的目的，只能是实现工人运动的統一和无产階級同其他劳动社会阶层的天然联盟，因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論想走哪条道路都不可能有任何革命的結果。

一般地說来，統一政策是由这样一种和解运动所决定的，这种和解是群众在人民感到的巨大危險面前，或者說在必須有可能取得幸福才能够摆脱灾难的情况面前，摒除了政治、哲学或宗教方面的分歧而形成的。

因此，所有称作左派的党的領導必須滿足群众的这个要求，而共产党則不仅应该滿足这种要求，还应该主动鼓励这种要求。

因此，問題不在于迴避領導上的必要協議，而是必須避免用这种協議代替应该大大加强其数目、实际作用和战斗性的基层

委员会。

在解放斗争时期，假使社会党某些领导人或资产阶级其他政客的反共宣传、诽谤和阴谋活动，不是在按个人迷信的方法即事先不经过集体讨论的专断方法来领导法国共产党的小集团的那种极端错误的政治态度和立场上找到任何滋养的话，那么，在争取社会主义的阵地上的统一潮流就会变成不可抗拒的。

这本集体著作的编著者，对党的全体同志和法国人民的智慧和革命觉悟有足够的信任，确信曾经使法国革命运动逆转的错误将会得到揭发和纠正，就象苏联所做的那样，特别是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所做的那样。

盲目地、机械地和狂热地服从斯大林甚至他的最有害的错误，引起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由于个人迷信方法的影响而取代了合法领导机构的领导集团。这些错误同共产党员和法国人民心目中的正确的国际主义情感毫无共同之处。

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神秘崇拜转移到世界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身上的作法，以及这些老爷式的奢侈的生活条件，引起了法国人民的反感，这是完全违背共产主义原则的。

禁止在共产党内进行任何真正的讨论，用颂扬领袖“天才”的巧妙方法压制一切批评，把敢于怀疑领袖的人谴责为“党的敌人”，把不接受任何未经讨论的命令的工作人员加以排除，这些作法导致了法国共产党官僚主义化和违反民主集中制。

今天已经证实，尽管那些取消派和官僚主义分子为了保持决定他们命运的共产党领导地位而拼命地进行抵抗，上述种种现象终究是能够消除的。

头脑清醒的、有觉悟的和正直的共产党人，用不着摸索就能找到解决的方法，因为列宁早就阐明了共产党走正确道路和取

得成就的一切准則。苏联共产党通过自身的整頓，又一次有力地申明了这些准則。

因此，尽管出現了根据列宁的正确批評概念在这里指出的一些缺点和錯誤，本书的編著者还是确信，人民陣綫的經驗和抵抗运动中的战斗同盟的經驗，有朝一日还会用得上。

这些經驗指出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道路；这些經驗展示了在法国的特殊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宝贵的革命前景。

第十五章

第二卷的結束語

在《法国共产党史》第二卷所叙述的这段时期，共产党人始終英勇地不怕牺牲地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列，赢得了法国人、甚至与我們的信仰距离最远的法国人的称赞。

党领导中重视绝对听从斯大林指示而不重视把苏联的策略需要同法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的集团，强加给党的策略路线的反复变化，从来没有使党的大多数走上丧权辱国的道路。

在最有害的曲解的时候，在由于不可避免的德苏条约所引起的幻想而做出违反常情的打算的时候，绝大多数基层党员和大部分负责干部都能够同时履行支持苏联的国际主义义务和无产阶级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民族义务。

在占领时期的最初几个月，很多对中央指示不会说“不”的党员，由于盲目地遵守纪律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党的广大基层在反纳粹占领者的斗争中所采取的具体方针，从1940年6月起就有许许多多事实可以证明，不久就变成了1941年6月的总路线。当希特勒撕毁苏德临时条约的时候，党又重新结成一个紧密的火热的整体。

在法国共产党被禁止和法国被占领期间，党的报刊始终定期出版，党以传单和小册子进行的宣传一直没有间断过，一直起着警醒劳动人民和动员他们的作用。

当国际形势使地下党摆脱了与世隔绝的处境以后，成千上万的党员传播和散发出去大量的宣传材料，这些材料接触到全

国的各个社会阶层。

这里有必要把 1939 年 9 月达拉第下令禁止法国共产党以后党的秘密出版物詳列如下：

每年秘密《人道报》的印刷份数

1939年

从第 1 号到第 16 号 2,400,000

1940年

从第 17 号到第 95 号 10,950,000

4 个专号：

——警察在 14 日开了枪（7 月） 120,000

——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一年（8 月） 120,000

——法国妇女們团结起来，让法国成为法
国人的法国（9 月） 120,000

——各国人民的希望——苏联——万岁！
（11 月） 120,000

1940 年总计 11,430,000

1941年

从第 96 号到第 146 号 7,800,000

10 个专号：

——被出卖給托拉斯的法国（1 月） 200,000

——公社周年紀念日 120,000

——1941 年“五一”节 200,000

——为了法国人民的統一结成争取独立的
民族陣綫（5 月） 200,000

——希特勒侵略苏联（6 月） 200,000

——反对法西斯殘暴的各国人民战争（8 月） 200,000

——希特勒和貝当的手沾滿了民族解放烈

士的鮮血(9—10月)	150,000
——苏联庆祝1917年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 (11月)	150,000
——斯大林发表演說(12月)	250,000
——从德国国会纵火到欧洲战火(12月)	150,000
1941年总計	9,620,000

1942年

从第 147 号到第 195 号	7,200,000
——加布里埃·佩里和呂西恩·桑佩被 杀害(1月)	150,000
——前进！迎接战斗的“五一”节(5月)	250,000
——1942年应该是胜利年(5月)	200,000
——公社万岁(5月)	150,000
——希特勒侵略苏联的一年(6月)	150,000
——妇女們行动起来！(6月)	150,000
——希特勒害怕第二战场(8—9月)	150,000
1942年总計	8,400,000

1943年

从第 196 号到第 267 号	
有 52 号是手搖机印刷的	
其余 20 号是半月刊	10,800,000

1944年

从第 268 号到第 316 号	7,350,000
两个专号：	
——关于共产党人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 員会的問題(1月)	200,000
——妇女专刊(6月)	150,000

一个副刊： ——关于准备和领导全国起义的指示 (5月)	250,000	
1944年总计		7,950,000
秘密出版的《人道报》总数		50,600,000

秘密传单的印刷数目

1940年

告法国人民书	300,000	
法兰西民族团结万岁	150,000	
必须让富人出钱	30,000	
两个法国	50,000	
共产党与中产阶级	50,000	
正告警察和警官	10,000	
1914—1918年战争的参加者告 1939—1945 年战争的参加者	20,000	
法国共产党的一项声明	50,000	
资本家搬出了他们的“大人物”	30,000	
从疯狂的国王到衰老的国家元首	20,000	
揭下了赖伐尔、达拉第、魏刚之流的假面具	50,000	
谁有理？	30,000	
大学生	50,000	
耶烏島丑聞	20,000	
打倒卖国报刊	30,000	
青年人	50,000	
劳动者，警惕啊！	30,000	
一些人过着安适的生活，另一些人受着极端 的虐待	20,000	
1940年总计		990,000

1941年

退伍軍人用不着为警察服务的卖国賊“关心”	50,000
給一位医生的信	30,000
1940年6月的卖国賊	50,000
列宁、李卜克內西、罗莎·卢森堡	30,000
流氓逞凶	50,000
为保卫法国的科学而斗争	50,000
桑第監獄事件	50,000
1943年① 2月—1941年2月	50,000
拯救法国人民	200,000
給激进社会党一位劳动者的信	75,000
反对强迫劳动	50,000
排犹主义——反动派的武器	75,000
告法国知識分子书	20,000
給共产党員的信	75,000
給社会党一位劳动者的信	100,000
发战争財的人偷走了国家一千亿法郎	50,000
向法国男女教师呼吁	50,000
向五金工人呼吁	32,000
为挽救农业而斗争	20,000
巴桑	30,000
酒荒	75,000
通货膨胀何时了	74,000
奶	50,000
糖	50,000
衣服	50,000
給一个战俘的信	100,000
增加面包的配售	200,000

① 似应为 1940 年。——譯者

1941年总計 1,706,000

1942年1—4月份

維希政权与征集	50,000
色馬尔向铁路員工們呼吁	100,000
光荣属于牺牲的犹太人	50,000
两位德国人的英勇牺牲	50,000
必須扶助手工业	50,000
托拉斯大发橫財	50,000
国家救济的騙局	40,000
給老年人的公开信	50,000
元帅是怎样履行自己諾言的	50,000
致战俘	20,000
資本集中	100,000
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布里埃·佩里和呂西恩·桑佩的声明	150,000
悼念加布里埃·佩里和呂西恩·桑佩	100,000
大飯店里的丑聞	100,000
增发商业营业执照	50,000
致守門人	20,000
致报商	20,000
加布里埃·佩里	1,000,000
在夏托布里昂被枪杀的人們	100,000
致青年的传单	25,000
共产党的号召	500,000
向人民委员会呼吁	300,000
反对到德国去劳动	100,000
阿尔薩斯—洛林	10,000
中央委员会給共青团的公开信	25,000

致自耕农和佃农	50,000
东方战线上的斑疹伤寒	100,000
皮革和鞋都弄到哪里去了?	50,000
工作人員和甲級飯館	5,000
搞黑市的是誰?	50,000
反布尔什維克的展覽会	20,000
1942年1—4月份总计	3,385,000
1942年5—7月份	
警告警察	250,000
消費用酒	50,000
生产用酒	30,000
致共产党铁路員工	50,000
法国总工会會員給天主教工人的信	100,000
迎接第二战場的开辟	200,000
一份伪造文件	100,000
把德国鬼子从法国赶出去	200,000
召募新兵者站起来	100,000
无偿的损失	100,000
遭受掠夺的农民	100,000
致农业工人	50,000
中央委员会給加来海峽省和諾尔省共产党員 的信	10,000
青年农民們, 团結起来!	50,000
向比利时主教发出的声明	100,000
家庭的埋葬者貝当	100,000
有利的施舍	100,000
政府通告	50,000
1942年5—7月份总计	1,740,000

1942 年末期

誰为德国鬼子效劳,誰就背叛了法国	10,000
盜窃土地的賊	100,000
致共产党铁路員工的信	50,000
瓦耳米宣言	1,000,000
正告宪兵	100,000
正告監獄人員	50,000
小商人(布錫街和达盖尔街)	50,000
1942 年末期总計	1,360,000
1942 年全年总計	6,485,000

1943 年

为了法国的解放而发展黨員	1,300,000
工人階級和全国起义	100,000
民族陣綫全国委员会向法兰西民族呼吁	50,000
为全体爱国者的統一而奋斗	100,000
法国农民	100,000
致加来海峡省的矿工同志們	50,000
1943 年 11 月 11 日	100,000
給乡村村长、同业公会会长和农业組織領導 人的信	50,000
一个战俘写給媽媽的信	50,000
战俘营里的体育活动	50,000
1943 年总計	1,950,000

1944 年

对两次反苏宣传的答复	50,000
坚韧不拔,永不屈服	200,000
中央委员会給被監禁的共产党員的信	30,000
号召工人階級迎接战斗的“五一”节	50,000

莫里斯·多列士到达阿尔及利亚	100,000
法国人民的不可推卸的义务	50,000
1944年,法国的生产者	50,000
第三共和国瀕临崩溃	50,000
光荣属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雄們	50,000
共产党与武装斗争	100,000
全国起义	100,000
1944年总计	830,000
以上五年印发的秘密传单总数	11,961,000

1944年印发的公告

議員告巴黎地区人民书	5,000
告大巴黎人民	3,000
告巴黎男女市民	3,000
1944年印发的公告总计	11,000

秘密小册子的印刷份数

1940年

布尔什維主义手册(第三季度)	20,000
党的生活(10月份)	20,000
党的生活(11月份)	20,000
共产党的政策第1期(12月份)	30,000
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	30,000
党的生活(12月份)	20,000
1940年总计	140,000

1941年

布尔什維主义手册(第一季度)	20,000
党的生活(第一季度)	20,000

对罗森貝尔先生的《金与血》的答复	50,000
党的政策(2月份)	30,000
招烏鏡	50,000
1812年俄罗斯战争簡輯(塔尔累)	30,000
党的政策(3月份)	30,000
折磨, 恐怖的年代	10,000
党的生活	30,000
排犹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人問題	20,000
1941年总計	290,000

1942年

人类的指控: 呂西恩·桑佩	25,000
苏联必胜	100,000
加布里埃·佩里向您讲话	20,000
加布里埃·佩里: 納粹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20,000
野蛮的发源地	50,000
另一个誘惑	20,000
农民們, 挺起胸来!	20,000
怎样自卫	50,000
义勇軍手册	100,000
共产主义手册(第一二季度合刊)	40,000
党的理論讲座六篇	180,000
共产党宣言	30,000
工資、价格、利潤	30,000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30,000
劳动、工資和資本	30,000
共产主义的幼稚病	30,000
国家与革命	30,000
列宁主义原理	30,000

1942 年总計 835,000

1943 年

农民必讀 20,000

党的生活 20,000

法国农民, 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者 20,000

1944 年手册 20,000

1943 年总計 80,000

1944 年

法国可以信賴的法国人 50,000

一份控告卖国賊的起訴书 50,000

我們控訴 50,000

1944 年总計 150,000

在地下活动时期出版的小册子总数 1,495,000

上列数字仅仅是查对出来的总数, 因此, 它一定低于实际数字。

在許多地区, 特别是在 1939 和 1940 年期间, 一些单独活动的党员核心組織都曾主动地利用手抄、打字机、手搖印刷机, 甚至在印刷人协助下, 翻印过他們拿到手里的小册子或《人道报》。

应该把这样的小組主动印发的文件也統計出来。

最后, 还应该考虑到, 由于逮捕、流放和处决等情况, 党所掌握的档案是不完全的, 因为有些党员是正在执行任务和散发秘密文件时被捕的, 他們所散发的文件連一点踪影也找不到。

此外, 还应该把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組織(工会、法兰西妇女联盟、爱国青年联盟、退伍軍人联盟等)印刷的成千上万份的传单計算进去, 同时不要忘记法兰西义勇軍游击队和民族陣綫

本身出版的資料，因為它們的許許多多分支機構也是由共產黨員領導和推動的。

這樣一個總結是任何黨派、任何抵抗運動的團體都做不出來的，即使是那些能夠在倫敦印刷的人、那些得到幾百萬空投資金的人也做不出來。

但是，人們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所承受的犧牲，決不是用數目字所能說明的。

要想在一本三百頁的書里，把戰爭年代和被占領期間從最大的城市到最小的村落所展開的無數行動一一列舉出來，是做不到的。

要想在一本三百頁的書里，向每個共產黨戰士——從甘冒各種危險毀翻列車的、被迫給德國人做普通護路員的人，到遭受敵人嚴刑拷打也不吐出任何口供並且向劊子手高喊自己的抱負的負責人——都悼念，是做不到的。

至於讀者同志所能指出的一些遺漏和一般化的情況，本書編著者只好請求原諒。我們不能夠把所有的東西都說出來。

請讀者同志參考一下從1956年7月着手編寫而由於修改困難而一直拖延下來的法國共產黨正式歷史的提綱，在那裡面，法國共產黨現任領導擬定要寫的十二章中，只有一章（第十章）是打算敘述“從1940年7月到1945年巴黎代表大會”這一個時期的。^①

讀者同志由此可以判斷，本書的編著者在總共九百頁的三卷書中，用三百頁的一卷，即占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敘述現任法國共產黨領導只打算用它多年前就答應要寫的黨史的一章（十二分之一）敘述的英勇鬥爭，是否正確。

總有一天，法國共產黨會集體編纂自己的完整的歷史，到那

^① 《共產主義手冊》，1957年11月號，第1822頁。

时候，最壮丽的篇章，主要是有关抵抗运动的篇章，将得到充实。我们这本书将为这部完整的历史作出一份贡献，因为本书竭力弄清并阐明了事实，揭破了避而不谈的阴谋。

希望本书所没有提到的、经历过这一时期仍然健在的所有同志原谅我们，正确地理解我们，我们纪念某一个人的英雄行为，也就是追念所有人的英勇行为。

希望在这些篇章里没有提到的英雄们的家属，把我们用来叙述他们的某些战友的篇章，看作是对战斗中牺牲的共产党人的忆念。

这些牺牲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英雄都不是白白牺牲的。

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雅克·德库尔在被纳粹枪杀以前给法国青年写的最后一封信，对他自己和其他党员的牺牲提出了最明确的历史定义，他说：

“我看我自己有点像一片从树上落下变成为腐蚀土的树叶。腐蚀土的肥力取决于树叶的好坏。我指的是我寄以全部希望的法国青年们。”

强大的、不可抗拒的解放起义，就是在这些英雄的鲜血肥沃了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共产党英雄们的英勇牺牲，同抵抗斗争一样，都不是没有功绩的。

今天，通过在几百名党员集体批评监督之下由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核心组织审慎起草的这本《法国共产党史》第二卷，真理又在任何官僚主义的命令所不能阻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坚持真理的道路，坚持老实地寻求一切历史教训的道路，就会找到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顿法国共产党的钥匙，党就会很快地重新成为我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传统的忠实表现。

1962年1月

大事記

1940年

- 7月下半月 《告法国人民书》，由莫里斯·多列士和雅克·杜克洛签署。
- 8月16日 維希政府解散法国总工会。
- 10月 雅克·索洛蒙和雅克·德庫尔创办秘密刊物《自由大学》。

1941年

- 3月 大量散发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法国人民》。
- 5月15日—
- 6月7日 諾尔省和加来海峽省矿工罢工。
- 6月22日 納粹德国进攻苏联。
- 7月 “人民陣綫組織委员会”发出号召。
- 7月28日 日本在取得維希政府同意后侵占印度支那。
- 8月23日 皮埃尔·乔治(費边)在巴尔貝斯地下火車站打死一名德国軍官。
- 8月27日 在納粹分子要求之下成立的“法国”特别法庭第一次判处一些爱国者死刑。
- 8月29日 占領軍发布判决一些人死刑的第一号紅黑字布告。艾蒂安·多尔夫是被枪杀的三人之一。

- 8 月 多里奧分子組織的“反布尔什維主义法国志願軍团”成立。
- 9 月 17 日 苏联和英国的軍隊进駐德黑兰。
- 10 月 22 日 二十九名^①人质在夏托布里昂被枪杀，十六名在南特被枪杀，五名在巴黎被枪杀。
- 11 月 11 日 全国爱国示威游行爆发。
- 12 月 7 日 日本襲击珍珠港美国舰队。
- 12 月 15 日 加布里埃·佩里在蒙瓦累廉被枪杀，呂西恩·桑佩在岡市被枪杀。

1942年

- 第一批馬基游击队在上維也納和伊泽尔誕生。
- 3 月 7 日 納粹分子枪杀皮埃尔·色馬尔。
- 3 月 政治犯从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八万人，其中共产党員占大多数。
法国共产党的“特別組織”小組和特別工作队改組为义勇軍游击队。
- 5 月 28 日 納粹分子枪杀乔治·波利塞尔和雅克·索洛蒙。
- 5 月 30 日 阿尔图尔·达利戴、菲利克斯·卡德拉斯和雅克·德庫尔被枪杀。
把母亲节变成全国妇女示威日。
- 5 月 31 日 在巴黎布錫大街举行示威游行。
- 7 月 21—22 日 两万犹太人在占領区被捕，一万零四百一十个犹太人在自由区被捕。

^① 第四章正文中为二十七名。——譯者

- 8月12日 九十三名人质被枪杀。
- 9月20日 举行纪念瓦耳米战役一百五十周年示威游行。
- 11月8日 美軍在北非登陆。
- 11月11日 德軍占領“自由”区。
- 11月23日 法属西非殖民地归属自由法国武装部队。
- 11月27日 法国停战軍隊被强迫解散。
法国舰队在被扣留的威胁下在土伦自沉。

1943年

- 1月8日 法国地下共产党的代表（費尔南·格列尼埃）到达伦敦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
- 1月24日 納粹軍命令炸毁馬賽港旧区。
- 2月2日 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
- 2月 二十七名光荣之路的共产党議員被从阿尔及尔監獄释放出来。不久，四百名流放在阿尔及利亚各集中营的黨員也获得释放。
- 4月17日 法国总工会的代表和共产党的工会工作者签订了佩勒协议。
- 5月15日 全国抵抗委员会成立。
- 6月10日 共产国际解散。
- 9月8日 巴多格里奥元帅发动武装政变，囚禁了墨索里尼，废除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制度。
- 9月9日 科西嘉爆发解放起义。
- 10月12日 为领导在自由土地上活动的共产党员，安德烈·馬尔梯从苏联来到阿尔及利亚。
- 10月13日 矿工第二次罢工。
- 12月1日 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会议。

- 12月4日 爱国青年联盟武装力量号召同占领军进行斗争。
- 12月23日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北非代表团成立。
- 1944年**
- 1月3日 锡涅大屠杀。
- 2月19日 被囚禁在埃斯监狱的爱国者举行暴动。
- 3月2日 德国党卫军在尼姆吊死十七名抵抗战士。
- 3月15日 各抵抗组织一致通过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
- 3月25日 大批德军在伪共和国机动保安队和伪民警的协助下消灭了格利埃尔的馬基游击队。
- 4月1日 纳粹军在阿斯克屠杀法国平民八十六人，有十五岁的少年，有六十岁的老人。
- 4月3日 共产党的两位部长（费尔南·格列尼埃和弗朗索瓦·皮佑）被任命为在阿尔及尔组织的临时政府的委员。
- 4月10日 红军解放敖德萨。
- 4月11日 维克多-埃曼努尔三世退位，意大利宣布改为共和国。
- 6月4日 盟军占领罗马。
- 6月5日 二十八名人质在于任被处决。
- 6月6日 盟军在诺曼第海岸登陆。
- 6月10日 德国党卫军在奥腊杜尔-絮尔-格拉纳屠杀居民七百人。
- 7月7日 大批德军进攻维尔高尔的馬基游击队。
- 7月12日 红军解放卢布林。

- 7月14日 法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
- 7月16日 红军解放维尔诺。
- 8月1日 红军解放华沙。
- 8月10日 圣乔治新城的铁路员工开始罢工。
- 8月15日 最后一号秘密版《人道报》出版。
盟军在普罗文斯海岸登陆。
- 8月16日 纳粹军在布伦树林瀑布屠杀三十四名青年示威群众。
- 8月18日 巴黎地区普遍举行罢工。
红军解放索非亚。
号召在巴黎举行全面起义。
- 8月19日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巴黎地区司令罗耳—汤吉上校发布总动员令。
- 8月20日 纳粹军在圣惹尼—拉瓦耳活活烧死一百名爱国者。
- 8月21日 第一号合法《人道报》出版。
- 8月23日 命令法国国内武装部队在战争期间参加正规军。
- 8月25日 纳粹屠杀马耶居民一百二十六人。
巴黎解放。
- 9月7日 由费边组织的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一个团被编入美国第五军。
- 9月9日 有两个共产党部长（夏尔·狄戎和弗朗索瓦·皮佑）的临时政府还都巴黎。
- 10月7日 盟国在顿巴敦橡树园举行起草联合国宪章的会议。
- 10月18日 穷途末路的希特勒宣布德国全民入伍。

- 10月27日 爱国者解放薩洛尼卡。
雅克·杜克洛在巴黎地区共产党員的报告会上号召加强爱国民警队。
- 10月28日 戴高乐签署解散爱国民警队的法令。
- 11月6日 頒布赦免莫里斯·多列士的命令。
- 11月27日 莫里斯·多列士偕让納特·維美徐和阿尔图尔·腊梅特从苏联返法。
- 12月9—10日 巴黎地区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效仿南部四十省代表的榜样，筹备人民三級会议，以便迫使执行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綱領。
- 12月10日 戴高乐在莫斯科签订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 12月16日 納粹軍馮·伦斯德元帅在阿登地区举行反攻，作最后掙扎。
- 12月27日 第一百五一步兵团指揮官費边上校在阿尔薩斯前綫牺牲。

1945年

- 1月21日 莫里斯·多列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要求正式解散爱国民警队，并建議解放委员会不应代替国家政权机关。
- 2月3日 雅尔塔三巨头会议。
- 2月15日 紅軍解放布达佩斯。
- 3月29日 紅軍深入奥地利。
- 3月31日 法国第一支军队越过莱茵河。
- 4月2日 共青团改名为法兰西共和青年联盟。
- 4月19日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拔除紀龙德的“德軍据点”。
- 4月20日 盟軍进占紐伦堡。

- 4月24日 紅軍深入柏林郊区。
- 4月25日 紅軍和美軍在托尔高会师。
- 4月28日 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击队员处死。
- 4月29日 由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反法西斯共和联盟候选人名单在市政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
- 4月30日 铁托率领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队伍解放的里雅斯特。
- 5月3日 苏联向全世界宣告攻克柏林。
- 5月8日 納粹軍隊在柏林投降。
- 6月26—
30日 法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

参考书和资料

- 《国家与革命》，列宁著(社会出版社)
- 《苏联共产党历史》(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60 年版)
-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 《全国起义的真象》，夏尔·狄戎著(前法兰西义勇军游击队出版社)
- 《人民的儿子》，莫里斯·多列士著(社会出版社)
- 《法国共产党，它的斗争和它的任务》，莫里斯·多列士著
- 《团结，战斗，劳动》，莫里斯·多列士著(小册子)
- 《多列士全集》
- 《马尔梯事件》，安德烈·马尔梯著(两岸出版社)
- 《青年要生活，要胜利》，安德烈·马尔梯著(小册子)
- 《一位伟大的法国人的讲演集》，加布里埃·佩里著
- 《就是这样……》，费尔南·格列尼埃著(社会出版社)
- 《假战争和维希叛卖》，日尔曼·维拉尔著(社会出版社)
- 《眼睛注视着起义的巴黎》，克劳德·罗亚著(尤里雅尔出版社)
- 《巴黎的起义》——8月14—26日(法国共产党出版社)
- 《被出卖的维尔高尔》(当代资料)
- 《伊夫·法奇》，路锡·奥布腊著(《抵抗运动的回声》)
- 《夏尔·德巴尔日记》，马德莱纳·里福著(社会出版社)
- 《抵抗运动史》，亨利·米歇尔著(法兰西大学出版社)

《維希历史》，罗貝尔·阿龙著(阿尔泰木·法瓦尔)

《解放史》，罗貝尔·阿龙著(阿尔泰木·法瓦尔)

《1940—1944年的地下报刊》，克劳德·貝郎瑞著(乔斯克)

《战争回忆录》，夏尔·戴高乐著(普隆图书公司)

《生产斗争》，貝諾瓦·弗拉商著(社会出版社)

《你可以信賴的人》(小册子)

《为法国复兴而努力》(小册子)

《法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集》

《法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真理出版社)

《共产党二十年》

地下时期出版的各种資料、小册子、传单、呼吁书、各号《人道报》和各期《法兰西第一》。^①

許多党员对本党史提供的书面证据。

① 解放以后出現了很多出处不明的伪造文件。为了避免誤用可疑的印刷品，本书編著者执行了下述核对原則：除非抵抗运动战士保证他們給我們的样本是他們自己散发过的，或者是从可靠的同志手里收到的，而且除非每种样本有三个不同来源的，任何秘密文件都不采用。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